

# 炎黄春秋



经5年努力摆脱美国政府羁留返国的钱学森一家

扳倒三个贪官的李克才  
明亡三百年纪念留给历史的思考  
“七千人大会”的勇气与遗憾  
海峡两岸谋和足迹实录  
自然科学研究  
盲目听命政治的教训  
郑超麟对八七会议史实的几点看法  
建国初期留美学生回国潮  
李越然：  
我给毛泽东当俄语翻译的日子

1997

8

总第65期

# 庆祝香港回归 炎黄书画名家近作展开幕



← 我会会长程思远等剪彩  
←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 我会常务副会长李宝光致开幕词



→ 莅会各界人士程思远、马大猷等签名



→ 热情观众络绎不绝前来观赏作品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于1997年7月11日至16日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炎黄书画名家近作展。全国近百名书画家挥笔献艺，抒发亿万海内外炎黄子孙普天同庆的心情。

莅临参观画展的各界人士有程思远、李运昌、平杰三、张承先、马大猷、乔晓光、马玉槐、史怀璧、韩克华、李宝光、冯征、郑惕、杜导正、任继愈、尹瘦石、胡絮青、李正亭。  
(罗明扬 摄影)

### 顾问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朝闻 冯文彬 伍修权  
杨静仁 赵朴初 胡絮青  
费孝通 谢冰心

### 特邀编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俊义 冯 征 冯其庸  
刘颖南 李 庄 李 普  
李学勤 吴 象 苏双碧  
张 镡 张国琦 凌 云  
常 征 温济泽 韩劲草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魏 巍 魏久明

社长 (法人代表): 杜导正

副社长: 方 实 宋文茂 (常务)  
徐 孔 洪 炉

执行主编: 刘家驹 舒元璋  
陈崇保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理事长: 简祖扬 李华鹏

理事单位: 深圳市兴亚大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

秘 书 长: 徐 孔

###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址: 北京东城区雍和宫大街  
戏楼胡同 1 号

邮编: 100007

电话: 64031144 转 2191 或 2004

印刷: 河北省丰润县印刷厂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 购 处: 全国各地邮局 (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  
公司 (北京 399 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 127M

出版日期: 每月 8 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 0079 号

定阅价: 4.00 元 零售价: 5.00 元

## 专 稿

② 建国后扳倒过三个贪官的李克才 ..... 刘利华

⑥ 明亡三百年纪念留给历史的思考 ..... 王戎笙

## 春秋笔

⑫ “七千人大会”的勇气与遗憾 ..... 周 哲

⑲ 1978 年前海峡两岸谋和足迹实录 ..... 杨亲华

⑳ 自然科学研究盲目听命政治的教训  
——荒唐的科研课题“粮食多了怎么办” ..... 薛攀皋

㉗ 我国遗传学发展中坚持“双百”方针的艰难历程  
——记 50 年代初强制推行“米邱林学说”  
在中国引起的风波 (之二) ..... 叶笃庄

㉟ 郑超麟对八七会议史实的  
几点看法 ..... 林修敏 邱春玲

## 殒星篇

④① 在粟裕身边十四年片断回忆 ..... 鞠 开

④⑤ 何思源花甲之年入藏考察 ..... 晓 鸥

⑤③ 从基督徒到共产党员的“平民部长” ..... 满素洁

⑤⑦ 见微知著 琐谈冯友兰 ..... 池 南

## 赤子心

⑤⑥ 张学良九五华诞 于魁智赴美献艺 ..... 杨连元

⑤⑨ 建国初期留美学生回国潮 ..... 傅 琳

⑥③ 投笔从戎为国捐躯的董启文 ..... 张 沛

## 轶闻录

⑥⑤ 我为毛泽东作俄语翻译的日子 ..... 李越然

⑥⑨ 五位将军一次苦涩的欢聚 ..... 郑织文

## 求实篇

⑦① 迫害刘志丹的执行人不是张敬佛 ..... 于行前

## 文荟园

⑦③ 忆胞兄刘天华悉心献音乐 ..... 刘北茂

## 古今谈

⑦⑥ 海人不倦的孔子和学而不厌的颜回 ..... 侯卫东

⑧④ 读一篇文章想到一本书 ..... 李冰封

# 建国后 扳倒过三个贪官的 李克才

● 刘利华



提起刘青山，张子善，很多人都知道，这是1952年元月经毛主席亲自批准处以死刑的两个“贪官”。

提起原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平易杰，人们也不陌生，他是1995年5月，因长期租用高级轿车，而丢了“乌纱帽”的。

可是，有多少人知道建国初揭露刘青山、张子善，两年前又应同志之邀举报平易杰的，竟

同是一个李克才呢？

李克才1917年生于河北省行唐县九口子乡两岭口村一个农家。

“七七”事变爆发后，李克才投身革命。曾任行唐六区、八区区委书记，滦丰县县长，冀东十五行署专员。

1949年7月26日，李克才调任天津行署副专员。成了专区党委书记刘青山、专员张子善二人的副手。

开始，李克才对于参加过著名高（阳）蠡（县）暴动的刘青山、为参加学生运动蹲过大狱的张子善，无疑是十分敬佩的。然而，工作中的实际表现，使李克才对刘青山、张子善的认识大打折扣。

1949年底，《人民日报》一则消息揭露，天津地区违反政策从东北贩运木材被扣。李克才震惊地去问，张子善装糊涂说不知道。

刘青山则说这事，是他和大家商量的，出事了，犯不着装熊，更没有你“胆小鬼”李克才的事。

1950年9月，刘青山、张子善要挪用地方粮款10亿元（旧币）搞机关生产，李克才不同意，刘、张一意孤行，不听规劝，

1951年1月，李克才责成天津地区合作社做好河工供应准备，并要求他们只加运费，不

许赚钱。刘青山、张子善则瞒着李克才单独组织“供应站”，大赚昧心钱 30 亿元（旧币）。赚了钱便大肆挥霍。这一年刘青山动用 3.6 亿元（旧币）买了两辆进口汽车，一辆送了礼，另一辆在他 1951 年 5 月 13 日调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时，在张子善支持下带走了。

接替刘青山专区党委书记职务的张子善没有一丝收敛，1951 年 7 月，他以盖房为名，让专署写证明，拟骗取 20 亿元（旧币）贷款，遭李克才拒绝后，还是利用职权，让地委开具证明骗得了贷款。

1951 年 8 月，张子善连续找李克才三次，要动用 10 亿元（旧币）河工款，李克才不予理睬，后来，还是趁李克才出门参加会议的机会，偷偷动用了。

李克才对刘青山、张子善的错误行为做过各种各样的抵制，也进行过不同形式的斗争。这并非李克才有什么特殊的高明之处，只是他记住了 1948 年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讲的那段话：“可能有这样一些同志，他们在拿枪的敌人面前不曾被吓倒，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而李克才觉得，刘青山、张子善不幸被毛主席所言中。

在刘青山、张子善对李克才的“告诫”一句也听不进的情况下，李克才曾借去省里开会的机会，直接向省领导反映。谁料，河北省某主要领导不以为然，而另一位本来约定与李克才同到天津地委找刘青山、张子善谈话的省级领导竟自食其言，先一步到天津，且向刘青山、张子善亮了“底”。

李克才确实两次向省委组织部郑重提出过调出天津地委的申请，刘、张何曾不想撵李克才走，但人民的天下归根到底不能由刘、张之流说了算。“驱李”不行，又改变策略为“拉李”。

1951 年 7 月，李克才的妻子生小孩，平日高傲得不可一世的张子善，亲自登门送去 200 万元（旧币）让李克才妻子买“补品”。李克才下乡回来，知道后立即让人退回。过几天，张子善又派警卫员，再次将钱款送往李家，李克才又坚决退了回去。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为了获得问题的最终解决，李克才选择了“公开举报”这一方式。

1951 年 11 月 21 日，中共河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省会保定召开，出席、列席会议人员 824 人，张子善作为天津地区代表团负责人率团出席会议，已调石家庄市委副书记的刘青山因出国没有参加会议。



李克才（右）任沧州地委书记时，在基层听取工作汇报

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布置“三反”工作（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会议。河北省委书记马国瑞，在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增产节约的号召，以及中共中央华北局的有关指示后，进行讨论，李克才第一个挺身而出，面对824名与会代表，公开揭发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腐败行为。

坐在台下的张子善，断没有料到李克才会来这一手，他茫然不知所措，无地自容。

慷慨激昂的李克才发言长达一个小时，天津地区各方代表纷纷发言，揭发刘青山、张子善。

与会者为之震惊！

11月29日，张子善在会议期间被依法逮捕。

12月2日，刘青山出国考察回来，途经天津火车站时也依法被逮捕。

刘青山、张子善终于被降伏，在李克才的感情世界中激起的波澜是复杂的。固然不无战斗者的几分喜悦，然而更多的是某种伤痛，是作为领导干部的责任感。

李克才曾对很多人讲：“假如刘青山、张子善，身边没有那么多人去奉承，去迎合，去推波助澜，而是站出来去提醒，去批评，去坚决斗争，刘青山、张子善不致于成为脱轨的列车，毫无控制地滑向罪恶的深渊；假如我们的领导干部，发现刘青山、张子善的错误后，能够引起高度的警醒和足够的重视，及时给他们毫不留情的严肃警告或给予必要的组织处理，而不是一味地迁就、宽容，甚至给予无原则的袒护、包庇，刘青山、张子善也不会落得死罪的下场。我为他们惋惜，因为他们毕竟是枪林弹雨中冲杀过来的，毕竟是流过血的，毕竟是立过功的，他们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口下，而是倒在了共和国法律的神圣枪口下。我能不痛心吗？”

李克才更有严以律己的“自责”。他当年曾为《河北日报》、《人民日报》撰文，公开“检讨”说：“在这场高度原则性的斗争中，我是有缺点的：第一，在刘青山、张子善极端个人主义专制独行的情况下，致使我认为正面斗争解决不了问题，产生了单纯的依靠上级的想法。在

上级不能马上解决问题时，我又几次要求离开这个地区，采取了自由主义态度，认为他们的错误总有会一天暴露，因此，拖长了解决问题的时间，给党给人民招致了更多的损失。第二，刘青山、张子善个人专制独行，在党内制造着毫无民主的封建式的秩序，多数地委委员不敢讲话。我没有更主动的更积极的把问题搬到桌面上来进行斗争，只是依靠上级来解决，所以使问题的解决延长了时间。”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过头前万木春”。1952年2月10日正是农历正月十五，在河北省人民家家户户沉浸在元宵佳节的喜庆气氛之中时，刘青山、张子善罪有应得，在保定市东关大校场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以后的李克才，则伴随着共和国的风雨，经受过十年动乱的磨难，付出过开拓的艰辛，分享过胜利的喜悦。这位“文革”前担任过河北省农工部常务副部长的李克才，“文革”中被罢官，1978年平反昭雪后，他即朝气蓬勃地投入工作，先后曾任衡水地区副专员、地委副书记、第二书记、沧州地委第一书记，直到1990年8月，李克才离休。

1995年5月11日，新华社播发了一条新闻，文字不长，却惊动了全国，新闻的标题是：《长期花公款租用高级轿车无偿使用公物——河北省高法院院长平易杰被撤职》。一个副部级领导干部，因乘车违纪，而丢了“乌纱帽”，在全国确系首例，影响之大是可以想像的。

然而，非知情者，是无法了解平易杰的被扳倒，同此时年近八旬，离休多年在家的李克才会有什么联系的。

其实，李克才与平易杰是“老熟人”了，“文革”结束后，李克才恢复工作到衡水当副专员时，平易杰是衡水地委委员，宣传部长，开会常见面，工作常打交道，李克才对平易杰的印象是不错的。

1991年12月，平易杰调任沧州地委书记时，李克才已离休在家，头上只有一个名誉性职务河北省顾委常委。

平易杰一到沧州，就抽暇来看望李克才。表示了他对李克才的关心和尊重。平易杰为人精

# 无私无畏 敢讲真话 揭露腐败 不徇私情

李克才

李克才应《中国纪检监察报》之邀，写下了“无私无畏，敢讲真话；揭露腐败，不徇私情”的题词

明，工作中确也表现了某种干练，且具有当今择擢领导干部的诸多优势。否则，便不可能有此次平易杰来沧州的任用，以及一年半后对他升任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提拔。

然而，平易杰有一致命弱点被隐藏着，那就是作为一位领导干部绝不应有的对物质生活的奢求。平易杰在衡水工作时就有一很不雅的外号叫“耙子”，就是能“搂”便“搂”的意思。这个外号随着平易杰传到沧州，沧州的干部群众便盯住了他，深怕他“搂”。

这个平易杰偏偏不争气，一到沧州便“摆开了谱”，他无偿占用公家 28 件家具，有彩电两台、电暖气两台、空调一台，还有席梦思床等。最不能让人容忍的是，刚来配给的一辆“尼桑”轿车，一年之后他就从北京一家单位租来一辆“奔驰”，三年租金高达 36 万元。

当沧州人民目睹一年半前两手空空调来的平易杰，1993 年 5 月搬家走时满满两辆大卡车。当沧州人民得知，有“尼桑”轿车不坐，用人民的血汗钱重金租坐高级轿车，且要带往新岗位时，人们愤怒了。有几位“认死理”的领导干部非要跟平易杰“较一较劲”不可。出面举报的有原沧州行署常务副专员沈志鸣、原沧州地区检察院院长王普敬等人。

沈志鸣等人的举报信刚刚寄走，就又急不可待地来请“举报老将”李克才出马。

李克才到底是离开岗位多年了，他虽对平

易杰的所作所为有所耳闻，然而他实在了解不多，更没想到问题这么严重，在群众中造成的影响这么坏。在他详细听了沈志鸣等人讲述的全部事实后，几代党的领导人的谆谆告诫，建国以来无数历史事件的教训，一下子翻上心头，李克才为沈志鸣等人义愤填膺的诉说所感染。他说：“太不像话了！哪里还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样子，哪里还像是个地委书记！你平易杰尽管从没有得罪过我李克才，但你得罪了沧州人民，得罪了共产党，我李克才就不会容忍你！”

次日一早，李克才便就平易杰的问题，写了一封内容扼要的举报信，直接寄给了中央纪委分管地方案件工作的副书记王德瑛同志。举报信末尾，在李克才自己名前署上了“原河北省顾委常委”的职衔。

中央纪委领导对此非常重视，他们立即派出调查组三下沧州，很快将平易杰的问题调查清楚，经中央纪委讨论研究，并报中央批准，给予平易杰撤销党内职务的处分；经全国人大批准，撤销了平易杰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职务。

《中国纪检监察报》曾请李克才题词，李老题写了 16 个字：“无私无畏，敢讲真话；揭露腐败，不徇私情”。这是李克才对报纸的希望，对每个共产党干部的希望，然而在我们看来，又是他心声的自诉，是他一生的自我写照。

（责任编辑 洛松）

# 明亡三百年纪念留给历史的思考

## 《甲申三百年祭》的发表及其影响

● 王戎笙



抗战时期，在重庆寓所书斋中工作的郭沫若

1944年是明朝灭亡的三百周年，当时重庆的一些进步的文化人，忧国忧民，决计以纪念明朝覆灭，告诫国人以历史为鉴，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写下了震惊朝野的《甲申三百年祭》。

这样一篇谈论历史的文章，不仅引发了当年重庆的轩然大波，更由于国共两党态度的迥然不同，留给了世人深刻的历史思考。即使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研究这篇文章，特别是由这篇文章引发的事件，仍是很有意义的。

纪念明亡教训，

《甲申三百年祭》问世

1944年1月15日，重庆文化界一些朋友在郭沫若家集会，商量如何纪念甲申三百周年的事。第二天，在重庆新华日报社工作的乔冠



华写信给柳亚子，约他写文章。柳亚子记述道：“今年一月三十一日收到于怀兄（按即乔冠华）同月十六日从渝都发出的一封信，说道：今年适值明亡三百年，我们打算纪念一下，沫若先生们都打算写文章。昨天在郭先生家和一些朋友闲谈，大家都一致认为你是南明史泰斗，纪念明亡，非你开炮不可。”

当重庆文化界的朋友在郭沫若家集会，商量如何纪念明亡三百年的时候，郭沫若正在研究先秦诸子和西周社会性质。2月上旬，他完成了后来收在《青铜时代》里的《从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一文，此文脱稿后，他的研究兴趣才转移到了明末。他在《十批判书·后记》中写道：“在这前后，我以偶然的的机会得以读到清初的禁书《剿闯小史》的古抄本，明末农民革命的史实以莫大的力量引起了我的注意。适逢这一年又是甲申年，是明朝灭亡的三百周年纪念。我的史剧创作欲又有些蠢动了。我想把李岩与红娘子搬上舞台。因此我对于古代研究便生出了在此和它告别的意思。”2月8日致函翦伯赞，商借明末史料。信中说：“近于友人处得见一乾隆年间之抄本《剿闯小史》写李自成事颇详，甚引起趣味。有李信一名李岩者，乃河南举人，参加当时活动。此人尤有意思。关于此时期之史料，兄谅知之甚悉。除《明亡述略》曾略见李信外，它尚有所见否？祈示知一二，为感。”这封信说明，郭沫若在动手搜集资料的时候，重点还在戏剧素材，把李岩与红娘子搬上舞台。当然可以肯定，设想中的这个剧本，一定是像《屈原》那样，借剧中人物之口，把执政当局的腐败，愤怒地谴责一番。

按郭老的写作习惯，在创作历史剧之前，总要就这段历史作一些研究工作。他3月10日完成初稿的《甲申三百年祭》，从某种角度讲，就是他拟将李岩与红娘子搬上舞台的意外成果。

《甲申三百年祭》初稿完成后，经过几天修改，即交董必武同志审阅。交稿后的第三天，《新华日报》开始连载。这天，恰是1944年3月19日，三百年前闯王进京、崇祯上吊、标志明朝灭亡的日子。文章的第一句话便是：“今年是明朝灭亡的第三百周年纪念”。同日的《新华日

报》还发表了署名宗顾的《三百年前》。其中说：“这段历史虽是整三百年前的事，但特别因为现在我们正挣脱出一次新的亡国危机，回味起来，是更能感受到新鲜的意义的。何况至今，许多无耻的汉奸所干的正是当年的洪承畴、吴三桂的勾当，而因为受了传统历史书的束缚，还有人把明末的农民起义目为寇贼，反把卖国求荣的洪承畴当作贤哲，那么，把这段三百年前的历史弄弄清楚更是有意义的事了。”接着，3月20日，《新华日报》又发表了《甲申事变——明末亡国的历史》的短文，其中说：“这种对外战争的失败正是明政权本身腐败的反映。明代用八股文考试来选用忠实的官僚，以求束缚全国人的心智，结果却整个官僚机构贪污无能到极点……”

看来，以明末的政治腐败来揭露国民党的统治，无疑是这次纪念明亡三百年的主旨。

一些进步的文化人，在4月15日出版的中共中央在重庆的机关刊物《群众》上，刊载了一组纪念明亡的文章。其中有柳亚子的《纪念三百年前的甲申》、翦伯赞（署名商辛）的《桃花扇底看南朝》、鲁西良的《明末的政治风气》、寓曙的《明末清初史学的时代意义》。这四篇文章的共同旨趣在于围绕明末史事，抒发自己对现实的感受。柳文以诗结尾，其中有“一姓履宇何足道，万家流血始堪伤”之句。翦伯赞的文章描述了南明弘光朝在民族危亡的形势下，“一方面是贪污腐化，荒淫无耻，一方面是饥寒交迫，流离死亡；这正是明代亡国前夕的社会之一里一面”；又说南明政府“地非不广，兵非不多，人非不众，物质资源非不丰富。假使福王政府，能顾念国家危机，朝野上下，团结一致，刷新内政，重整军备，并进而招辑流亡，使其来归，共抗满清，则收回河北、恢复北京非不可能也”；还说“不仅如此，他们又大兴党狱，收捕复社诸生，摧毁文化，箝制舆论”。鲁西良在《明末的政治风气》一文中说：“不过，在封建社会，一个政权的倾覆，固然是由于水旱饥馑内乱外患的交侵，而当时各阶层的腐败，却不能不说是一个主要的原因。现就明朝末年这种腐败的情形，根据可靠的资料一一列举出来，

以作《甲申三百年祭》的读后感，我想读者或者不致讥为无意义的吧。”鲁西良列举了明末政治腐败的事实，并将政治腐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当时的最高政治当局太昏庸，因为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蔚为风气，就一发而不可收拾了”。接着说，崇祯皇帝是“真正地道的一个亡国之君”，“将帅们都是些不学无术的家伙，只知拥众富贵，对政府一味欺诈，在掩败饰功。敌人来了却不抵抗，甚而首都失了，连‘一矢’都不肯入援。士兵们则一点也不教练，不但不能杀敌，反而抢掠起来比贼还厉害。”“这种贪鄙奢淫的风气，弥侵于整个的社会。他们只知道如何的去自私自利，他们以自己的地位，去投机取巧，升官发财。他们知道侵吞公款的法子，甚而连军粮都能吞没了，弄得军士要‘脱巾’不干。他们也知道如何利用公款作生意在加二加三的去赚钱。侍着有钱贿赂，即使犯了罪捉起来，也可以‘免责免比’。换言之，只要有钱可赚，有乐可享，即便是称儿称孙，也不在意。钱赚多了就可交际，能交际，就是犯法也无关系，什么国计民生，都是与自身不相干的东西。”

延安《解放日报》于4月18日和19日全文转载《甲申三百年祭》时，加了长篇“编者按”，其中指出：“郭先生根据确凿的史实，分析了明朝灭亡的社会原因，把明思宗的统治与当时农民起义的主将李自成始末作了对照的叙述和客观的评价——还给他们一个本来面目。郭先生虽然推翻了流俗关于李自成的无知胡说，但是对于他的批评也是极严格的。不过无论如何，引起满清侵入的却决不是李自成，而是明朝的那些昏君、暴君、宦官、佞臣、不抵抗的将军，以及无耻地投降了民族敌人引狼入室的吴三桂之流（吴三桂在后来又‘变卦’了，而且真的变卦了，不像现在有些吴三桂们，表面上‘反正’了，实际上在替日本主子服务）。李自成的部下，后来还继续抵抗清兵，他的侄子李过还被明隆武帝赐名赤心，永历帝封为兴国侯。这些事实，当然是那群歌颂满清曾（曾国藩）胡（胡林翼）的败战亡国主义者所不敢提的。郭先生在他的文章里充满了爱国爱民族的热情，但是他究竟只是在科学地解说历史，没

有去想着居然有以吴三桂、阮大铖自拟的人们来向他狂吠一通。”

这篇“编者按”给《甲申三百年祭》以正确评价，表示了对作者的热情支持，同时抨击了围剿该文的人们。因为，早在3月24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就发表社论攻击郭沫若。按语所说吴三桂“变卦”云云，显然是暗指《中央日报》社论撰稿人陶希圣的。

## 国民党“对号入座”

### 老羞成怒大张挞伐

明亡的历史教训是惨痛的。郭沫若在一万七千字的《甲申三百年祭》中，以三分之一的文字揭露了明末的政治腐败、饥民遍野、官逼民反，且文字犀利，入木三分。如说明朝政府“事实上它久已失掉民心，不等到甲申年，早就只是仅存形式的了”。“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崇祯帝“承万历、天启之后做了皇帝，内部已腐败不堪，东北边患又已经养成，而在这上面更加以年年岁岁差不多遍地都是旱灾、蝗灾”，但官家仍征比搜刮，诛求无已，军队到处虐民，使“人不得守其田园”、不得“有其家室”，“无论是饥荒或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崇祯帝虽天天在说励精图治，但实际上所作所为都是在袒庇豪家。“但对于当时政治的腐败认识得既已如此明了，为什么不加以彻底的改革呢？”“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三暮四，轻信妄断。崇祯当权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但只看见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无所措”。特别是这文中的“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如何如何，更是当权的国民党所忌讳的一段，因为从1927年“四·一二”事变到1944年也恰好是十七年。

文章矛头直对国民党是肯定无疑的。但作为一个执政党的国民党，本应从明末政治腐败、官逼民反中吸取教训，革新政治，广开言路，以免重蹈崇祯皇帝的覆辙。然而腐败的国民党计不出此，却对《甲申三百年祭》大张挞伐，由

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连发两篇社论，大打棍子，大扣帽子，指责郭沫若搞历史比拟，“把今日革命抗战建国途中的中国，比拟于宋末或明末亡国时代的中国”。《中央日报》文章的作者们，在攻击郭沫若搞影射的时候，全然忘记了：当时可以使人们讲到明末清初的历史便联想到现实的始作俑者，就是1933年便开始搞历史比拟的蒋介石。

蒋介石鼓吹的“攘外必先安内”的理论，原是以明末的历史作为依据的，其模式即：把明朝比作当时的国民政府，把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比作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把雄踞关外虎视眈眈的清军比作入侵的外敌即日本帝国主义者。1933年5月31日，塘沽协定签字，国民党政府决定集中全力围歼红军，并创办庐山训练团，蒋介石每次向军官团讲话时都要引证历史事实，讲一遍先安内才能攘外的道理。他说：“如果剿匪不能成功，抗日就没有基础。因为一方面抵御外侮，一方面势必要分力剿匪，那就与从前明末的情形一样。当明末之时，一面陕西、山西的土匪猖獗，他没有先去剿清，因之满清乘机入关。假使明朝只竭尽全力在山海关那边抗战，他何尝不能抵御外侮。可是后方的土匪李闯猖獗，等他打到了北京，结果只有亡国。多尔衮写给史可法的信也说：他之天下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这虽然是他的狡辩的话，可是我们细按当时的情形，却不得不承认明朝之亡国不是亡于满清，而是亡于匪乱。现在我们的国难同明朝的情形差不多一样，所以我们要以明朝为前车之鉴……只要……如果……恐怕结果也只好重演一回明朝亡国的故事。”

如今，轮到别人以同样的思维定式，用同样的一段历史总结明亡教训了，只是由于政治立场不同，得出的结论不同，便招致了国民党的大张挞伐。

1944年3月22日《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的《新华日报》刚刚载完，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便于3月24日迫不及待地由陶希圣执笔，抛出题为《纠正一种思想》的社论，指责《甲申三百年祭》是“出于一种反常心理，鼓吹败

战主义和亡国思想”，并说：“三百年前，蔓延于黄河流域及黄河以北的流寇，以李自成为首领，于外患方亟之时，颠覆了明朝。其所得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二百六十年的亡国局面。”“郭沫若今天把流寇夸扬为革命，把策应敌寇，断送国家，灭亡民族的流寇夸扬为革命，这不但是民族主义的羞辱，并且是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和玷污。”4月1日，重庆《商务日报》也发表题为《论赫尔的名言》的社论，学着《中央日报》的腔调说：“有人写出《甲申三百年祭》的文章，散播败战思想，把不正确的毒素，渗进社会内层。这种文章是时代错误的结晶。”4月13日的《中央日报》再次发表《论责任心》的社论，说：“由于一部分人士责任心的缺乏，于是就有一种决不至于流行而竟然流行的思想，这就是把今日革命抗战建国途中的中国，比拟于宋末或明末亡国时代的中国。文学、戏剧、史论，渲染着亡国的怨望和牢骚。”4月20日叶青在《中央日报》发表题为《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评议》的长文，说：“藉此甲申三百年，特利用明亡的历史事实来作材料，而妄想以明朝来射影国民政府。”黄义本在《败战主义与思古幽情》的文章中竟然含沙射影地说：“因为郭氏主张当外寇入侵，应当加入流寇以打政府。”又说：“郭沫若怀着的幽情也有所顾忌而说不响嘴，只能在暗中指古骂今。这种幽情心理上是想帮助‘李自成’，而实际只帮助了外寇。”指责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是想说明这个甲申年“是流寇迫使国民党煤山（上）吊的甲申年”。署名荒民的文章更说：“爱拿明末历史来给现在抗战建国的中国下注解”，“是一种极危险的亡国思想”，写《甲申三百年祭》这种文章的人“无异为敌人第五纵队”。

共产党胸怀博大，

以史为鉴教育干部

中共中央对《甲申三百年祭》采取了与国民党完全相反的态度。就在延安《解放日报》转载《甲申三百年祭》之后几天，即4月22日，

毛泽东在《学习与时局》的报告中提到《甲申三百年祭》。他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毛泽东的这篇讲话，一反众说，独出新解，第一次提出《甲申三百年祭》所总结的历史经验是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是给共产党敲警钟的。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军委总政治部在印发此书时的联合通知中也是这个精神。该通知指出，这部著作“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就是要我们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覆辙。”

尽管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以五千字，即约占三分之一的篇幅，描写了农民军，特别是描述农民军攻入北京的“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但笔者认为，当年郭沫若撰写《甲申三百年祭》的本意，并非为共产党提供历史的镜子，敲一敲警钟；假如他有此念头，文章中就不会写出如下这一段文字：“（李）自成的天顺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没有外患，必然是成功了），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早迟也会变质，而他必然也会做到汉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说是断无例外。”

尽管《甲申三百年祭》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提出了如此尖锐的批评，但中共中央仍主动拿来，作为一面历史的镜子，号召全党学习《甲申三百年祭》，以后还利用各种文艺形式进行宣传。要求全党吸取李自成农民军由胜利到失败的历史教训，在胜利面前要经得起考验，永远不能骄傲，要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以免重蹈李自成的覆辙。这表明当时毛泽东时刻在考虑如何使自己的队伍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善于并且敢于听取不同意见，善于并且敢于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当时还不是执政党的共产党人想到的是以闯王进京作为历史的镜子，要全党警惕在进城以后如何防止腐败。这说明

毛泽东远在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以前，就在考虑如何防止执政党的腐败问题了。这是毛泽东的深谋远虑。

1988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第四册，记述了当时各解放区整风学习笔记中很多生动深刻的事例。一位宣传科副科长在笔记中这样说：“刘宗敏思想，在我身上就有很严重的反映。自以为进过抗大，在一一五师当过战士，就目空一切，谁也看不起；讲私人感情，同地方新来的同志不团结；高高在上，高谈阔论，脱离群众；生活腐化、散漫……要是大家都像我，还成个什么革命队伍，也不会有比李自成更好的下场。”一位宣传大队分队长也在笔记中说：“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城，但是已经被城里的花花世界迷了眼，总想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还要打扮打扮，怕人家说自己土气，要是进了城，还能不被金钱、美女俘虏了去吗？李自成起义军的悲惨下场，真该我们警惕啊！”一位大队干事在学习笔记中写道：“李自成进了城只要亲信，不要能人；亲信骄傲，他能容忍；李岩直谏，他又不听；军心民心都散，在事自然难成。我们还未进城，自居抗日功臣；将来若是进城，难保不像李自成。这面历史镜子要照，不照革命难成。”

这里，使我们看到了，中共中央把《甲申三百年祭》规定为党的整风文献的无比正确，也使我们深深体味到当年毛泽东博大胸怀和远见卓识。

## 不无遗憾，一篇“太平军经验”未能写成

毛泽东重视历史经验，看重《甲申三百年祭》，又建议郭沫若写太平军经验。他在1944年11月21日给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

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

解放以后，郭老一直想抽出时间完成毛泽东交给的这个任务。他利用一切工作间隙，阅读大量的太平天国史料和国内外学者发表的论文及专著，对太平天国史中许多重要问题作了研究。

1960年初，陈毅又向郭老提起毛主席在延安时向郭老提出的总结太平天国经验的事。陈老总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重提毛主席的这个建议，我不好去作揣测，但郭老是很认真的。郭老要我与当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所、历史所的负责同志商量，物色几个青年同志，组成一个小组，与他的研究工作相配合。郭老对治学方法，对一些理论问题，都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对该书的编纂体裁，他提出了吸收我国史学史上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长处的设想。为此他亲自草拟了全书的章节安排。

太平天国的胜利时骄傲的历史经验，要比李自成农民军的丰富得多。

略知太平天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在从金田起义到定都南京（改名天京）的进军途中，太平军全体官兵在生活上都是非常简朴的。布衣蓝襟，缝数寸黄布于衣襟，以为记号。金田起义以前，洪秀全就在《原道醒世训》一文中，把人类社会一切罪恶的根源，都归结为一个“私”字。他说“一出於私”的社会是不好的，应该建立一个“人无私财”的理想世界。

进入南京以后，洪秀全们想把在军队中行之有效的平均主义军需供应制度推向社会，企图把整个世界都改造成为划一的、平均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定都天京以后，洪秀全就陶醉在猗欤盛哉的颂扬声中，什么“金陵为王气所钟，有龙蟠虎踞之雄”；什么“穆穆皇皇，我王奄有四海”；仿佛已到了“万国来朝之候，残妖绝灭之时”。他在一通诏旨中竟然说：“一统江山图已到，胞们宽草（心）任逍遥”。他自己首先逍遥起来。仅王府里侍候起居的杂职人员就有一千多人，什么典天舆、典天马、典天乐、典天锣、典

天袍、典天更、典天厨、司天水、典天鱼、典天柴，此外还有掌伞的、执旗的，名目繁多。

奠都南京以后，首义诸王，大讲排场。天王府设有专管天王出巡的仪仗；天王以下各王，也按照等级均设有专管仪卫舆马的官职。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前方将士正在浴血奋战，与清军的较量胜负未分，而天王、东王等人却为繁华所迷，在天京城内如此纵情骄奢，实为一幅败亡景象。

尽管洪秀全进南京的这些历史经验，比李自成进北京的历史经验要丰富千百倍。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那时的历史条件下，能不能总结和如何总结，就不能不慎之又慎。

重提总结太平军胜利时骄傲这一历史经验的是60年代的陈毅；40年代首倡这一建议的毛泽东本人此时并没有重提此事。而此时已是“大跃进”、人民公社之后，也是1957年反右派和1959年批判彭德怀之后。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假如郭沫若像他抗战时期写李自成农民军那样，写农民军胜利后“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去预料“（李）自成的天朝即使成功了……他必然也会做到汉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其结果将会如何呢？这是一个具有普通智商的人都可以作出判断的问题，何况郭沫若是一个聪明过人的人。

他没有动笔写，很快就放弃了总结太平军经验的计划，但没有要我们四人小组解散。我们四个人，近代史所的龙盛运、贾熟村以及历史所的何龄修和我，继续研究下去，于“文革”前夕定稿，“文革”后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太平天国运动史》。因为我们没有总结太平军经验的政治任务，纯粹是撰写一本学术著作，而且是在“文革”结束以后出版的。所以这本研究太平天国的书，问世以后还是太平的。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攻清史，1958至1967年间曾任郭沫若的秘书）

（责任编辑 洛松）

# “七千人大会” 的勇气与遗憾

● 周 哲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为进一步纠正“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错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以便迅速扭转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军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余人，故称“七千人大会”。

“七千人大会”，是我党在建国后比较冷静客观地分析中国国情，坦率承认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失误，并勇于作自我批评的一次重要会议。然而，由于主客观的多种复杂原因，这次会议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些遗憾。今天，当我们重新回头来看这次大会时，会得到许许多多的启示。

如果追溯到1960年和1961年，我们可以看到，中共领导人是带着困惑与思索走进七千人大会的

“大跃进”后国民经济处于严重困难时期，1960年8月，国家计委提出“调整、巩固、充

实、提高”八字方针，然而，这时党内对形势的困难程度的认识，并不是十分清晰的。

“大跃进”后的严重困难，主要表现在农业和工业上。而农业的困难又是第一位的。农业的困难，最突出的，又表现在农村劳动力缺乏的问题上，它已成为制约农业生产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一大难题。中共中央指出：“如果不立即改变目前农业生产战线劳动力既少又弱的状况，那所谓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所谓粮食是基础的基础，都将变成空话”。由此要求各地“采取一切有效的措施，挤出一切可挤出的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迅速改变当前农业缺乏劳动力的严重状况。”对工业困难，仅就钢铁生产一项，便可见一斑。1960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保钢问题的紧急指示》，其中说到：今年能不能完成1860万吨钢的生产任务，是国内外注目的一件大事，从11月21日起，钢、铁、煤出现了生产逐日下降的严重情况，如不扭转这种局面，钢铁生产任务就有完不成的危险……

到了年底，党内许多务实的领导人客观和主观上的双重困难在认识上更进了一步。12月12日至14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等领导人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

剖析“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时说：我们做了错事，看来有一半是由于经验不足。今后必须慎重，要很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他还说，许多错事中，人为的因素占三分之一以上。周恩来在这里提醒人们，这种认识是我们走出困境的思想前提。

为缓解农业减产带来的严重困难，根据陈云的建议，中共中央不得不决定从1961年起进口粮食。此事由周恩来负责具体实施。我国建国11年来，每年都出口粮食，从未进口过粮食，这年被迫进口粮食达500多万吨。

1961年4月3日，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7次扩大会议上专门作了《关于国内外形势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分析说：如果我们不承认有“暂时性、局部性的困难”，光讲“三面红旗的伟大胜利”，是不全面的。“成绩是伟大的，但是，总还有局部性的、暂时的困难，和某些工作上的缺点。对于困难，大家是很清楚的”。

为进一步摸清情况，5月间，周恩来赴河北

邯郸地区调研。在邯郸农村，他发现问题更加严重，群众的积极性和体力、畜力已遭到严重的破坏，为此，他向毛泽东提出：“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社员的体力和恢复畜力问题。”

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周恩来在会上讲话时说，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中，许多领导人的精力并不是集中在建设上，“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脑子就热了，四大指标都搞高了，钢铁翻一番是勉强上去的，粮食说是丰收，实际上把库存都吃光了”。他点明，大跃进以后的“大办钢铁”所带来的后果是破坏了生产关系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我们爱护主席，有了困难就要告诉主席。现在，党内有一种不好的空气，好像讲困难就是泄气”。周恩来一方面指出了一些人宁左勿右的思想，另一方面充分估计到了困难的严重性。

5月31日，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沉重地提醒人们：虽然今年农业形势已有好转，但是粮食形势还在继续紧张，库存已经减到最

低限度。1961年至1962年度粮食形势将继续紧张。

面对如此紧张的形势，周恩来提出：解决粮食问题的根本办法，是从城市压缩人口下乡。三个人的饭三个人吃，不要五个人吃。

为克服困难，做好工作，8、9月间，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工作会议，针对粮食困难，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1961年到1962年度粮食工作的几项规定》和《1961年到1962年度调拨、购销计划的说明》，指出：“全党同志必须动员起来，根据城乡兼顾的方针，及时征购，同时安排，踏踏实实地做好粮食分配工作，保证完成粮食征购计划和粮食调拨计划，加速压缩城市人口，减少城乡粮食销量，切实安排城乡人民生活，这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迫切的重大的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

鉴于当时粮食的紧张状况，会议期间，周恩来约有关方面负责人仅谈粮食问题就有十几次之多。农业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在下庐山途中访问了星子县五里公社玉京大队，亲眼目睹群众的困难生活，他鼓励大家说实话：“不要怕，你们不说我也知道，现在是困难时期。”又说：“只要我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光景一定会好起来！”带着这种沉重的心情，他下到南昌，在饭桌上应邀与江西省委负责人干杯时说：“干一杯酒，要增加外调粮食1亿斤！我们干三杯，增加外调粮3亿斤”。周恩来清楚地知道，江西稍好一点，这显然是国家粮食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

9月28日，中共中央召集民主人士座谈会，鉴于民主人士提出了许多疑问，周恩来耐心地作了回答。

在回答“三年农业灾荒是否这样大”时，他肯定地说：是这样大。今年大于去年，不过工作比去年改进，所以农村情况好于去年”。

在回答“困难到底要继续多久”时，他坦诚地说，走出困难时期，要看农业的收成和生产的发展，计划从今年起，如果没有意外的特大灾害，在两三年内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起来。

为开好七千人大会，中共中央于1961年

12月20日至1962年1月10日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周恩来在会上说：“总的还是那四句话：形势已在好转，农村先于城市，困难仍然很多，城市大过农村。”针对当时干部中存在的松劲畏难情绪，他表示：尽管三年来我们工作有错误，造成很多损失，但是要看到成绩是主要的。“就是到了七千人的干部会上，只是鼓劲还不够，还要统一思想。”

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改变了会议的开法，并让大家“白天出气，晚上看戏”。刘少奇则在讲话中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判断

1962年1月11日，由中共中央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开幕。按中央决定，刘少奇向大会作主题报告。刘少奇主持起草的报告，本来要先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然后再提交大会。但毛泽东对报告稿不是很满意，便向刘少奇和起草委员会建议：“不要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一开始便把刘少奇主持起草的报告稿印发全体代表讨论，至24日，用13天的时间广泛地征求了意见。正像毛泽东对代表们所说的，“报告稿子发给你们了，果然议论纷纷”。根据大会各分组在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对报告作了许多重要的修改，从而形成了报告第二稿。对这一稿，毛泽东较为满意，他后来在大会上对所有与会者说：“应当说，报告第二稿是中央集中了七千多人议论的结果。如果没有你们的意见，这个第二稿不可能写成。”

在第二稿的基础上，1月25日，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向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提交的报告。刘少奇在会上强调：从1958年以来，我们发生了这样多的问题，一方面有很多成绩，另一方面有很多缺点错误，到底如何认识，这是一个大问题。要



统一认识，统一思想，以至以后还要统一计划，统一行动。这是我们党内目前的关键时期的一个关键问题。

1月27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提出的书面报告正式印发与会人员。

报告点明“目前我国国民经济中存在的困难，还是相当严重的”，还提到：“由于农业减产，1961年我们不得不向资本主义国家进口了520万吨（105亿斤）粮食，这是全国解放以来没有过的事情。1962年，我们还需要进口400万吨（80亿斤）粮食。显然，中共中央的这一决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不到困难的极点是不会如此的。因此报告提醒人们要正视困难，“对于当前实际存在着的困难，应该有足够的估计”。

细心的人会发现，报告在反映刘少奇个人对形势的看法方面，是有所保留的。同日，刘少奇按照毛泽东“讲一些补充意见，作一些解释”的意见，在大会上作了讲话。他首先讲了“关于国内形势问题”，这里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个人对困难形势及其出现原因的看法。

刘少奇开门见山地说：“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会有大跃进。在过去几年，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

对困难出现的原因，刘少奇分析得更为坦率：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一条是“人祸”（1958年以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两个原因中哪一个是主要的？刘少奇认为，各个地方情况不一样，“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他举例说明有些地方就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对缺点、错误与成绩的比重，刘少奇说过

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只是三个指头。”

应该说，刘少奇在讲话中对困难形势的估计比书面报告更进一步，但是，仍未彻底解决对形势的认识问题。刘少奇在讲话中仍认为，处于次要的、第二位的缺点和错误，大部分已经停止、改正，已经过去了，“好像一个人害了一场大病，现在这场病基本上已经好了。”这一认识显然不是完全符合实际的。即使这样毛泽东是否同意刘少奇在书面报告中对形势的估计呢？从后来的情况看，毛泽东对这种估计是有不同看法的。1966年8月5日他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批评了“1962年的右倾”，所指的“右倾”应该说是包含七千人大会前后对形势严重性的这种认识的。

会议原定1月底结束，大家可以回家过春节。可是到29日，许多人反映还有话没有说完，心中憋着一肚子气。甚至有人反映，小组会上有压制民主、不让讲话的现象。为充分贯彻民主集中制，当天毛泽东到大会上讲话：“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

他向大家推荐了这样一个办法，不过春节，“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毛泽东还严肃地说：“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

1月30日，毛泽东主动代表中共中央承担责任：“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的，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2月3日，周恩来在福建组会议上，从几个方面表明了他在七千人大会上既唯物又辩证的态度，他提出，检讨的原则是：“肯定成绩，前途光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检讨的方针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出气和上下通气，达到新的团结，方法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检讨的目的是：“实事求是，也就是说真话，鼓真劲，



1962年2月，  
邓小平在扩大的  
中央工作会议（即  
七千人大会）上讲  
话

办实事，收实效。”

同一天，朱德在山东组会议上讲话，谈了自己对经济建设的看法：“要把大家的积极性引导到农业、工业、手工业生产上去，引导大家同自然作斗争。但不能用那种几十万、几百万人齐上阵的办法，不能那样搞，而是要有组织、有计划地搞。要使农民安居乐业。安居乐业是发展生产的根本。”“贯彻农轻重的方针，要从我们的底子出发，不要从上头来大计划。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在做的当中稳步增加。办不到的事，硬要去办，还是办不到，结果既伤了党员，也失掉了群众。客观规律不能违背。”朱德的讲话，表明了他对形势深深的忧虑。

2月6日，邓小平在大会上就“党的问题”讲话时也讲到：“目前我们党的生活是有严重缺陷的”。“过去几年中，中央的缺点，主要表现在计划指标过高上。计划指标如果切合实际，并且留有余地，那就不会发生过重、过死的问题”。

林彪对毛泽东在如此境遇下的心态十分理

解，他把最近几年造成的困难，说成是“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较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后来毛泽东在修改他这篇讲话时说：“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

实际上，这是会后给政府工作留下的艰巨的后续任务。因此，在2月7日的闭幕会上，周恩来一方面从政府工作角度替大家承担责任：几年来的缺点错误“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综合性的委员会、各综合口和各部，要负很大责任。”“不切实际地规定跃进的进度，就使人们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只注意数量，不注意品种、质量；只要高速度，不重视按比例；只顾主观需要，不顾客观可能；只顾当前要求，没有长远打算；不从整个历史时期来计算大跃进的速度，而要求年年有同样的高速度。”“结果‘欲速则不达’。”他决心把调整作为一个重要环节来抓。首先“精兵简政”。党政机关，首先要

裁并机构，“拆庙”，同时“搬菩萨”。

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的当天，周恩来便与邓小平商定，次日再召集各中央局书记，各省、市、自治区书记举行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专门讨论有关粮食问题和精简工作的文件。以期加大调整工作的力度。

七千人大会后，困难时期并没有过去。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人对形势不怕说“漆黑一团”，却有了刮“黑暗风”的嫌疑。阶级斗争和经济工作又一次搅在了一起

七千人大会以后，中共中央一些主要负责同志分赴各地视察，毛泽东于会议闭幕的第二天即到湖北、浙江等地；朱德到浙江、江西、福建、上海、山东等地。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则留在北京全面主持中央的调整工作。

2月21日至23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1962年国家经济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问题。会议分析了农业生产下降，市场紧张，物价高涨的情况，发现当年预算中仍有五十亿财政赤字，认为当前经济困难比七千人大会时的估计要重。对这一点，刘少奇在会上坦率地说：中央工作会议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为此，他果断地提出：“现在处于恢复时期……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他认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过去，如不采取果断措施，国民经济将进一步恶化。对刘少奇所主张的“透够底”和“揭问题”的办法，恐怕毛泽东是持保留态度的（这从夏天以后毛泽东所表明的态度中可以看出）。

针对国民经济的严重形势，陈云在会上提

出克服困难、应付非常时期的一系列重要办法，明确地把十年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大体上要五年）是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主张“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在目前是第一位的问题”。刘少奇还建议召开一次国务院会议，由陈云更充分地讲一讲经济情况和我们的方针政策。不久，经刘少奇提议，请陈云出山，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

在3月8日的财经小组会议上，周恩来是这样说的：“讲到经济形势，就应该说，目前财政经济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而且，有的困难我们可能还没有看到，没有预计到。少奇同志说把困难估计足够，比估计不足要好得多，就是多说一点困难，也没有多大坏处。”他认为，这几年由于瞎指挥和技术革命中的缺点、错误，使工业生产遭到一些破坏。从各种情况看，农业的全部恢复，可能五年还不行。“今年计划还需要大调整，是我向中央提出的。原来还想慢慢转弯，现在看来不行，要有个180度的大转变。如果说，过去是改良的办法，那么，现在就要采取革命的办法。当然，步子一定要踩稳。”

为取得毛泽东的支持，3月16日，周恩来和刘少奇、邓小平飞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中央财经小组会议等有关情况。毛泽东基本同意其他常委关于当前财经情况的意见和所采取的措施。3月18日，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回到北京，当天中共中央批发了陈云、李先念、李富春2月26日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的讲话，批示中重申：“我们现在在经济上是处在一种很不平常的时期，即非常时期。中央认为，在这样的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大力恢复农业，稳定市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

5月7日至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了毛泽东所说“中央小型会议”（常委工作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讨论《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为引起党的高级干部对困难形势的充分认识，常委们多次强调了困难的严重性。在解释“为什么说目前情况还很严重”时，周恩来

说：我们主观上的失误造成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后果，不是短时期能够消除的，只能逐步解决；还说：要做好工作，应该情况明，决心大，办法对。关这么多厂，拆这么多“庙”，精简这么多人，这件事情，在中国，没有哪个政权能够这样做，只有我们才有这样做的群众基础。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在经济上翻身，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惧。

邓小平在11日的讲话中明确表示：“当前工作中的问题我们还认识不够，有一些问题还要研究”。

会议作出全面贯彻执行“八字”方针和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的重大决策，决定进一步缩短工业生产建设战线，大量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切实加强农业战线，增加农业生产和日用品生产，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等一系列调整国民经济的措施。会议基本同意周恩来、李先念提交的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

会后，周恩来派李富春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会议的有关情况和中共中央批发中央财经小组报告的指示草稿。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等人在报告中提出的调整方针。但是，与西楼会议一样，这次会议毛泽东并未在场，会上过多地讲困难，恐怕并不是毛泽东的初衷。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是有分歧的，这也是后来周恩来作带有检讨性的解释的一个原因。

不久，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去东北，李富春去华东，李先念去中南，薄一波去华北，分别进行调查研究和督促调整计划实施的工作。

应该说，在中共领导亲自带头下各级、各方面所进行的调查研究活动，为党的领导机关了解实情、作出正确的决策，起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1962年是个极不平静的一年。就在这年的夏秋之季，印度军队不断向我进攻，中印边境形成“一个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的

局面”；班禅向中央写了一个反映西藏和其他藏区问题及群众疾苦的意见书（后来简称“七万言书”）；在困难形势下一些人产生了畏难情绪；“还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他们企图利用我们经济生活中的困难，进行危害人民的活动”（二届人大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甚至在一些地区出现了群众和党政干部之间矛盾尖锐对立的情况；……人们头脑中阶级斗争这根弦越绷越紧。渐渐地，人们又开始把视线由如何扭转严重困难的经济形势转向对阶级斗争的高度警觉。这是党内对形势认识出现较大反复的一个重要原因。

夏天，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8月6日，毛泽东在会议开幕时便提出三个让与会者颇费思索的问题：（一）阶级：究竟有没有阶级，社会主义社会究竟存不存在阶级？（二）形势：国际形势究竟怎么看；国内形势是不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三）矛盾：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有什么矛盾？以后，毛泽东又多次在中心小组会议上讲这三个问题。但毛泽东在讲到形势问题时，认为党内（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春天对国内经济的困难形势估计得太严重，是刮了一股“黑暗风”。毛泽东认为春天以来一些领导同志把困难形势看成一团漆黑了，使党内出现了悲观失望的情绪，发生了消极的影响。因此，在9月份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批评了“黑暗风”等三风，并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还强调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指导下决策重点发生重大的偏离，以至为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埋下了伏笔。

历史教训是极为深刻的。能不能认清形势，是能不能作出正确决策的前提。归根到底一条，是要彻底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走群众路线，理论联系实际。

（责任编辑 仲文）

# 1978年前

## 海峡两岸谋和足迹实录

● 杨亲华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溃退台湾的蒋介石国民党势力，与新中国为敌，直到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调整对台政策，宣传和平统一祖国的漫长岁月里，海峡两岸始终处于紧张对峙状态。然而，由于国共两党在“一个中国”的立场上具有某种交集点，致使这紧张对峙的寒流之中又不时涌出一股股国共秘密商谈、谋求再次合作的温温泉水，从而使海峡两岸的这段关系史，成为一段既有战争硝烟又有和平呼声的历史。

### 毛泽东点将，张治中受命作谋和试探

50年代初期是两岸军事对抗的时期，启开国共和谈大门的是中国共产党人。1950年3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国防研究小组组长、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批准，开始为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进行工作。1950年3月11日，毛泽东起草了《关于争取和平解放台湾问题给张治中的电报》。电文称张

“现正从事之工作（注：指张治中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为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而进行的工作）极为重要，尚希刻意经营，借收成效”。同年3月20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张治中，“同意”张“来京面叙”这方面的工作。

张治中在国民党军队中曾位至行营主任、集团军总司令、侍从室主任、政治部长和军政长官，军衔为陆军二级上将，行政上担任过湖南、新

疆两省主席，与蒋介石过从甚密。同时，他又与周恩来、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有着长期交往，曾为国共两度合作而出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曾代表国民党同中共进行过多次和谈，有“三到延安”之举，与中共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1950年，中共中央选择张治中作为进行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一重要工作的人选，无疑是非常恰当的。从现已披露的历史资料中，还无法



建国初期的张治中（左1）同陈毅在颐和园合影

知道张治中完成此项使命的具体情况 and 结果。但从上述电文可知，张与毛泽东在半个月中互通了4份电报。在张由南方赴京汇报时，毛泽东曾亲电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的叶剑英，为其布置沿途护卫，可见张治中肩负的使命之重要，以及中共中央对此举之重视。

差不多与中共进行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尝试的同时，台湾当局也开始了这方面的试探。这年初春，刚刚就任台湾“国际政治部主任”的蒋经国，突然召见曾任军统特工人员的高雄凯歌归饭店老板李次白。李为黄埔6期生，其妹李白文是中共高级将领陈毅的大嫂。陈毅时任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上海市市长。蒋经国对李次白说：“你和陈毅是至亲，可以深谈，最低限度，可以不进攻台湾”。6月1日，李次白由台湾乘海轮经香港抵上海。他到上海后，便通过妹夫陈孟熙（陈毅的大哥）引见，与陈毅见面。李次白向陈毅传达了“那边要求不进攻台湾”的意图后，陈毅并未正面答复，只是说：“至于台湾，让它烂下去！”陈的答复，可作多种理解。不久，朝鲜战争爆发。蒋经国遂于6月底通过“国际政治部”厅长、李次白的黄埔同学吴伟克发急信给李，通知停止和谈。试探国共两党之间刚刚起步的一点接触尝试遂告中止，两岸关系又经历了一段严峻的历程。

## 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提出

进入5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开始提出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1955年5月13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15次会议上作的《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中明确表示：中国人民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有两种，

即战争方式和和平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周恩来的讲话鼓舞着海内外的中国人。寓居美国的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在美国公开发表《对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一文，提出恢复国共和谈，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统一问题的建议。这个建议得到中共领导人的高度评价。

通过李济深的安排，原国民党中常委、李宗仁的贴身智囊人物程思远于1956年5月从香港秘密来到北京，与中共领导人谈国共合作问题。5月12日，周恩来在中南海宴请程思远。席间，周恩来就李宗仁的建议国共合作和中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政策等发表谈话。他说：李德邻（李宗仁的字）的意见很好，只有一条我不同意，他主张台湾非军事化，这怎么可能呢？就是台湾回归祖国以后，还是需要军队保卫嘛！周恩来提出：我们主张爱国一家，团结对外。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曾经两度合作，并肩作战，反对帝国主义。我们希望大家以民族和祖国的利益为重，国共两党重新携手团结起来，争取第三次合作。这是中共最早提出的国共第三次合作思想。周恩来特意请程思远向李宗仁

和所有在海外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转告，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我们赞成中国的一句古话：和为贵；欢迎包括李宗仁在内的所有国民党军政负责人来大陆探亲、访友、观光，我们将给予各种方便和协助，并保证他们来去自由。在此期间，中央还发出《关于加强和平解放台湾工作的指示》，并设立了中央对台工作办公室，有徐冰、罗青长、童小鹏、凌云等参加，周恩来直接领导，李克农、罗瑞卿具体负责。

## 曹聚仁的报道

1956年7月，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正气日报》主笔、总编、蒋经国的私人秘书曹聚仁来北京访问。16日，周恩来在颐和园会见并宴请曹时，进一步阐发了国共第三次合作的思想。曹试探地问周恩来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谈话究竟有多少实际价值。周恩来说：“‘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日战争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问题



1956年7月20日周总理（前排右三）欢迎李宗仁（前排左三）返国。周总理后着西装者为程思远

都可以共同商量安排的”。周恩来希望曹将此消息转达给台湾当局。1956年8月14日，曹聚仁在《南洋商报》上发表题为《颐和园一夕谈——周恩来总理会见记》的文章，公开报道了周恩来关于“第三次国共合作”的重要谈话。

## 蒋介石派宋宜山来大陆探风

在台湾的国民党集团对中共的和谈呼吁虽持消极态度，但为了摸清中共的真实意图，也作了一些谨慎的反应。1957年，蒋介石在台北召见当时在香港负责国民党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示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原则，决定派人赴北京刺探风声，了解中共是否以“和”呼吁为烟幕而对台湾用武，以便制定相应的对策。蒋介石还提出人选问题，即不拟台湾派出，应在海外选择。许孝炎当即提出三人供蒋介石选择：曾任“立法院长”的童冠贤、曾任“立法院秘书长”的

陈克山和“立法委员”宋宜山，蒋最终选择了宋宜山。

蒋之所以决定宋宜山，原因有四：第一，宋宜山对国民党一贯“忠贞”。宋早年毕业于南京国民党中央党校，后被派往美国留学。回国后一直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供职。国民党自南京退败时，宋任国民党组织部人事处长，可谓久经考验。第二，国民党退台后，宋任“立法委员”，身份较为灵活，官式意味较轻。蒋不愿派一名官式身份过重的人前往。第三，宋的亲兄弟宋希濂为国民党战犯，当时正在中共战犯管理所改造。宋北上万一被人发现，亦可以说是去那儿探亲。第四，宋宜山系湖南人，而当时湖南同乡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也在北京，对话比较方便。

1957年4月，宋宜山自香港经广州乘火车赴北京，当日即会见了唐生明。唐当时是受中共中央统战部委托出面接待的。第三天，按照周恩来的安排，唐生明陪同宋到北京东兴楼饭店餐。在餐厅里，周恩来接见了宋宜山，曾与之交谈。尔后由中

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出面与宋宜山具体商谈。商谈中，中共方面表示：国共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台湾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台湾政务仍由蒋介石先生领导，中共不派人前往干预；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对全国政务的领导，外国军事力量必须撤离台湾海峡。

宋宜山在北京期间，还参观了石景山钢铁厂、四季青农业合作社、故宫、颐和园，还去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探望了胞弟宋希濂。5月，宋宜山返回香港，根据北京之行的观感，写成15000字的报告，经许孝炎转呈蒋介石。报告除汇报了与周恩来、李维汉见面商谈的情况外，还叙述了北京之行的各种见闻，反映了中共治理下的祖国大陆呈现的勃勃生机。

但，正当国共和谈的步伐刚刚迈开时，中国大陆开展了严重扩大化的反右派运动。许多同中共有长期合作历史的朋友，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这不能不对海峡彼岸的国民党集团产生消极的影响。

##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与章士钊的香港行

1958年夏季，中共炮击金门的举措震惊了台湾当局和美国。美国加紧推行“划峡而治”的阴谋，与台湾当局“反攻大陆”的方针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这一矛盾反映了蒋介石对美政策的两面性和维护“一个中国”立场的民族性。为此，中共中央作出令世人皆惊的异乎寻常的决策：停止炮击金门，实行“联蒋抵美”政策，让金门马祖暂留在台湾当局手中。8月的一天，毛泽东接见了国民党派来了解情况的曹聚仁，并谈了话，有意将此意图通过曹转告台湾。曹在《南洋商报》上透露了此事。10月6日，毛泽东以国防部长



曹聚仁在工作

彭德怀的名义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向国民党当局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台湾危机。在此之后，又在公开场合多次发出呼吁，同时通过秘密渠道与台湾当局接触。

1958年10月，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的同时，中共中央采取了另一个行动，即请与国共两党高层领导均有私谊的章士钊沟通两岸和谈的管道。在炮击金门的硝烟尚未散去时，毛泽东就有了嘱托：请章士钊写信给蒋介石，把中共“联蒋抵美”的方针事先告诉台湾。章士钊欣然应命。章是国学大师，古文极好。这封信写得有特色。信中说：“溪口花草无恙，奉化庐墓依然”；“台湾金马，唇齿相依，遥望南天，希诸珍重”，毛泽东对这几句特别欣赏，但他认为把对台湾看作“南天”不恰当，后来改为“南云”。随后，章士钊又从北京来到了香港。章的香港行，立即引起海外传媒的各种猜测。港台许多报纸发表消息，称章士钊是中共的“和谈专使”，拟通过私人关系向台湾高层转达中共和谈的条件，言其所带条件有最低和最高两种，前者是暂时什么都不谈，双方先作有限度接触，诸如相互访问（官方或私人团体均可），通邮、通电，然后再通机、通航；后者则同意给台湾以类似当年陕甘宁特区的地位，可拥有自己的政府、军队、党组织，经费亦可由大陆负担，只要求台湾承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但是，台湾当局对此和谈条件没有做出积极的响应。

## 毛泽东评点蒋介石和台湾问题

1959年2月初，毛泽东在一次对省市委书记的讲话中谈到国共两党进行秘密、间接接触的情况。他说：“台湾是蒋介石当总统好？还是胡适好？还是陈诚好？还是蒋介石好。但是国际活动场合，有我们就

不去，至于当总统，还是他好。”“十年、二十年会起变化，给他饭吃。”让他去搞特务，搞三民主义。历史上凡是不应当否定的，都要作恰当的估计，不能否定一切，否定一切的结果，那是毁了自己。”蒋介石第三次连任“总统”，中共方面措辞表示赞成。周恩来通过张治中给蒋介石、陈诚写信，信的主要内容归纳为四句话：“局促东隅，三位一体，寥廓海天，不归何待”。希望他们团结起来。2月27日，毛泽东在会见摩洛哥共产党代表团时又说：“现在我们又讲跟蒋介石合作，他说不干，我们说要。合作共同反美，他不干，我们说有一天美国要整他，总有一天美国要承认我们，丢掉他。蒋介石懂得这一点，我们搞第三次合作，他通过秘密的间接的方法跟我们联系，公开不敢，怕美国，而我们不怕”。毛泽东还说，我们同台湾，谁也离不开谁，就像《长恨歌》中所说：“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蒋介石把枝连着美国，而美国却连根

都会挖掉。

中共所进行的一系列工作对台湾方面产生了影响，大陆和台湾的关系有了相当的发展。台湾当局的一个重要负责人曾表示，他们不再派人到大陆“进行扰乱公共安宁和破坏地方秩序的事”，并说，“进一步派人到大陆去谈谈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须的”。

1965年3月，陈诚病逝，台湾报纸发表了陈诚的遗嘱，这种遗嘱一般都要涉及到“反共反攻”的内容。而陈诚作为国民党的“副总裁”、“副总统”，其遗嘱既没有讲到“反共”，又没有讲到“反攻”。中共通过有关渠道反馈回来的信息谈到，陈诚要周恩来相信他的人格，他不会违背民族大义。也就是说，不会让台湾分裂出去，做民族的罪人。陈诚的遗嘱发表后，周恩来在政协民主人士会议上讲到这个问题。他说，从陈诚的遗嘱看，这是我们对台通气工作、传话、传信的结果，说明我们的工作有效果，有影响。



1964年章士钊在香港



## “文化大革命” 打断了两岸秘 密和谈进程

1965年7月20日，李宗仁毅然回国。这一举动给台湾国民党当局极大的震动。为了探听大陆中共方面对台政策的去向，1965年，蒋经国亲自到香港接曹聚仁秘密抵达台湾。曹早在1956年7月至10月，在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会谈后，曾多次与台北方面秘密联系，致力于商谈和平统一大业。瞬间已过去近十年。这次曹抵台的第三天，蒋介石在蒋经国陪同下接见了曹并开始磋商。经过几次商谈，谈妥了当时6项内容。这6项内容是：(1)蒋介石可借旧部回大陆定居，仍任国民党总裁，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2)蒋经国出任台湾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其他政务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3)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照美国支援数额补助；(4)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为4个师，其中1个师驻金、马地区，其余3个师驻在台湾；(5)厦门与金門合并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湾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6)台湾现任文武官阶、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准降低。

在日月潭谈妥的上述条件等北京方面认可后，台湾方面将派人赴大陆作最后商定。然而，此时，大陆开展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共对台工作实质上陷于停顿。这样，祖国统一的谈判遂告中断。从此，海峡两岸关系进入政治冷战、外交抗衡的时期。尽管如此，在“文革”动乱中，周恩来仍始终把对台工作放在心上。当他得知浙江奉化溪

口蒋介石母亲和他的毛夫人（蒋经国生母，抗战时被日本飞机炸死）的墓被破坏的消息，立即让童小鹏打电话给浙江省委书记江华，要他对红卫兵做说服工作，说明中国人历来将“挖祖坟”看成是最不得人心的事，我们不能那样做。周恩来还要浙江省派人将蒋家的墓地修好，并将修好的照片交章士钊带到香港转给蒋介石。

## 章士钊衔命再次 赴港，为两岸和 谈至最后一息

1971年9月，中国大陆发生了一件举世震惊的大事——在“文革”中红得发紫的“副统帅”林彪突然垮台。这一事件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同时也为中共对台工作展示了新的前景。1971年10月，中国进入联合国，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为进一步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减少了来自国际方面的阻力。在此背景下，中共再次向台湾发出和谈信息。

1973年5月中旬的一天，一架中国民航专机降落在香港启德机场。搭乘这架中国政府专机的不是要员，而是前国共和谈中曾为国民党政府代表的章士钊及家人。这件事本身就成了一个向台湾发出的强大的和谈信号，轰动香港。

92岁高龄的章士钊是在医生护士及家人亲属的陪同下，坐着轮椅被人抬下飞机舷梯的。章士钊此行说是探望他在香港的第三夫人，实际上是肩负着国共和谈的重要使命。在中断七年之后，大陆和台湾之间又将架起新的和谈之桥。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在谈到她父亲最后的香港之行时说：“到了最后那几年，父亲常常谈到他见不到国共和谈，

祖国统一是他最大遗憾。我感到他一生最后一个愿望是台湾的回归”。

从1972年下半年开始，章士钊常向身边的人提出去香港重新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尽他最后一份力量的念头。他要女儿向周恩来汇报。对此周恩来说：与台湾方面的对话，行老（章士钊字行严）去是再合适不过了。过去行老赴港做了大量工作，可惜后来中断了。但是，行老已92岁高龄，恐怕身体不允许作长途旅行了。

1973年春，毛泽东在一次会见时突然提出希望章士钊去香港促成国共和谈的事，并问章含之：“行老还有没有这个念头？”

章含之后来回忆说：“我一时不知如何表态，我确实很怕父亲经不起旅途劳顿，但看来主席支持父亲的想法。最后主席请总理考虑个周到的计划，送父亲去香港。此事实际上就按主席的意思定下来了。我转告父亲，他很高兴，说毛主席懂得他的想法。总理和我开始筹备父亲香港之行”。

章士钊到香港的第一天，就急匆匆地安排会见各方面的朋友。此时，他在台湾的一些老友如于右任先生都已去世。他正在设法接触与台湾国民党当局有密切联系的其他一些朋友。他对离港返京的女儿说，转告毛主席、周总理，他很好，正在联系各方关系，还说他在香港最多停留三个月。但是，冷酷的时间没有给章士钊留下三个月的生命。不久，他在香港溘然而逝。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第三次国共和作尚未实现，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解决台湾问题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新构想，却已经受到了海峡两岸广大人民的拥护与欢迎。中国的统一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责任编辑 萧 徐）

# 自然科学研究 盲目听命政治的教训

——荒唐的科研课题“粮食多了怎么办”

● 薛攀皋

1958年上半年，毛泽东多次在会上批评周恩来、陈云，说他们反冒进泄了六亿人民的气，是政治方向错误。于是拔白旗，插红旗，大跃进在全国兴起。大跃进突出一个快字，说高速度是灵魂，是压倒一切的中心环节。原来的指标不能用了，都得改。例如粮食，第二个五年计划原先定的是年产五千亿斤，一下子改成了七千亿斤。

在大跃进高指标的强劲压力下，全国一些农村开始虚报粮食产量、竞放粮食高产“卫星”。6月，一位著名科学家推波助澜，断言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离碰顶还远得很，稻麦的亩产量不会只是现在的二千多斤或三千斤，而是二千斤的二十多倍。入夏以后，虚报浮夸愈演愈烈，粮食高产“卫星”越放越高，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7月23日，《人民日报》公布全国夏收粮食产量达到1010亿斤。同月，农业部汇总各省、市、自治区上报的粮食估计产量竟超过一万亿斤。

## 毛泽东说：应该考虑粮食 生产多了怎么办的问题

1958年夏天，大跃进的形势使毛泽东无比兴奋。他在接待来访的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时，以非常欢畅的心情对赫鲁晓夫说：1949年我对中国解放是很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

为了亲自看一看大跃进的大好形势，毛泽东决定到各地巡视。8月4日，毛泽东的专列从北京站开出。他

要视察的第一站河北省徐水县，是共产主义试点。毛泽东要到徐水来，徐水县委早在一周前就知道了。徐水县委为此做了充分准备。

专列在徐水火车站刚刚停下，33岁的县委书记张国忠立即应召来见。在专列里，毛泽东详细询问并听取张国忠关于徐水的土地、人口、生产和实行劳动组织军事化情况的汇报后，提出要去看看农业社。

8月4日下午4时，毛泽东走下专列，换乘汽车沿着瀑河缓缓东行。张国忠与领袖同车，一路上他不断向毛泽东汇报徐水县的雄伟建设目标。4时30分，汽车到达大寺各庄农业社，毛泽东在会议室坐定后，问了麦收和秋季预产的情况，问了农业社的，又问全县的。张国忠说：全县夏收九千多万斤粮食，秋粮要收十一亿斤，全年粮食总产计划拿到十二亿斤。毛泽东听了不觉瞪大了眼睛，伸出厚大的巴掌像算帐似地说：你们全县31万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张国忠回答说，我们用粮食去换机器。毛泽东说：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个县的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粮食呀。这时大寺各庄农业社主任李江生说：我们拿山药造酒精。毛泽东说：那就得每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着那么多酒精呀！毛泽东笑呵呵地环顾围在身边的人。大家一时给领袖问住了，也跟着笑起来。县委书记张国忠只好笑着说：我们只是光考虑怎么多打粮食。毛泽东指示说：还应该考虑到生产了这么多粮食怎么办的问题。

毛泽东结束了对大寺各庄农业社的视察后，乘汽车返徐水车站。他提出的应该考虑粮食生产多了怎么办的问题，通过8月10日新华社发自天津的电讯和8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作家康濯的文章《毛主席到徐

水》，传向祖国四面八方。

谁会料到这样严肃的问题是根据如此严重虚报浮夸的数据提出来的呢！

## 中国科学院接受任务研究粮食综合利用的问题

领袖的指示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公开发布之前，已经由当时主管我国科学技术的一位负责同志以最快的速度传达给中国科学院党组。

8月6日晚，中国科学院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并讨论毛泽东的指示。会议主持人说：主席说钢铁产量要超过英国，粮食也要大大增产，过不了几年，全国人民每人每年有三千斤粮食，粮食多了怎么办？

8月7日下午，在中国科学院整风领导小组会议上，再次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会议召集人说：主席认为从现在起以后的七年时间很重要，要做到人家有的我们都有，人家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国内新问题是粮食多了怎么办？粮食多了要研究用途。

经过紧张传达、讨论，中国科学院党组把粮食综合利用的研究任务下达给六个化学和生物学的研究所。它们是在长春的应用化学研究所；在大连的石油研究所，即现在的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在北京的化学研究所以及在上海的有机化学研究所、生物化学研究所与植物生理研究所。

有些老科学家对粮食综合利用研究的意义和应用前景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这类问题在科学上是早已解决了的。道理是简单的，因为要把淀粉、蛋白质这样的大分子量化合物分解成相对小分子量的化合物来利用，是不合算的。世界粮食生产大国都不走用粮食转化为基本有机化工原料的路子。何况，他们对于我国是否真的粮食生产多得吃不完，持怀疑态度，对全国各地

竟放亩产粮食几万斤的“卫星”更难以置信。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老科学家的不同看法，是不可能充分发表和得到领导人考虑的。

因为这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下达的任务，而且这任务在当时是被视为具有重要的世界战略意义的——世界各国都着眼于从煤、石油、天然气等非食物性原料出发解决基本有机化学工业原料问题，只有我国独辟蹊径以食物性原料取代非食物性原料。

六个研究所接受任务后，停止了许多已经连续多年的重要研究课题，抽调了一大批研究技术人员，于8月25日同时正式启动了粮食综合利用的研究，围绕扩大粮食用途和利用粮食解决有机化学工业原料来源两方面的问题进行工作。

下面列举其中的一部分研究工作：

有的研究组研究粮食在转化为酒精后，以酒精制取乙烯。乙烯既是制备一系列合成产物的重要原料，又可提高酒精作为燃料的效率。有人认为如果把多余的粮食用于化学工业，我国基本有机合成工业将在两三年之内赶上并超过美国。他的这本帐是这样算的：美国生产的乙烯，百分之九十九是以天然气和石油加工产生的废气为原料的。1954年美国生产乙烯一百零六万吨，折合二十一亿斤。如果我们用一千亿斤薯类或四百亿斤玉米、小麦、大米发酵，可制得酒精一百亿斤，再用这一百亿斤酒精就能制成五十亿斤乙烯，几乎为美国乙烯产量的两倍半。他认为在两三年内赶超美国是可以做到的，因为用酒精制取乙烯的技术不复杂，每个专区，每个县都可建厂生产。然而，对于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却置之不顾了：美国是产粮大国，人均占有的粮食远远超过我国，他们所以不用食物性原料生产基本有机化工原料，原因是得不偿失。

有的研究组在粮食转化为酒精后，另辟途径，用酒



1958年“大跃进”声中，全国各地竟放“卫星”。图为安徽群众收割时搞“大呼隆”的场面

精制取丁二烯，或再由丁二烯制乙苯。丁二烯和乙苯都是制造合成橡胶和其他高分子化合物的主要原料。他们准备在当年国庆节前研究出从粮食到合成橡胶的一整套生产的土办法，并在当年年底建成示范工厂，为专区、县建立橡胶工厂提供设计数据。他们的设想是使我国农村在实现运输工具滚珠轴承化之后，再来一个橡胶化的技术革命。

有的研究组研究从丁二烯合成聚丁二烯橡胶、丁苯橡胶、聚苯乙烯塑料以及一系列含苯环的化合物。

有的研究组研究从大米中分离出淀粉，再以大米淀粉制造林产工业上应用的抗水性和抗拉性能强的胶合三夹板和木屑板的胶合剂；制造纺织工业上应用的、起泡力和乳化扩散力好的洗涤剂；制造造纸工业上应用的，使纸张拉力和抗水性能增强的涂料。此外，还试制淀粉塑料。为此，他们与当地蔬菜果品工业公司合作，进行制备大米淀粉的中间试验工厂。

有的研究组研究从粮食分离蛋白质，再用蛋白质来生产塑料和人造羊毛。他们在很短时间里研制出一种有棕色光泽的人造羊毛。

有的研究组则研究用发酵方法，从甘薯生产食用油和甘油，每百斤甘薯可得油八斤。他们同肥皂厂合作进行中间试验，期望找到适合农村用的发酵制油土办法。

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成果”，不幸的是这一切都是不实用的，不切合实际的。那么多人花了一年多时间，做了那么多工作，都是白费。

## “神话”破灭，科研目标大转向

1958年8月27日，也就是中国科学院六个研究所开始研究粮食综合利用之后的第三天，《人民日报》以通

栏标题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在《人民日报》提出这个雄伟口号的二十多天前，共产主义试点的徐水县县委书记张国忠就已经向毛泽东报告了亩产一百万斤山药的计划。从领袖到老百姓相信神话，又惟恐不信。全国几亿农民被迫投入了竞放粮食“卫星”的神话大战。

人们无视科学，违背自然规律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必然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中国人民不久之后就从小吃不完的美妙幻想中，一下子跌进了粮食紧缺、瓜菜代、浮肿病、饿死人的残酷现实里。1959年我国粮食实际产量已经大大下降了，但是在1960年1月中央在批准粮食部的报告上还说：当前粮食形势好得很。这时全国各地农村不少老百姓因缺粮少吃而浮肿，饿死人的事发生了，年轻的共和国步履维艰。

于是，粮食综合利用的研究无法再进行下去了，只得草率收场，而研究粮食少了不够吃怎么办的紧急政治任务，又提到了中国科学院面前。

中国科学院所属的二十多个生物研究所的数百名研究人员被紧急动员起来，研究怎么吃粮食以外那些本来不吃的、没法吃的东西，研究小球藻、叶蛋白、人造肉……各种代食品。直到农业生产秩序恢复正常、粮食供应情况有所好转，这些工作才停止。

领导者急躁冒进，把不可能实现的指标压下去，迫使基层弄虚作假把无中生有的数据报上来，而基层的虚报浮夸，又反过来影响了领导者对形势的估价并作出相应的决策，形成了恶性循环。直到全国各地成千上万人非正常死亡，才使人们头脑冷静下来。1960年7月，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开始了纠正反对反冒进，纠正“左”的错误的艰辛路程。

(责任编辑 洛松)



湖北麻城放“卫星”，吹早稻亩产三万六千多斤。硬说孩子们是在密植的稻子上跳舞

# 我国遗传学发展中坚持 “双百”方针的艰难历程

## ——记 50 年代初强制推行“米丘林学说” 在中国引起的风波(之二)

● 叶笃庄

编者按:本刊 7 月号,刊登了叶笃庄先生所写《一代遗传学宗师李景均何故去国》一文,从一个人的遭遇看 50 年代初强制推行“米丘林学说”在中国引起的风波(之一)这一段历史。叶先生在本文(风波之二)中将要论述这一段历史的全过程,这段历史给我国遗传学以至整个自然科学领域带来了什么影响,应该从中吸取哪些教训。其主要目的在于“温故知新,以史为鉴”,在学术领域里,一定要坚持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绝不能再犯过去发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实行全面学习苏联的政策。那时在苏联用非常尖锐的哲学批判和政治批判以及党的决定的行政手段,强制推行李森科所创造的“米丘林学说”,打压摩尔根学派。苏联的这种错误做法在 50 年代初期一度成了我国效法的榜样,给我国农业科学和遗传学造成了极大危害。因此,要阐明在我国的这场风波,就必须首先看看苏联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

### 一、苏联在自然科学领域内展开政治大批判运动

苏联 40 年代在自然科学领域内展开了大批判运动,批判自然科学中所谓“资产阶级的思想”。批判物理学中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是“唯心主义”的;批判化学中的共振论和中介论是唯心主义的、机械论的;批判控制论是“一种反动的伪科学”,是“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思想武器,而且是实现他们的军事侵略计划的手段”。此外对生理学、土壤学乃至天文学和数学都展开了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尤以批判现代生物学最为激烈,最为骇人听闻。

把农业科学和遗传学划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并对“资产阶级的摩尔根学说”及其坚持者施以无情打压和彻底摧毁的,李森科应是一个带头人。1935 年 2 月,他在全苏集体农民突击队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把以往的自然科学一律称为“资产阶级科学”。他说,“阶级敌人永远是阶级敌人,不管他是科学家或者不是科学家”。斯大林出席了这次大会,对李森科的讲话连声喝彩。由于斯大林的支持,此后他的政治地位日益提高,曾任最高苏维埃代表大会副主席,两度获得斯大林奖金,并获得苏维埃联邦劳动英雄的称号,1938 年当选为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李森科掌握了政治权力之后,便抡起大棒,横扫一切不同意他的错误观点的任何人。

李森科一伙为了树立一个“无产阶级的遗传学”学派,便拉出苏联果树学家米丘林这杆大旗,编造出一个“米丘林学说”,于是发生了所谓“米丘林学派”和“摩尔根学派”的论争。在学术问题上有争论,本来是正常的现象,也可以说,这是科学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但在苏联,自 1935 年以后,遗传学上的这场学术争论逐步人为地提高到“阶级斗争”的地步,并同当时正在全苏开展的“肃反”挂上了钩。曾任农业科学院院长的瓦维洛夫是全

世界闻名的大学者，却被报纸点名批判为“人民的敌人的帮凶”，1940年8月诬以英国间谍罪名而被捕，1942年惨死于西伯利亚的狱中。还有一些苏联遗传学家则丢掉饭碗，或被放逐西伯利亚，或被关到劳改队，或干脆失踪了。

为了彻底摧毁摩尔根学派，经过精心的策划，在斯大林亲自干预下，召开了“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1948年会议”。这次会议不是一次学术讨论会，而是假借学术讨论会的名义的“大批判会”。斯大林亲自导演了这场闹剧，或者说是悲剧。会议一开始，李森科就给会议定了调子，给摩尔根遗传学说扣了三顶大帽子：“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同时宣称“米丘林学说”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是“科学的生物学的基础”，“米丘林方向是唯一的科学方向”。会议事先组织好了“批判者”的队伍，在会上空谈马列，给“被批判对象”戴帽子、打棍子。强迫预定的“被批判对象”在会上发言，并对他们进行围攻，强迫他们发表声明，承认错误。

这次会议后，苏联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政措施，彻底铲除摩尔根学派并树立所谓的“米丘林学派”。苏联高等教育部也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行政措施：在高等学校中开除了一批反对李森科观点的教授和讲师，关闭摩尔根学派的实验室，取消摩尔根学派的课程，销毁教科书，等等。凡不同意李森科观点的工作人员都被撤销了职务，被剥夺了工作，甚至失去了饭碗。

李森科这样依靠党和政府的干预所取得的“胜利”其实对苏联科学事业是极大的危害。李森科派虽然压倒了苏联的摩尔根学派，但毕竟阻挡不了世界遗传学的突飞猛进。正当李森科猛烈抨击摩尔根学说、否认特殊的遗传物质存在的时候，西方科学家在40年代后期就发现了基因的有机化学实体——脱氧核糖核酸，简称DNA，这表明已进入分子遗传学时代。至70年代以后掀起了基因工程的热潮，再次说明孟德尔—摩尔根学说是经过实践检验和不断发展着的科学学说。

苏联的农业科学和遗传学与发达国家相比，出现了很大差距，并且导致了其农业生产也落后于世界水平。

## 二、在中国强制推行“米丘林学说”的第一波——北京农大事件

在中国提倡和推行“米丘林学说”的第一人是乐天宇。乐氏早年参加革命，1920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转为中共党员。1941年延安成立中国农学会，任第一届主任委员。1948年任解放区的华北联合大学农学院院长。1949年任解放后的北京农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8年秋，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望，迎接新中

国建设的任务，摆在解放区人民和共产党人的面前。正在这个时候，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苏联，在斯大林亲自支持下，大张旗鼓地宣扬李森科派的“米丘林学说”，极力打压摩尔根学派。乐天宇在它的影响和鼓舞下，在石家庄成立“米丘林学会”，并在他主持的华北联合大学农学院，大力推行“米丘林学说”，还陆续撰写了一些小册子宣传“米丘林学说”。1950年6月他在给中央负责同志的一封信中写道：“自从毛主席在延安号召生产运动起，我们自然而然地走入了米丘林生物科学的路线”，“感觉米丘林的工作及其理论能够解决生产工作中任何的困难问题，因此对莫尔干（摩尔根）的学说一天一天的证明为荒谬，毫无补于实际。”乐氏之所以如此相信米丘林学说，不过是因为它被苏联戴上了“辩证唯物主义”、“科学的生物学的基础”等多项桂冠，而摩尔根学说则被贴上“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标签。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一边倒”和“学习苏联”的政策，我国的教育界、科学界，特别是农业科学界和遗传学界无不受其影响，他们被强制学习苏联的“米丘林学说”，并按照这一“学说”改造自己的思想和改变课程内容和科研计划。乐天宇当上新成立的北京农业大学的第一把手之后，首先增设“新遗传学”（米丘林遗传学），列为各系学生的必修课，教学小组长由乐氏亲自担任。旧遗传学（摩尔根遗传学贬称）改为选修课。在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被扣上那些“反动的”大帽子之后，旧遗传学被迫停开。接着在1950年初，又决定停开生物统计与田间设计两门课，这三门课都是李景均教授担任的，他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愤然去国，详情已见本文上篇。

李景均被迫出走的事件引起了中央的关注。1950年4月，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写信给乐天宇，强调指出学术思想和政治要严格区分开来。5月，胡乔木找乐天宇谈话，当面批评了他执行知识分子政策的错误。6月5日，乐天宇写了题为《由米丘林莫尔干学说到团结问题》的报告送刘少奇，经刘批示后，送毛泽东以及朱德、陆定一。毛主席在这份报告上所作的批示是，“这个报告里所表现的作风是不健全的，乐天宇思想中似有很大毛病。”同时北农大森林系的助教马骥写了一封信，揭发乐天宇的过“左”行为，以及李景均被迫出走的真象。这封信后来转到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的手里，经他报送周恩来总理。周在这封信上作了批示后并送毛泽东、刘少奇、陆定一。周的批示是，“可考虑乐天宇是否适宜继续担任农大主委。”毛主席的批示是，“必须彻查农大领导，并作适当处理。”

正当中央着手解决北农大问题的时候，事态还在继续向“左”的方面发展，1950年10月爆发了“转系事件”。乐天宇提出把农艺、园艺、森林、畜牧四个系合并为

“生产系”，又把农化、植病、昆虫三个系改为“非生产系”，他亲自动员这三个系的学生党团员带头转入“生产系”，结果大批学生转系，造成学校工作一度混乱，而乐却认为“转光了也不要紧”，“改革哪有不痛苦的”。“转系事件”之后，10月中旬，胡乔木第二次找乐天宇谈话，严厉批评他“未执行中央的指示，不接受批评，阳奉阴违”，并令其“深刻检讨”。1950年11月教育部派调查组进驻学校进行调查，并写出调查报告，经上级批准，撤销了乐天宇的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调科学院工作。同时宣布北农大改行校长制。

由此可见，我国中央领导对此事的处理，采取了和苏联完全不同的方针。乐天宇虽然离开北农大，但没有动摇“米丘林学说”在该校的统治地位。中央教育部仍提出必须“坚持米丘林生物科学的方向”、“坚持米丘林方向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重要标志。”

在这里应该附带提一下，1951年，乐天宇调离北农大后，筹建并担任中国科学院遗传选种馆（即后来的遗传研究所）馆长。1953年为发展我国橡胶生产，乐天宇参加领导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的筹建任务，为发展我国橡胶生产，作了大量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乐天宇受到严重摧残，成为佝偻后，让他回到过单身生活在北京街道小厂工作的大女儿家“休养”。隆冬腊月，他的住室内竟没有火炉取暖！打倒“四人帮”后，他的冤案得到平反，1980年以79岁高龄带上补发的全部工资六万余元由北京回到湖南宁远县家乡自费办学，兴建九嶷山学院。建校初期，他以身作则，住破庙，吃粗茶淡饭，还把自己的离休费除留50元生活费外，其余的都交给学院公用。1984年突发脑溢血，在工作岗位上辞世。他的晚节，他的这种奉献精神赢得了后人的敬佩。

### 三、推行“米丘林学说”的热浪向全国展开

1952年6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作为官方文章，公开给摩尔根遗传学定性并号召对它彻底系统地批判，这还是首次。这篇文章对进一步在我国推行“米丘林学说”、打压摩尔根学派、维护“米丘林学说”的一统局面，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该文虽然点名批判了乐天宇的“非马克思主义倾向”、“恶劣的学阀作风”等错误，同时又强调“坚持米丘林生物科学是生物学上的基本革命”；并严肃指出“我国生物科学的现状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于是号召“发动一个广泛深入的学习运动来学习米丘林生物科学”，“彻底改造生态学、细胞学、胚胎学、微生物学……等生物科学部门。”统观全文，它不过是根据苏联的书本把李森科的一些牵强附会的论点复述一遍而已。

这篇文章是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同中国科学院在1952年4月至6月召集的三次生物科学工作者座谈会的总结。参加座谈会的有12个有关大学、科研单位以及行政部门的主要人员，其中不乏科学界的知名人士，如：竺可桢、张景铤、何祚庥、周家炽、钱崇澍、吴征镒、陈凤桐、乐天宇等。他们“基本上同意本文中的论点”。可以说，这是以政治力量发动这些知名人士推行“米丘林学说”的纲领性文件，由此可以看出那时推行“米丘林学说”即将进入热火朝天的阶段了。

### 四、请来了远方的苏联专家念“真经”

为了把“米丘林学说”全盘引进中国，我国政府请来了一批批苏联专家前来参战，传播道地的“米丘林学说”以及在苏联打压摩尔根学派的论战情况。苏联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院长、苏联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副所长、李森科派的主要人物斯托列夫首先应邀于1949年12月在北京农业大学作了关于“米丘林学说”与“生物学中论战”的讲演。跟着苏联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教授、李森科派的主将努日金来到北农大并到全国各地发表多次演讲，听众达十余万之众。北农大还出版了《努日金博士讲演集》，供作学习“米丘林学说”的材料。乐天宇认为：“斯托列托夫和努日金二人的演讲，对宣传‘米丘林学说’起到了很大鼓动作用。”1950年8月北农大又请来了苏联专家绥吉纳开办“达尔文主义讲习班”，系统地介绍“达尔文主义”与“创造性的达尔文主义——米丘林学说”。参加“讲习班”的学员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农业院校和师范院校以及其他生物学方面的教师和科研人员，这些人毕业之后，即成为在全国传播“米丘林学说”的骨干。1954年以后，北农大被确定为重点学校，又陆续请来了一批苏联专家前来讲学或工作，各专业几乎都聘请了苏联专家，有的被聘为校长顾问，北农大已名副其实地成了“米丘林派”的一统天下。

为了有系统地接受“米丘林学说”的传授，中央农业部特于1952年10月至1953年2月在北京举办大规模的“米丘林农业植物选种及良种繁育讲习班”，聘请伊万诺夫和杜伯罗维娜专家等讲授米丘林遗传选种与良种繁育学、达尔文主义等课程。参加这个讲习班的有全国主要农业科研机关、农业院校、中国科学院有关单位选派的农业科研人员和教员，共一千多人。这是开国以来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一次推行“米丘林学说”的举措。

中央农业部主办的这个讲习班结束后，各地也相继办起了类似的讲习班，进一步推行“米丘林学说”。例如，1954年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举办的“米丘林农业植物选种与良种繁育传习会”；1955年济南科联主办的“米

丘林学说系统座谈”，1954年沈阳农学院举办的“米丘林遗传选种讲习班”，1955年前后，广东省农业厅举办的两次“米丘林学说讲习班”，等等。于是，学习“米丘林学说”的运动便向全国热烈的铺开了。

## 五、摩尔根学派齐俯首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农业科学界和遗传学界的代表人物大都是英、美等国的留学生，有些人还在摩尔根的实验室里进行过研究和教学，他们回国后的研究和教学都是以孟德尔—摩尔根学说为依据的，他们的学术思想和李森科所代表的那一套学术思想是格格不入的。那时我国的农学院或生物系的有关育种学和遗传学的课程内容也是以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说为依据的，这些学校毕业生的此后工作也是根据孟德尔—摩尔根学说进行的。只有那么三五个人，四十年代在延安，后来在华北解放区，奉行李森科派的“米丘林学说”。因此，我国绝大多数的动植物育种工作者和遗传学者对于全盘照搬李森科的那一套，思想上十分抵触。但是，在全面学习苏联的政策下，在给摩尔根学派扣上各种政治帽子的压力下，他们不得不低下头来，照念李森科的那本经。正如北农大第一任校长孙晓村在1952年三反思想改造运动之后所说：“在三反思想改造中，许多教师都检查了自己对待学习苏联科学的态度。从而三反思想改造运动后，使米丘林学说首先在政治上占了上风。”

显然，我国摩尔根学派科学家们在那时不敢说真话，只能顺着讲违心的话，稍露对李森科论点有所不满，哪怕是持中间态度，也会遭到围攻。例如，我国植物分类学先驱胡先骕在《植物分类学简编》（1955年3月）中对李森科的某些观点或明或暗地进行了批评，就引来一场围攻。首先1955年10月中国科学院、全国科联联合举办米丘林诞生百周年纪念会，在这次会议上对胡先骕敢于顶撞“米丘林派”的首领李森科，进行了无情地批判。1956年2月，北农大举行全校第二次科学讨论会，在这次会议上也对胡进行了批判。有几位教授专题发言，批判胡在该书中“以公开的及隐蔽的方式或用改头换面的手法来宣传反动的唯心的魏斯曼、摩尔根主义”，批判胡认为“苏联政治干涉学术”的观点。同时，北农大还举行过“批判胡先骕思想讨论会”，一时胡先骕成了反面的“典型”。胡先骕的《植物分类学简编》出版后，北农大的六位讲助甚至写信给出版社，指责该书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要求停止出版发行！与此同时，在高等教育部工作的苏联专家竟然就此书提出“严重抗议”，说“这是对苏联的政治诬蔑”！

我国科学界元老竺可桢先生在这方面就比较有分寸。他去苏联访问时，曾与李森科会晤，他问李森科，“你

对物理、化学及生物化学怎样看法？它对你的遗传学研究有什么用处？”李森科答道，“我不需要这个，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从这里可以反映出李森科的学术水平。但竺老回国后，没有公开讲出来，只是在日记中作了忠实记载。

在那些年头，不仅没有学术争论的自由，而且也没有不表态的自由。人家都在大张旗鼓地大骂孟德尔、摩尔根，大颂米丘林、李森科，你敢缄默不语吗？不表态就是无言的反抗，谁敢这样干？！下面是我国农业科学界代表人物所作的公开“自我批判”。1956年召开了以“百家争鸣”为方针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他们当中有些人也发言了。两相对照，可以看出，他们的“自我批判”是言不由衷的。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细胞遗传学家戴松恩在1952年作了一次公开的书面“自我批判”，题为《批判我接受米丘林学说的抵抗思想和我所修订的“系统育种法”》，这篇“自我批评”刊登在《农业科学通讯》（1956年6月号）。此外，他还写过一篇大同小异的“自我批判”，题为《我对米丘林生物科学采取了错误的态度》。可能由于戴松恩在农业科学方面的地位，也可能由于这篇“自我批判”写得“好”，可以作为“典型”，所以连续刊登在《科学能报》（1952年7月），《生物学通报》（1952年8月），《农业学报》（1952年9月）。

他的这篇“自我批判”是在“党和群众的帮助下”，经过“几次反省”，才写出来的。我们这把年纪的人都经过当年的那种“帮助”的场面，可以体会所谓“帮助”意味着什么，那是在很大的政治压力下，在群众会上经过反复地“自我批判”，把大家的“批判”综合起来凑在一起，再写出最后的“思想总结”，以便“过关”。

1953年12月北农大选种教研组主任蔡旭教授和作物栽培教研组主任李竞雄教授，也在农学系全体大会上作了“检查报告”，全文刊登在《北农大校刊》上。小麦育种专家蔡旭的“检查报告”说，“过去中国的选种工作是全部搬用资产阶级那一套体系，孟德尔、摩尔根的那一套思想深深地束缚了我国选种工作者的思想”，“毫不隐讳地说，我们的工作是在旧体系下作的，因此在选种上就产生了一系列的错误与缺点”。我们知道，蔡旭在小麦育种方面有突出的贡献，但他所采用的育种方法，从来也没有脱离过“资产阶级那一套体系”，可见他当时在作“检查报告”时，不得不讲些违心话。

李竞雄是著名的植物细胞遗传学家和玉米育种专家，他是我国利用杂种优势选育玉米自交系间杂交种的开创人，但他在“检查报告”中也不得不违心地说“过去受摩尔根主义育种观念的毒害”，他还在《光明日报》（1953年4月30日）上发表过题为《加强学习苏联先进的米丘林生物科学》的文章。可是在50年代末他还是采



用“摩尔根主义育种方法”选育出首批农大号玉米双交种,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应用。70年代中期又育成多抗丰产玉米杂交种“中单2号”。李竞雄在“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上完全站在摩尔根学派的立场上批评李森科的那些观点,而且反对“把两个派生硬地调和”在一起。

这类例子真是很多,不胜枚举。在强制推行“米丘林学说”的强大政治压力下,摩尔根学派的科学家们不得不千篇一律地赞扬“无产阶级的、先进的、唯物的米丘林学说”,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唯心的摩尔根学说”,还得“把自己放进去”臭批一通。可是一旦政治压力解除之后,在“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上,科学家们就多少可以讲点真话了。由此可见,运用政治力量和行政方法强制推行一种学说,只准念一本经,只准说一种话,一定会给科学发展造成极大危害。学术本身的是非问题,只有学术界自己通过研究工作和自由讨论才能得到正确解决,党和政府领导不能也不应该对学术问题横加干涉,作出结论。

## 六、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前后

关于“青岛遗传学座谈会”,报刊上多有报导。最主要的有,《百家争鸣——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李佩珊等编,商务印书馆出版,1985年),这是1956年8月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纪实性文件,是一本研究那一段历史的必读之书,内容翔实丰富。《遗传学与百家争鸣——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追踪研究》(任元彪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也是一本重要文献。此外,于光远(当时中宣部的科学处处长,这次会议的组织者)的《陆定一和百家争鸣方针在遗传学中的贯彻》(《炎黄春秋》1996年10月)、黄禾青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1996年),以及其他有关文章都是值得一读的文章。关于这次会议,既有这样多的报导,所以本节只扼要地加以论述。

如上所述,我国从1952年秋季开始,摩尔根遗传学课程在各大学已基本取消;以摩尔根学派理论为指导的研究工作也全部被迫停顿;已有显著成就的杂交育种工作,也被视为“摩尔根主义的碰运气的方法”而全部中断。中学教材按照这一指导思想重新编写。学术刊物上只登李森科一派的文章。甚至在农业科学研究工作中发生过毁掉育种材料的事件。如四川农业科学院研究员鲍文奎从1951年开始的小黑麦多倍体育种的实验田在1954年被铲除,实验被迫停止。北农大蔡旭教授的小麦抗病育种实验田,1953年由于“不符合米丘林李森科科学说的原则”,禁止外宾参观。1955年对胡先骕的政治批判,反映了当时的领导思想。此后一段时间内,我国的生物学界再没有人敢于公开发表不同于李森科的学术见解了,那时是李森科派的一统天下。

1953年斯大林去世。1955年底苏联许多著名学者联名上书要求撤销李森科从1938年就担任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的职务,1956年4月李森科被迫辞职。与此同时,苏联科学院给李森科的对立者,摩尔根学派的著名科学家瓦维洛夫平反,并筹备出版他过去未能出版的大量著作。这一消息在我国报刊上发表后,引起了科学界的很大震动。

1956年,毛泽东主席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基本方针。接着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5月向科学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他说,“我们主张的百家争鸣是在科学研究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的自由,有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他还说“在某一种生物学或其他自然科学学说上,贴上什么‘资本主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之类的标签,例如说什么‘米丘林学说是社会主义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是资本主义的’之类,就是错误的,我们切勿相信。”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陆定一提出了要在遗传学领域开展学术讨论,为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提供一个榜样。于是经中宣部科学处会同中国科学院、高等教育部一齐研究后,决定在1956年8月在青岛召开遗传学座谈会,会前向各方面作了大量工作。这就是我国科学史上著名的“青岛遗传学会议”。

这次会议从8月10日开到25日。第一天和会议中间,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作了两次发言,他阐述了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重要性,宣布全部摘掉过去强加给摩尔根学派的各种政治帽子,强调学术工作要尊重科学事实,学术上的不同见解要通过自由讨论和科学实践去解决,等等。

这次座谈会约有130人参加,我国遗传学两派的主要人物(其实是三派,当时又滋生了调和派,即“第三方面”),如谈家桢、祖德明、戴松恩等都参加了会议。一共开了14次座谈会。按两派争论的焦点分成“遗传物质基础、遗传与环境的关系”,“遗传与个体发育”,“遗传与系统发育”,“遗传学的研究与教学问题”等四个议题来讨论。会上共有56人发言,曾受李森科派围攻、当年没有发言权的胡先骕一共发言8次之多!这是摩尔根学派的学者们第一次和李森科平起平坐,敢于表达自己的学术见解,打破了几年来我国遗传学界形成的一个声音、一个调子的“一统天下”。会议气氛热烈,畅所欲言。

会议开得相当成功,多数人认为这个座谈会对我国遗传学今后的发展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会后,几年来一直处于“挨批”地位的摩尔根学派的科学家们虽说同李森科派一样,享有教学、研究和出版著作的平等权利,但好景不长,1957年反右派运动之后,风云突变,政治空

气又紧张起来了。扛米丘林大旗的祖德明发表了题为《粉碎右派阴谋，坚决学习苏联先进农业科学经验》的檄文（《农业科学通讯》，1957年11月），农业科学界老前辈、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丁颖也继续发表反右派的文章，题为《坚定不移地学习苏联先进农业科学》（《中国农报》，1957年11月）。这样，反右派和学习“米丘林学说”、“反对摩尔根学说”又被连系在一起，学术问题和政治又被挂上了钩。

1958年，在一些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中开展了“拔白旗”运动。1960年，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普遍进行了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同时在前苏联，李森科又得到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的支持，再度上台掌权。在这样国内外政治大气候同步发生变化下，许多大学又掀起了批判摩尔根学说的高潮。武汉有一个大学组织了“战斗司令部”，由副校长领导，又把米丘林派和摩尔根学派置于两种世界观、两个阶级斗争的境地，一批摩尔根学派的教师们遭到了重点批判。1959年，一个政府业务部门的科研领导人竟然说：“在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上，米丘林失败了，要再开一次会批判摩尔根遗传学，来扭转局面。”

1960年，在学术思想批判中，全国各地又掀起了一次讨伐摩尔根学说的高潮。湖南农学院党委组织了120名教师和510名学生对该校遗传学教授裴新澍进行重点批判，贴了两万多张大字报。湖南医学院党委强迫遗传学家卢惠霖在500多名学生面前，承认自己的“资产阶级学术观点”。辽宁大学生物系党政负责人组织“红旗战斗队”，提出“相信摩尔根就是拒绝世界观的改造，就是不要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再有，在美国从事草履虫的卡巴粒研究的武汉大学赵保国教授，在“拔白旗”运动中被批得精神失常，等等。但是，由于中宣部负责人陆定一多次讲话，指出这样的批判运动是严重违背百家争鸣的原则性错误，事态才没有扩大。

到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几乎全部科学工作都停顿了，农业科学和遗传学自然也不例外，这次，两派无一幸免，都被批判“脱离实际”、“伪科学”、“跟着美帝（或苏修）的后面转”。蹲牛棚，坐喷气式，挂胸牌、戴高帽，比比皆是。譬如，祖德明虽然坚持“米丘林学说”的观点，但他是人所公认的好好先生，忠厚长者，也被大掴耳光，以致失聪。

打倒“四人帮”后，我国农业科学界和遗传学界的这场历时几十年的恶梦总算过去了，一切科研工作 and 教学工作逐渐走上了正轨。可庆幸的是，根据摩尔根基因学说发展起来的“生物工程”已在我国开花，初步结果了。而不可一世的“米丘林学说”高潮时期广泛报导的各种现象并没有获得任何严格的科学实验证实，现在几乎没有人再提什么“米丘林遗传学”了。事实证明，孟德尔一



本文作者在杭州

摩尔根学说是经过实践检验和不断发展着的科学学说，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将会看到，而且一定可以看到它会大放异彩，造福人类。

## 七、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由官方支持的、李森科挂帅的这场“米丘林风波”，在苏联从30年代闹起，一直闹到50年代李森科彻底垮台为止。而在我国，这场风波虽然在1956年“青岛遗传学会议”上已被指明是错误的，但此后20年里不断地发生反复，一直闹得“四人帮”垮台之后，才逐渐停止。这个事件虽已成为历史，但它给我们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至少使我们清醒地有以下几点认识：

一、首先应当向一问：李森科一伙够不够称为“学派”？所谓“学派”是那么一些学者，他们尊重既已存在的科学事实，按照科学的方法经过精密的科学实验，根据科学的观点，提出不同于别的学派的自成系统的一套理论。而李森科的那一套，在理论上没有实验的基础，在实践上经不起考验，他的结论也不符合科学事实。他只是靠政治力量的支持以势压人，才一时占了上风的。所以说，李森科一伙充其量只能称作一个“派”或者一个“霸”。如此说来，我们一向说的“两个学派之间的论争”就不存在了。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他们从来没有“论争”过，而是一派打压一派，既没有“论”，更不可能有“争”。明确这一点非常重要，“青岛遗传学会议”的精神之所以昙花一现，没有能够贯彻下去，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当时没有明确这一点。观看那次会议的发言记录，就可以明白，双方只是把国外的科研成果，而且不是最新

的,复述一遍而已,所以那也不能算作“论争”。真正“论争”起来,必须有自己的科研成果为依据才行。

二、科学有它的统一性,即世界性。希特勒喝的水是 $H_2O$ ,斯大林喝的水也是 $H_2O$ ,这是无可争辩的。科学应该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只要经济水平和文化水平许可,任何科学技术都可以通过本国科学人员的创造,或者通过国际交流,在不同国家中发展起来,不问这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如何。如果说“一边倒”的话,科学工作者只应倒向科学真理的一方,不论这个真理来自什么社会制度的国家。

三、科学的自律性。科学有它自己发展的规律,学术问题只有让学术界自己通过研究工作和学术讨论求得解决,运用政治力量和行政方法干预学术争论,如扣政治帽子、打政治棍子,甚至采用剥夺教学、研究和发表著作的权利等压制手段,只会阻碍科学的发展,甚至使科学倒退。党政领导人不能也不应该运用政治的力量对学术问题作出结论,干涉科学的自律性。

四、“五四”时代提出的“德先生”与“赛先生”至今仍具有其现实意义。陆定一提出的科学研究中的那几种“自

由”,即“百家争鸣”,需要政治上的民主来保障。中国科学院自然史研究所研究员李佩珊女士说:“学术讨论本身不是政治生活,但是,允许不允许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却属于政治生活范围,属于政治上的民主充分不充分的问题。”我认为这是正确的看法。

五、科学和哲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哲学的发展需要科学,同样,科学的发展也需要哲学,双方交互影响,促进了各自的发展。“科学的哲学”、“自然辩证法”就是它们相互交流的产物。但是,那种把名人语录、引经据典当作标签,然后请科学问题“入瓮”,就纯粹是教条主义了。这股歪风到了“文革”中的1972年在广东海南岛举行的全国“遗传育种讨论会”可谓登峰造极了。所有的论文几乎千篇一律地都是先引用一段《毛主席语录》,然后根据这段《语录》再发挥自己的意见。

总之,50年代强制推行“米丘林学说”这场风波,阻碍了我国生物科学的正常发展,拉大了我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其复杂曲折的历程不仅对研究中国现代科学史有价值,而且对我国整个科学今后的发展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 方实)

## 广告

# 攻克痴呆、多动症的新篇章

——记郑州市管城中医院痴呆、多动症科主任弓慧珍

无论患者和他们的家属在走进郑州市管城中医院之前的心情怎样无望沉重、痛苦焦虑,只要同该科主任弓慧珍大夫倾新交流一会儿,她那真诚关切的语调,便像三月的春风,不知不觉消除了患者三分病愁。

弓大夫就学于名牌医大,毕业后即从事内科和小儿科的临床工作。她目睹了痴呆给患者,特别是给患者家庭带来的深重痛苦,一个医务工作者的高度责任感,使她那颗善良的心一次次受到强烈的震撼,她暗暗立下雄心壮志,不管痴呆、多动症如何神秘顽固,也要把它们降服。她凭着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临床经验,涉猎了大量的中外医学典籍,全面了解痴呆、多动症的病因、病理和治疗方法,根据中医传统理论,博取古今众方之长,多次试验,反复配方。在有关专家的指导下,终于研制成功系列纯中药制剂,其中由西洋参、鹿角胶、龟板胶、紫河车、天麻、全蝎等十余种名贵中药材精制而成的系列方剂,具有填髓增智、健脑开窍、滋补肝肾、健脾益气之功效,可改变微循环,防止脑组织缺血、萎缩,对各种老年性痴呆及小儿大脑发育不全、脑炎后遗症等引起的痴呆、智力低下、记忆力减退、言语迟缓、流涎等症均有显

著疗效。

由西洋参、珍珠、沉香、龟甲、川贝母等十余种名贵中草药经科学加工精制而成的纯中药方剂,具有补心安神、镇惊定志、醒脑增智之功效,对小儿多动症有良好的疗效,且安全无副作用。

弓慧珍的研究成果受到医学界专家的高度评价;她呕心沥血撰写出的学术论文,在全国医学论文交流会上荣获优秀论文奖,并选编入《中华医学论文集》。

弓慧珍的成功,靠得是专心一意、锲而不舍。为了解除病人的不幸,这位风华正茂的现代女性,几乎弃尽了个人安逸。

“立在我心尖上的,永远是患者”,弓慧珍如是说。她的足迹也是这样记录的。

地址:郑州市城东路60号,管城中医院痴呆多动症科  
邮编:450004

乘车路线:从火车站乘3路、2路、29路到东门口下车即到

联系人:张靓 王国军 弓慧珍

豫中医广证字(1995)318号

# 读一篇文章想到一本书

——推荐《百家争鸣——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

● 李冰封

一

1988年2月，我到北京开会，于光远送我一本极好的书：《百家争鸣——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书名的副题是：“1956年8月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纪实”。此书是商务印书馆1985年11月出版，1986年7月再版。当时，因事繁，回湘后，只随便翻翻，未及细看。1989年离开工作岗位后，闲下来才认真把它读了一遍。对遗传学，过去粗浅地学了一些生物学知识，所以，这本书大体上还是可以读懂，读后颇受启发，当时就想写一点读后感之类的小文章，但囿于环境，没能写成。早两个月，在《炎黄春秋》1996年第10期上，读到于光远、李佩珊、黄青禾、黄舜娥的文章：《陆定一与百家争鸣方针在遗传学中的运用》（作者中的李、黄、黄三位，正是上面提到的那本书的编者），于是，想起还是要写点文字吧，好推荐那本极好的书。我以为，一切学术工作者，一切掌管宣传工作的党务工作者，大学、科研机关和出版部门的领导，出版社的编辑们，以及一切关心党如何正确领导学术活动的人们，都不妨翻翻这本书。我敢打保票，读后必有收获。当然，有些人可能至今仍不会赞成这本书，但不赞成也没有关系，开开眼界，引发思考，总是有好处的。

二

读这本书，我以为，可以先从书的附录读起，附录共64页，约五万字，是黄青禾1956年为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编写的内部资料，1983年6月校订。这份资料介绍了1935—1956年苏联生物学界三次论争的详细情况。

苏联生物学界的论争，始于打着“米丘林遗传学”旗

号的李森科学派和以瓦维洛夫为代表的孟德尔——摩尔根学派遗传学家之间的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瓦维洛夫曾在美国留过学，20年代初就创设了全苏农科院并担任院长，对苏联农业的发展，贡献甚大。他是国际上知名的植物遗传学家。在苏联，他还培养了一大批农学家，包括了李森科、齐津等人在内。1930年，苏联在哲学中开展反对德波林学派的斗争，生物学中对摩尔根学派遗传学理论也曾加批判，并被戴上“孟什维克的唯心主义”等政治帽子，这时，报纸上也批判了瓦维洛夫。到1932年，由于苏联纠正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简单化了的作法后，这次批判始暂告一段落。

苏联生物界第一次大论争是从1935年开始，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暂停。论争的主要问题是李森科关于遗传和变异的新观点和育种的新方法。两派的代表人物分别是瓦维洛夫和李森科。1935年，在苏联肃反扩大化的政治气候下，李森科开始给不同观点的学派贴上政治标签，并对他在育种工作中推广春化处理技术有意见的人，称之为“阶级敌人”，斯大林出面支持这种作法，且在公开场合，为李森科这类蛮横无理的讲话喝采叫好。斯大林这样做，在当时，当然有他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李森科也就利用了斯大林的支持，在学术讨论中打击对方。自此以后，在遗传和选育种讨论中的十个纯科学问题上，凡不同意李森科意见的，统统扣上“资产阶级”帽子。1937年，农科院一些工作人员被逮捕，报纸上点名批判瓦维洛夫。1940年8月，瓦维洛夫被诬为“间谍”被捕，于1943年死于狱中（后已平反）。这时，李森科开始反对在学校中讲授孟德尔·摩尔根学说。

第二次论争从1946年开始，到1948年8月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结束。这次论争正是二战以后，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批判资产阶级的部署的一个组成部

分。论争的直接起因，是李森科在战后发表了种内无竞争观点的论文，否定达尔文主义的基本原理，并在农、林业中相应提倡高度密植的穴播方法。由于在理论上缺乏根据，在生产上遭受严重损失，李森科观点受到多方批评。但在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的直接干预下，李森科学派还是取得了“全面的胜利”。随后，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消灭”摩尔根学派。摩尔根遗传学在学校中被禁止讲授，摩尔根学派实验室被封闭，摩尔根学派学者担任的行政职务及学术刊物编辑职务，都被撤销。在1948年8月的这次科学会议上，一些官员和李森科本人及他的学派中的所谓“科学家”，讲了许多出洋相的和蛮不讲理的话，读来颇为有趣。比如，有个叫做乌沙科娃的女士说：“在我们的大学里，教授联共（布）党史这样列宁主义的课程，而又同时教授摩尔根遗传学，这对于我们伟大的科学家们，是极端的诬蔑！”诸如此类语无伦次的发言，比比皆是。

第三次论争从1952年开始。直接起因是李森科公布了关于物种和物种形成的新观点，由于他所提供的事实材料不可靠而引起了广泛批评。1953年，斯大林去世，李森科失去了后台，这次论争导致1956年4月李森科辞去农科院院长职务。摩尔根学派在苏联遂又逐渐活跃。

不过，以后，由于赫鲁晓夫的干预，1961年，李森科重新担任了全苏列宁农科院院长，他又故伎重演，搞了1948年那一套“撤职”、“批判”、“封闭实验室”的玩艺儿。直到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遗传学界才恢复科学工作中的正常秩序。不过，这是后话。这份只写到1956年的资料中，当然没有涉及。

### 三

1956年5月，中共中央正确提出了在艺术和学术上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上文提到的苏联生物界在论争中由于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的错误干预，禁止了摩尔根学派的工作，从而导致苏联农业落后的教训，无疑是中共中央制定这个正确方针的依据之一。

陆定一在阐述双百方针的报告中指出：“我们主张的百家争鸣是在科学研究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的自由，有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他又指出：“我国的历史证明，如果没有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没有自由的讨论，那么学术发展就会停滞。反过来，有了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有了自由的讨论，学术就能迅速发展。”这些论点，无疑是双百方针的精髓所在。

1956年8月，在青岛召开的遗传学座谈会，就是在

全国首先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一个学术会议。参加这个座谈会并发言的有：童第周、竺可桢、于光远、谈家桢、赵保国、王德宝、施履吉、李继侗、盛祖嘉、方心芳、奚元龄、余先觉、王仲彦、陆星垣、沈善炯、梁正兰、戴松恩、李竞雄、周家炽、祖德明、李曙轩、娄成后、陈秀夫、胡先骕、方宗熙、吴仲贤、何定杰、张作幹、萧采瑜、李汝祺、陈士怡、杨允奎、过兴先、李璠、刘祖洞、武兆发、唐世鉴、罗士苇、崔继林、唐锡华、朱洗、庄孝德、张作人、陈世骧、薛德焯、林传光、曾呈奎、黄宗甄、夏镇澳……等共56人，从上列名单中可以看出，他们大半是在生物学或与其相关学科中，某一方面的研究卓有成就的学者，或杰出的党务工作者和行政领导。他们的观点并不一致，但在座谈会上就“遗传的物质基础”、“遗传与环境的关系”、“遗传与个体发育”、“遗传与系统发育”、“遗传的研究与教学问题”等方面，开了十四次会，都依据他们自己多年研究和实验所得，各抒己见，畅谈见解，也互相交流和讨论了不同的意见。他们谈的都是科学问题，从中表现出的，却是座谈会上政治的民主，学术的自由。与苏联同样性质会议上的发言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读后难免感慨万端。

读了这些发言以及于光远在会上的两次讲话以后，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在科学范围中的讨论，不要忙于去作什么结论，要作，应该由生物学家们自己去作。切切要防止行政力量对这种讨论作出干预，要避免用行政力量来代替学术界去作学术结论。

有人说：依你这样讲，不是要取消党对学术的领导吗？

不。这正是为了要加强党的领导。因为党对学术问题的正确领导，只能也必须是贯彻双百方针，提倡政治上的民主，学术上的自由，充分调动学术工作者的积极性，由他们在讨论中去发展学术，而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方法，把某个负责党员的意见，强加给学术界。党的负责人士对某一个学术问题与学术界人士有不同看法，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展开讨论，不能以势压人。党的领导正是体现在正确贯彻党提出的“双百”方针上，而不是体现在用强力灌输某一学术见解上。

### 四

由于1957年“反右派”的狂风劲吹，1956年提出的“双百”方针，实际上被停止贯彻了。所以，到现在，在社会科学各科的领域中，如何正确贯彻“双百”方针，尚无成功的先例可资援引。

有人问：在社会科学各科的领域中，能和自然科学一样地不要行政力量的干预、让有关的学术界人士去自由探讨、自由争鸣么？我以为，回答应该是肯定的。社



1956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会见参加编制《1956年到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的科学家们

会科学应该同样适合于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凡属于学术范围的问题，都应该如此。建国以来的事实证明，凡用行政力量干预的讨论，效果都不好，或完全弄错，或部分弄错，影响很坏。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孙冶方的经济学说、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胡风的文艺理论，只是一些突出的例子，其他这类大大小小的事例，不胜枚举。

改革开放以来，也还有一些似应引为教训的事例。比如，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就是如此。

从表面上看，这样的问题还是允许自由讨论，开始，报刊上也发表了许多各种不同的观点，意见纷纭，颇为热闹。但一等到某一位领导出来作出一个“总结性”的讲话后，就以这个讲话作为“争鸣”的结论了。虽然，以后仍有人著书反驳这“结论”，而且反驳得甚为犀利、精辟、深刻，但领导的结论还是结论，一切舆论一律以此结论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反驳的意见再正确，也只能作为异端了。这样做，行么？我看明显不行。

从社会的实际状况来检验理论，也可看出问题。比如，异化问题，领导的结论是“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异化”，事实果真是这样么？如今，有许多人民的公仆，变成了人民的主人，有的还变成了人民的蛀虫，这问题遂成为改革、开放取得进一步成就的很难解决的一大障碍。这不是异化是什么？如果当初尊重有些同志的正确意见，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不免也有异化，而及早采取措施，防止、消除异化，加强全体人民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今日的情况，或许尚不至于发展到如此地步。这只是许多例证中的一例而已，人们自可举一反三，深入思考。

## 五

还是回到遗传学讨论这件事上来。

从1956年到现在，又是40年过去了，在国际上，遗传学研究又有了突飞猛进的进展。李森科学派早已灰飞烟灭，孟德尔——摩尔根学派却大放异彩。历史的事实，科学的发展，确凿地证实了谁正确谁错误。在人民心中，瓦维洛夫是永生的，李森科只是历史瞬间的蜉蝣。我国遗传学近年的研究成果也证明了这一点。如，1997年元月报载，我国科学家洪国藩以及他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国家基因研究中心，在世界上首次成功构建水稻基因组物理图，这张水稻基因组物理图，标上了565个遗传分子标记，其中包括近100个通用的遗传分子标记。这些标记，在大麦、燕麦、玉米、高粱、甘蔗等主要农作物的基因组是通用的。因而，利用水稻基因组物理图不仅能够解开水稻的遗传信息之谜，而且能为大批农作物遗传育种提供所需的重要基因及有关信息，这对农业生产将产生重大影响。40年来，在世界各国，在遗传学研究领域中，诸如此类的成就，一定还有不少。我国的科学家、科普作家，如果有人有兴趣写一本1956—1996年的40年间遗传学发展状况的通俗的书，用千万万确的事实，来证明什么是真科学，什么是伪科学，也证明只有百家争鸣才是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这样，如果人们把这小册子，和上述推荐的那本极好的书一起阅读，无疑将趣味无穷。这对提高人们对科学的认识，对“双百”方针的理解，无疑也将起着重要作用。（责任编辑 吴明）

编者按：今年8月，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八七会议”的70周年，已96岁高龄的郑超麟先生，是参加这次会议唯一的健在者。作者根据郑超麟的有关文章，对“八七会议”一些不准确的传说，作了符合历史的说明，现发表供读者参阅。

# 郑超麟对八七会议史实的几点看法

● 林修敏 邱春玲

## 出席八七会议 唯一健在的代表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道，在法国哈金森工厂，父亲“开始了他生命中的一个巨大的转折点”。当年曾和邓小平一起住在木棚的王若飞、尹宽等人，生前没有留下有关这段生活的回忆，于是和邓小平在同一工厂劳动、同住木棚吃住的郑超麟先生，就成为邓小平哈金森工厂“巨大的转折点”唯一的见证人。

郑超麟于1922年在法国和赵世炎、周恩来等创建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去莫斯科东方大学读书，1924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早期中共党史上许多事件的亲历者，也是中共党史的许多事件的见证人，八七会议就是一例。

1927年8月7日，中共在武汉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这是中共党史上一次著名的会

议。当时参加会议的二十多名代表，都是30多岁、20多岁的青年人。70年后的今天，唯一健在的只有郑超麟一人了。

郑超麟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他虽然作为湖北省委的代表出席八七会议，但因为他是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代表除个别人不认识外，绝大多数代表他都是认识的。因此，对这次会议代表及发言情况等留下深刻的印象，几十年后仍历历在目。

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留下的文字资料有限。例如，在八七会议结束不到一个月，蔡和森撰写的文章中，提到了这次会议的意义及缺点，但对会议召开的若干情况，并未涉及。瞿秋白等也是如此。唯有郑超麟在1945年撰写的回忆录，对这次有名的会议进行了详细的记述，他提到了会址、会场、代表人数、发言情况和陈独秀未参加会议的这一事实。郑超麟自1979年7月以来，专门写八七会议的文章有3篇，这些文章都公开发表了。他还在这个时

期的通信中，多次谈到有关会议的情况。郑超麟为什么多次写八七会议的文章，又写得那样详细呢？他自己解释说：“我把八七会议记得如此琐碎，只为得还这次会议的真相，关于八七会议的传说是很多的，但都不合事实。”足见郑超麟撰写回忆文字目的之明确。

## 对八七会议若干史实的回忆

### 1、会址究竟在何处？

现在确定的武汉市汉口区鄱阳街139号二楼为八七会议会址，是1959年由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回忆定下来的，后来又经参加会议的李维汉、陆定一等的回忆、寻找，最后仍确定于此。有人说这是苏联驻武汉国民政府农民问题顾问洛蜀莫夫住的，也有人说这房子的主人是苏联妇女问题顾问洛卓莫娃。对会址问题，郑超麟曾多次对有关人员说：“你们是根据二位或三位出席会议的老人的回忆布置这个会址的，他

们找到这一排房屋是对的,但定在这一幢房子是错的,定在前楼尤其错。”

1945年,郑超麟写回忆录时,对会址就有所记述的。他写道:“会场在汉口俄租界一个西式公寓里。西式店铺旁边有个扶梯,走上去,一个外国人坐在前楼看书,不理我们。这是屋主主人,一个美国公民,曾写一本小册子关于中国革命的。我忘记了他的姓名。我们到后楼去,那里已经到了好多中国人。”郑超麟写这段回忆录的目的主要是记述八七会议情况,不可能对会址作详细的记述。到1979年以后,他对会址有过多次的回忆。他说:八七会议“地点在旧租界一条热闹街上(我忘了街名,记得与长江平行),下面是店铺,店门旁有个楼梯直通二楼。楼梯上有一条走廊,前楼房门开着,我看见临窗躺椅上坐着一个外国人,美国传教士模样的,门上铜牌刻着RANSOME(以后我在上海“中美图书公司”发现有一本RANSOME写的关于中国的书)及其他字样。会场在后楼。”郑超麟当时就在武汉,对汉口的街道应该熟悉些。他又通晓英文,所以对门上铜牌的外文人名,写回忆录时虽然忘了,但现在回忆起来了。这个细节很重要,几十年后,他还能记住当年开会的地点,和他当时看到门上铜牌外国人名是有关系的。写这篇文章的4个月后,他有机会对会址进行了实地勘察。就在当天,他专门写了篇《八七会议会址问题已经解决》的文章。文章开头写道:1979年11月13日上午8时去踏勘八七会议会址。然后写了寻找的过程,他说:“我沿街走到121号店铺,右边楼梯上去就是鄱阳路123号房屋,二楼后楼就是八七会议的会址……我们一行多人都到那幢已经布置好了的‘八七会议会址’休息和谈话,那里的门牌是139号。……我明白说:会址不在这里,而在123号;开会不在前楼而在后楼。”

文章最后说:“关于八七会议会址问题,就我方面来说,可以认为解决了。”他对为什么认定在123号作了说明,当年会议结束后,他又先后两次去过那里,印象比较深。他还解释了为什么不能在139号农业顾问苏联人住的房子开会:“我认为当时刚在南昌起义之后六日,借苏联顾问房子开会是不安全的,借美国牧师房子开会则安全得多。”他还说:“俄国顾问住所多半会被监视,至少我们自己应当作这样的估计。”这个结论是否正确,还需要党史研究者深入考证。

## 2、会场到底是什么样的?

郑超麟说:“真实的会场在今123号二楼后楼。现在布置的会场也不对,原来是一床,一桌,约十把椅子,现在没有床,又把桌子当作主席台,把椅子整齐排列,面向主席台,都不对。”郑超麟对会场详细描述:“我走入后楼去,那里已经有好多人坐着等待开会。后楼窗口摆着一张比普通写字台狭窄的桌子,后楼和前楼的隔墙边摆着一张双人床,床和桌子之间摆着几张椅子,桌子两端和前面也有椅子。人到齐了宣布开会。我清楚记得,桌子右端坐着瞿秋白,左端坐着一个身躯高大的俄国人(罗明那兹,第三国际代表),俄国人身边坐着罗亦农,我坐在桌子前面,床上后面坐着二三人,都盘着腿,前面床沿上也坐着几个人,其中一个毛泽东,另一个是李震瀛,床和桌子之间的椅子上坐着几个人。据我估计,大约有十五六人。这些人我都认识的,除了床上后面的一个陌生人外。”郑超麟对会场这样详细的描述,不仅要反映八七会议的真实状况,也反映了会议的主持人是谁、代表人数、是否有记录人员等情况。

## 3、会议是否有主席?

八七会议由瞿秋白主持,这是党史界共认的。这次会议的召开是仓促的,是否有主席,或谁是主席,

这并不十分重要。认为会议有主席的人,都说是根据会议记录来的。于是,这就又涉及到会议记录是当时记的,还是后来补记的问题。由于会议记录有主席,所以有的党史著作把主席也说成是主持人。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虽然没有写八七会议有主席,但却说“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一个紧急会议有两个主持人,这可能吗?

会议记录第一页记载罗迈(即李维汉)是会议主席。郑超麟在《三写八七会议》这篇商榷文章中,是作为一个专门问题来谈的。他说:“八七会议,如果有主席,那就是报告人瞿秋白为主席。瞿秋白宣布开会,介绍到会的人,接着就宣读罗明那兹起草的他前一夜才翻译的那篇《告全党党员书》,宣读完之后,他征求大家发表意见。”罗迈为什么不能成为会议主席呢?郑超麟以《告全党党员书》中有关农民包围长沙为例来说明。认为这是机会主义路线实例。马日事变后,长沙城被十万农军所包围,正当进攻的前夜,中央政治局的委员、湖南党部的指导者,下了一个命令取消进攻长沙的计划。这就是机会主义路线的具体实例。实际这是件不存在的事。这位指导者就是罗迈。国际代表不会让这位指导者担任这次重要会议主席的。我们认为这个“借助于推理”来说明罗迈不是会议主席是合乎情理的。会议是由瞿秋白一人主持的,这是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他犯“左”的错误也是从这时开始的。

## 4、会议有多少人发言?

《关于八七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说:“会上发言计五十六人次,发言有先有后,内容、语气一一记载清楚。”(《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第197页。)“报告”认为这是考证会议记录是原始记录的一个理由。

郑超麟在他的《回忆录》和后来



写的文章中，多次谈到会议发言情况。他说：“时间如此短促，发言的人又不多。”他于1980年写的文章中谈到发言情况时说：瞿秋白宣读完《告全党党员书》，费去了很长时间。“读完后，瞿秋白请到会的人表示意见。罗亦农首先发言……罗亦农发言后似乎还有几个人发言，但都没有给我留下印象和记忆。最后，毛泽东从床沿上站起来发言。他只说了几句，我忘记了说的什么，但罗亦农制止他说下去，理由是：我们现在很不安全，今天的会已经开得很久了，要快点散会。于是毛泽东坐下来。八七会议就此结束了。”发言虽然不多，但当时条件不允许长时间讨论。郑超麟说：“上午半天宣读了那么长的《告全党党员书》，再让五六个人发言，随后就通过……这个成绩已经很不错了。”会议记录记载发言的有五十六人次。我们假设，每个人次发言五分钟为限，这就需要4个多小时。作为一天的会议，显然是不可能的。正如郑超麟所说：如果根据那份会议记录，“则八七会议的各项议程的讨论，发言和通过，不仅一个上午的时间不够用，下午再开半天会也是不够用的。”会议记录还把每个代表发言语气都一一记载，这恐怕就更不真实了。会议只开半天，发言的也少，这应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 5、会议是开一天，还是半天？

据参加会议的李维汉回忆：“由于环境险恶，八七会议由上午到晚上只开了一天。”有的党史著作也认为“会议只开了一天”。郑超麟认为，“其实，一个上午会就结束了”。他进一步解释：“当时，形势很紧张，至少我们自己把形势看得很紧张。但如此重要的会议又不得不开，这是矛盾。”于是只好不拘形式，“会议开一个上午就结束了”。

#### 6、会议有无记录？

在中央档案馆现存有一份《“八七”中央紧急会议记录》，“调查报

一九七九年郑超麟赴汉考察八七会议地址（郑超麟处为132号）



告”认为这份记录是会议的“原始记录”，并举出五条理由：1、是当时保存下来的档案文件；2、记录是用的当时的纸张；3、记录的内容与会上形成的文件内容是一致的；4、记录的内容与蔡和森后来的记述也是一致的；5、记录共一万二千八百字，会上发言计五十六人次，发言有先有后，内容、语气一一记载清楚。对这份记录，郑超麟只看到第一页复制品。但他否认会议当时有记录。他回忆说：“八七会议没有记录，既无专人的记录，又无与会者的私人记录。当时会场只有一张两抽屜的长形桌子，靠窗放着，右端坐着瞿秋白，左端坐着罗明那兹，我坐在中间面向窗子，背对一张大床，罗亦农坐在罗明那兹的右边，不靠桌子。如果有记录，那就是我记的，我坐在桌子前面，我又是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记录，责无旁贷。可是我没有记录，别人要记录，也没有桌子可以依托，至于私人拿出小本子来记，现在在

此习惯，过去无此习惯，而且在当时的紧张气氛下也不许可私人记录。”既然这份记录不是开会时的原始记录，那么这份记录是哪里来的呢？郑超麟认为这份记录“显然是开会以后追补的。”他还说：“如果我能看到全部记录，也许可以从中看出何时补记的痕迹”。郑超麟在多次回忆八七会议时，没有一次提到自己是否发言。估计他没有发言。如果这份记录中五十六人次的发言有郑超麟，那么，他会更有理由来否认这份记录不是原始记录。郑超麟曾看到这份“记录”的复制品第一页，他说：“一行行的字写得整齐而清楚，几乎没有涂改的”。这意思是说，当时记录写的字不可能是这样工整的。这也说明是会后追补的。他在看第一页复制品时，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一页最上方有“‘八七’中央紧急会议记录”字样。今年二月当有人把这几个字告诉郑超麟时，他写信说：“你发现‘八七会议记录’上那几个字，

很好，足以证明我的话：这个记录是事后补作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召开会议时，绝不会称这次会议为“八七会议”。“调查报告”说记录共一万二千八百字，发言五十六人次，对发言人的内容、语气一一记载清楚。这不能证明是原始记录，恰恰证明是后来补记的。就算一天的会议，记录一万二千八百字，又不是用符号速记，虽然使用了大量的简化字，但也使用了许多繁体字，一天记这么多字，恐怕是不可能的。如果是半天会议，记一万多工工整整的字更是不可想象。如果是原始记录，代表发言的语气就没有必要记得清楚。郑超麟说这份记录是事后补记的，是有道理的，也使人信服。

## 如何评价八七会议？

八七会议后，8月12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通告第一号”，通告指出：“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在于纠正党的指导机关之机会主义倾向，给全党以新的精神，并且定出新的政策。”

对于这次会议的评价，当时党的领导人李立三，在《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的报告中认为“对八一革命以后的政策未能充分注意。如国民党问题、政权问题、财政与经济政策、外交政策，均未有明确的规定。至于指导的技术上，更是疏忽。”1928年召开的中共六大，在政治决议案中指出：八七会议“从根本上改正旧时机会主义的错误。因此，他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转变关键，他在使党布尔塞维克化的事业上，有极重大的意义。”同时也指出：“八七会议对于左派国民党问题还保存了些幻想，对于土地问题，还不大彻底”。对于这两个缺点，瞿秋白在1928年写的《中国革命与共产党》就指出来了。

八七会议的参加者蔡和森于1927年9月在《党的机会主义史》

著作中，肯定了“‘八七’紧急会议有非常伟大的历史意义”，还说“‘八七’会议未郑重讨论南昌暴动问题是一缺点。”周恩来在指出八七会议缺点时说：“‘八七’会议在党内斗争上造成了不良倾向，没有让陈独秀参加会议，而把反对机会主义看成是对机会主义错误的负责者的人身攻击……犯了惩办主义的错误。我认为这是主要的缺点。”

如何评价八七会议，郑超麟是不愿涉及的。他在1945年写的回忆录中只说：罗明那兹是第三国际派来接替鲁易的。他带来新的国际路线，叫中国同志接受，而且做成中国同志自己决议的形式。”他记不得新路线的内容，但却说，“没有主张退出国民党，是确定的。”后来的几次回忆中，对八七会议的意义作了如下的理解：“八七会议的意义，今天已经很清楚：共产国际的斯大林领导，要收回它过去给予中国共产党的旧路线，而改换一个新路线。罗明那兹这位国际代表奉命来中国完成这个任务。可是不能采取国际指令的形式来改换路线，必须通过一次中国共产党最高级会议的形式来改换路线。仿佛是中国同志自己觉悟，抛弃旧路线，而共同讨论采取新路线的。党的最高会议的决议，比共产国际的指令，对于中国党员群众来说，一定是更有权威的，在此情形之下，只要能够开成一个这样的会议，只要能够通过一个主要文件，上述那个任务就算完成了。”

郑超麟除了上面对共产国际有不满情绪外，对没有让陈独秀出席这次会议，引起他的关注。《告全党党员书》批评了中共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虽然没有指名，但一听就知道是批评陈独秀。“我当时认为把革命失败归咎于陈独秀是不公平的，但我没有说话。”陈独秀和瞿秋白都很重视郑超麟。八七会议不久，就调郑超麟到中央工作，随瞿秋白去了上海，实际成了中共负责人瞿秋白

的秘书。后来因为瞿秋白犯错误，李立三当了中央宣传部长，影响了郑的命运。到1928年年底，他离开了中央宣传部，如他自己所说“到此结束了我的党内工作的第一阶段。”

郑超麟参加八七会议，对其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应该通过什么方式来改变在中国的路线。当时做法是共产国际代表带来新的国际路线，要中国共产党接受，而且做成中共自己决议的形式。“事实上，许多同志到会时才听国际代表说出这路线”。当时郑的态度，他说：“表决时，我也举手；我是因为国际代表提出的，才举手赞成，并非因为深思熟虑这个决议案，由衷心认为正确的”。他开始怀疑共产国际过去的路线，因为新的路线“没有主张退出国民党。”他认为这是不对的。另一点对他有影响是没有让陈独秀参加会议。他说：八七会议时，“陈独秀虽在汉口，虽是中央委员，却不参加。这个会议正是为了反对‘他的’路线而开的。……中央委员陈独秀不被邀请来参加中央会议，——这一点，未曾有人解释过，也未曾有人问过。”

郑超麟说：“在莫斯科，我们谈到中国共产党中央，谈到党的领袖，心目中只有一个陈独秀。”在莫斯科留学的革命青年，对陈独秀是很崇拜的。1927年7月陈独秀辞去了总书记的职务。八七会议后，“瞿秋白和罗亦农二人对陈独秀还是很恭敬的”。陈独秀虽然不是总书记，但还是中央委员，八七会议这样对待他，郑超麟在当时那种形势下，他又能说什么呢？

八七会议和郑超麟形成了一种特殊关系。研究八七会议不能不研究郑超麟。总结八七会议前后这段党的历史，会得出许多有益的经验教训，无论对历史和现实都是十分有意义的。

（责任编辑 仲文）

# 在粟裕身边 十四年片断回忆

● 鞠开

今年8月10日,是当代杰出的军事家,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家粟裕诞辰90周年。他的军事天才和赫赫战功已载入史册,广为人知。我这里记述的虽是我随他工作14年中难以忘怀的几件具体事情,然而它展示给我们的是粟裕那永远令人怀念的高风亮节。

## 他没有回过一次老家

粟裕是湖南会同人。1926年离家出走到常德师范读书,1927年投笔从戎,5月来到武昌参加叶挺领导的24师教导队,6月由共青团转为共产党员。以后参加南昌起义。从1926年一直到1984年逝世为止,他没有回去过一次老家。战争年代的那种特殊情况,不允许,可以理解。解放后,情况变了,环境许可了,他应该回去一

下,他也没有回去。到广东,几次往返路过长沙,他也没有专程回去看一下。1956年、1959年我两次随他到了长沙,问他:“首长你怎么不回家看一下。”他说:“回去干什么?不回去了。”这使我想起一段往事,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后,3月底他率三野指挥机关,到我的家乡附近泰州塘湾区白马庙宿营,当时渡江战役准备工作十分紧张。一天他对我说:“你家不是距这儿不远吗,你回家看一下你的老妈妈。”我说:“马上就要渡江了,那怎么行呢?”他又说:“时间来得及,给你三天时间,明天就走,路上注意安全,速去速回。”

正当母亲望儿望得眼睛欲穿的时候,我突然出现在她面前了,她哪里想到儿子真的回来呢?她悲喜交集的眼泪直往下流。倾诉了我们北撤山东后,遭还乡团摧残的情景。大军南下,打听不到我的消息,以为我牺牲了,这一下她老人家放心了。归队后,粟裕说:“你回去就对了,安了一个母亲的心。”

粟裕为什么不回家看看,是一点时间也抽不出吗?不是,他将他的全部精力用到工作方面去了,用到国防建设、军队建设方面去了。他没有衣锦荣归的思想,这恐怕是他不回去的又一原因。他对自己是这样的苛求,对别人是如此的关心、体贴。

## 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

粟裕在使用干部上,一向任人唯贤,承认山头,不拉山头,不封官许愿。

1947年1月,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合并,成立华东野战军。原则上,山东干部任正职,华中干部任副职。陈毅任司令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谭震林任副政委,陈士榘任参谋长,唐亮任政治部主任。刘先胜、张元寿任副参谋长,钟期光任副主任。只有参谋处长是华中的干部。为了照顾山头,又将华中的夏光调出,将山东的王德提升为参谋处长。这时,下面有些议论,想不通,他总是做说服工作。他说,毛主席说过,不垒山头,要照顾山头,这是历史形成的,要按毛主席指示办,不要有什么意见。



粟裕(中)1961年2月  
在崇明岛视察时与作者(右一)在一起

张震原是新四军四师彭雪枫师长很得力的参谋长,参谋业务相当熟练。后来当了粟裕的参谋长,帮助粟裕出了不少好主意。在解放战争,尤其到了淮海战役,表现尤为明显。50年代初调总参任作战部长,在作战方针的制订,在国防建设、军队建设方面,也是帮助粟裕总参谋长出了不少好主意,是十分称职的作战部长。可是,对于这样一位好部长,竟然还有人有意见,粟裕从大局出发,忍痛将张震调出了,先到志愿军24军任代理军长,后到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留在军事学院当了副院长、院长,再也没有回来。

根据我的了解,他没有许诺过任何人干什么。相反,如有人对级别待遇、军衔有什么意见,总是要其正确对待,不要计较个人得失。他就做过原华东军区装甲兵司令何克希同志的工作。何评了少将,嫌军衔低,到北京找他。他说,我们革命不是为了升什么官,我们都是幸存者,能过上今天的这个生活,就很不错了。通过首长这么一做工作,何的思想也就通了。

## 不喜欢前呼后拥

人员精干是粟裕的一贯思想。他一向不愿

身边配很多人,战争年代如此,解放后更是如此。人越少越好,最后连随身警卫员也取消了。按他的要求,一个人要顶两个人用,一人甚至顶三个人用。驾驶员就是警卫员,炊事员就是上士。出差时带的人更少了,除了秘书外,警卫处想派个人路上护送一下,他都不准。这时的秘书就身兼三职,既是秘书也是警卫员又是公务员。因此他生活上有些具体事秘书想去帮他干,他也不愿意,都是自己干,如洗衣服等等。他为什么这样严格要求自己呢?他有一个想法,他说,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勤务员,为自己一个人配好多人服务,不合适。正是因为他身边配的人少,所以他一直保持了老红军艰苦奋斗的老传统。

在他的这种思想指导下,他除了讨厌身边配很多的人外,外出参观时也不喜欢身边跟很多人,兴师动众。为这样的事,我受过他严厉批评。1954年4月他在宁波视察工作,刘晓、唐亮、舒同等领导同志也在。有一天,他们要去参观工厂,上午8点出发。在市委领导同志陪同下,首长们在前面走,随员们在后面跟,走走,走走,粟裕突然向后看了一下,发现后面浩浩荡荡一大群,他不高兴了。问鞠开呢!有人说在后面,我赶快到前面去问什么事,他说:“怎么搞的,后

面跟了这么多人，目标多大，影响多不好。”我说，我也不知道，他说：“你是干什么的。”我觉得批评有些委屈，心里不大痛快，回来后，他知道批评有些过火而且这么多人也不是我的问题，就对我说：“今天错怪你了。”我为首长有这种自我批评精神所感动。我的气也就消了。今天回想起来，他的这种不喜欢前呼后拥，照顾影响的思想是对的，而且还应该发扬。

## 同人民群众心连心

泰顺是浙江南部一个穷困山区，同福建省的寿宁县交界。30年代，粟裕率挺进师在这儿打过游击，同那里的干部、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一直怀念着那里的人民。解放后，整天忙于工作，想去也抽不出时间。1960年他生病了，在上海养病，不顾病魔的缠身，不顾沿途的劳累，从上海出发，长途驱车，路经杭州、温州到了泰顺，看望那久别重逢的泰顺人民。

到泰顺后，他没有进房子休息，在县委书记于奉图的陪同下看了县城的市容、街道、商店、工厂、学校，去了烈士陵园。天黑了，才进屋吃饭。他看到桌上摆了酒，他说，我不会喝酒，你们把酒收掉。他是勤俭过日子的人，事先给县里打了招呼，没有敢搞多少菜，算是一顿便饭吧。吃了晚饭，劝他休息他不干，要听县常委的汇报，他的这种不知疲倦的精神，令大家钦佩。会议开始时，他首先声明，我不是来作指示的，主要是看望大家，尤其要看望山区红军医院刘宝生等，另外，再请你们谈谈泰顺解放后全县各方面的情况。会议开到深夜12点结束。看了市容听了汇报后他心里十分沉重，不是滋味。

县里没有一个条件比较好的招待所，临时想了个办法，从县委办公楼临时腾出两间房子，作为他休息用。没有卫生设备，临时找了个马桶供解手用，他不是对这个有意见，而是他看见房间内的家具、被褥、洗漱用具等全是新的，他有意见了。找我去问情况，怎么都是新的呀？我说：他这儿没有一个条件比较好的招待所，连卫生设备也没有，这是临时布置的，所以都是新的。他说：“那不行，泰顺本来就穷，解放十多年了，

面貌依旧，变化不大，尤其是山沟里，好多人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有的一家人轮流合穿一条裤子，有的人家轮流合用一个碗，你们想，我睡在这样的房间，心里能安吗？把房间里这套新的全撤了，送回商店，换一套旧的被褥用具，否则，我就不睡。”县委书记劝说，还是不行，只好按照他的意见换来旧的他才入睡。

临别时，他怕县的领导不高兴，还作了解释说：“我不是有意弄得你们为难，使你们过不去，目的是想通过这件事，使你们的心同贫苦的人民群众的心紧紧连在一起，利用山区的优势，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使大家有饭吃有衣穿，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 “叶帅你放心 我不会倒下去的”

1958年，是我们国家、军队多灾多难的一年，“三面红旗”，弄得民不聊生，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左”的路线对军队冲击也不小。

为了批所谓的教条主义，当时的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会议从5月27日开始到7月22日结束，前后用了将近两个月时间。采用“四大形式”，先批刘帅的所谓教条主义。这时刘帅在南京生病，通知他带病到北京参加大会，逼他在会上作违心的检讨。检讨了，还是抓住不放，毛主席为他说了话“差不多了”，才使刘帅解了围。同时遭到错误批判的还有萧克、李达等。撤销了萧克训练总监部部长职务，让其脱下军装转业到农垦部，担任副部长的职务。其实批刘帅、萧克等人的所谓教条主义是没有道理的。因为顾问、专家都是上面请的，教学方针是上面确定的，教学大纲是上面制订的，怎么能完全怪到刘帅、萧克他们身上呢？这不是冤枉他们吗？有的文章说，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点了萧克、粟裕等同志的名，那是不符合事实的。那不是点名，而是用“四大形式”，大会小会，大字报小字报批判，火力够猛的，纲上得够高的了。明明是错误地批判，那里是什么点名呢？

到了6月中旬，会议转入第二阶段，情况

就更不一样了，范围扩大了，从军以上扩大到师以上，从几百人一下子扩大到一千多人，矛头直指粟裕。也是采用“四大形式”，小会大会相结合，小字报大字报相结合，对其进行错误地批判，直到7月22日结束，逼他在会上作了三次违心的检讨，集中批他所谓的极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以及其他莫须有的罪名等，连“七战七捷”的苏中战役、豫东战役，也加以批判。很难想象，公而忘私，毫无私心的粟裕，会有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从道理上说不过去，从逻辑上也是说不通的。粟裕的这种高尚思想品质同那些以权谋私、闹各誉、闹地位的可耻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粟裕的为人究竟如何？没有什么比粟裕的两让司令，这种铁的事实，更能说明粟裕的为人了。在一个很长时间里，不少同志为粟裕的问题想不通，认为批他冤枉，所有人的问题都平反了，连“地、富、反、坏、右”帽子也摘了，唯有粟裕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一直拖了36年，大家心中不痛快，所幸的是在他逝世十周年这一年，在中央军委的关怀下终于得到了解决。刘华清、张震两位副主席代表中央军委，以文章的形式，于1994年12月25日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上，为粟裕公开平了反。使活着的人心理上得到了平衡，使九泉下的粟裕得到了告慰。

粟裕遭到错误的批判后，精神上遭到了如此沉重的打击，我心想他一定吃不消了，情绪一定会低落下去了，所以我一直注意观察他的情绪。事实上，他的情绪和批判前没有什么两样，平时的言谈话语也没有看到流露出什么不满情绪。总参谋长的职务撤销后，他9月16日就召集总参各部部长开会交待工作，9月19日就到军事科学院向叶帅报到去了。叶帅先召开常委会欢迎他。叶帅对粟裕一向很信任、很器重、很尊重，他不把他当副院长看待，都叫他粟总，在会上鼓励他要振作精神好好干。粟裕说：“叶帅你放心，我不会倒下去的。”以后叶帅又开全院大会欢迎他，并宣布日常工作由粟裕主持。

欢迎大会开过后，粟裕不负叶帅重望，立即投入了军事科学调查研究工作。住地距机关

较远，他还是坚持早上班晚下班的好习惯。先在机关搞调查研究，后下部队搞调查研究，祖国的东、南、西、北、边防、海防、山山水水，他都跑遍了，都有他的足迹。给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写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报告，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有独特见解的建议，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好评和肯定，为军队建设、国防建设、为现代战争条件下战略方针的制定作出了重要贡献。长期的革命战争，使他积劳成疾，精神的创伤，导致了他健康状况的恶化。然而他不顾这些，他一直带病坚持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 珍贵的座右铭

粟裕对我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是十分关心的，既有鼓励，也有批评。我的主要毛病是有自满情绪，自以为了解得多、看得多、懂得多。所以他经常敲打，提醒我这个问题，要我注意克服。但一遇适宜的土壤，又有所抬头，他又敲打说：“你这个人主观性很强，自以为是，不大听进别人的意见，你要注意呢。”

1962年2月，他决定我到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临行前，找我谈了话，肯定了优点还指出了上述毛病，勉励我好好学习。请我吃了临别饭，送我一个精装日记本，借用古人一句话，在扉页上挥毫题写了“学而后知不足”五个字的座右铭。我知道，是针对着我的毛病写的，要我好好学习，题得好，针对性太强了，意思是说，你不要认为现在还可以，学过以后你就知道自己不足了。但当时，还没体会到这个深度。

到了政治学院学了一年半，学了马、恩、列、斯、毛的经典著作，学了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学了军事、战略、战役、战术，这时，也只有在这时，我才豁然开朗，恍然大悟，才体会这个座右铭的真实含义。我知道的，了解的东西太多了，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自满的地方。从此，粟裕送给我的这个珍贵的座右铭就成为我不断前进的动力，一想起它，全身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责任编辑 一尘）

# 何思源

## 花甲之年入藏考察

1956年春夏之交,60岁高龄的全国政协委员、原国民党北平市长何思源意外地获得了一次终生难忘的经历。

在全国政协一次座谈会上,何思源获知中央正在组织一支规模宏大的代表团,参加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大会,会后还将在青藏高原开展慰问活动。代表团团长是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何思源欣喜异常,立即致函他早年在法国时的同学陈毅。信中他自称:“……我少年习武,有飞檐走壁功夫,如今虽年过花甲,但身体很好,可以爬山涉水……”老先生恳切地“请陈副总理批准能够荣幸地加入中央代表团这一光荣行列”,“那怕当一名工作人员”。不知是感于何思源的诚挚,还是念及老同学的旧谊,陈毅在请示周恩来总理之后,即让秘书复信,表示应允。

多少年来,在何思源心中,西藏就像一个诱人而神奇的梦。30年代,他在山东任国民党的教育厅厅长时,读过一批关于西藏自然地理、经济文化、社会风俗的书籍,但那多是外国人写的,大都把西藏描写得如何如何神秘,如何如何不适于人类居住。他阅读愈多疑问愈多。他想:“既然西藏有那么古老的文化,又吸引那么多中外人士前往,一定有她的诱人之处,一定蕴藏着丰富的尚待开发的宝藏……”他暗暗立下志愿,只要有会,无论如何也要登上那片神秘的大高原。就在他年满60岁的这一年,谁能料到机会果然来了!

出发前,他还有个宏大的计划:编写一部“西藏志”。因此,除了必要的衣物外,他还是尽其所能地带了好多的日记本、地图册、各种资料和书籍。此外,他还专门买了温度计、气压表和血压表带在身边,因为他从未忘记“他要去考察”。

### 实地考察纠谬误

1956年3月16日下午,陈毅率领中央代

代表团乘专列由北京出发，计划分别在西安、兰州、西宁三处参观、学习、休整和适应高原气候一段时间，4月初即踏上青藏高原。

这个代表团确实够庞大的，总人数为八百余人。这是自汉藏民族建立关系一千三百多年以来，第一次有这么多民族这么多人数的中央代表团前往西藏。

何思源除了随团慰问各族人民外，他给自己内定了两条任务：一是完成“西藏志”，二是考察西藏地区自然地理，为开发新西藏做一点力所能及的贡献。

那天早上，何思源活动完身体后，双手交叉在胸前，默默地注视着西宁城西南巍巍的雪峰，突然冒出一句：“帕米尔高原肯定不是世界屋脊。”

何思源思忖着：亚洲的许多大山，如天山、昆仑山、喜马拉雅山等，可以从帕米尔起算，地理学家就称此处是群山的“结点”，山脉的“总汇”。但是，无论是从高地的面积和高度来推算，还是从山峰的数目和海拔来分析，帕米尔都不如我国“青康藏高原”，它海拔高度平均在4000到5000公尺，面积230万平方公里，而帕米尔高原面积不过几万平方公里，东边最高处平均海拔不过3700到4200公尺，怎么能称为“世界屋脊”呢？

他是有感而发的。他对那些外国人在书里称帕米尔为“世界屋脊”很不服气。在西宁市，他频频走访当地的专家，查阅地方志，同代表团里的科学家们切磋。他认为，凡外国人对西藏地区的错误判断都必须纠正过来，以后的三个月里，他大部分时间用在这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和珍贵的数据，并在以后他的专著中进行了严谨的论述。

这支由212辆车组成的庞大车队终于轰轰烈烈地开上青藏公路，浩浩荡荡地朝拉萨市进发。只要车一停下，他总是抢先下车，把温度计、气压表拿出来实地测量，再抓一把黄土或岩沙，仔细审视，然后匆匆记录下来。开始，随团的医生、护士、司机还认为他是位嗜学如命的教授先生，时间久了才知道他原是曾参与北平和平解放的原北平市的市长，不觉崇敬之情

油然而生。

他将书里的疑问连带拟考察的课题都做了卡片，每到一处便“按题索解”，进行实地考察，翻过日月山，到了青海湖。为了验证书上写的“咸水湖”之说，他跑到湖畔捧起湖水尝了尝，然后记下：“青海湖水虽咸，但味极淡”。

“远看是山，近看是川”。何思源在他的皮箱上贴着这样两句话，表达自己对这片新开发的处女地的热爱。

青藏公路12天的旅程，对何思源来说收获甚丰。特别是他针对外国人对西藏的描述而产生的疑问，大都得到解答。为此，他曾著专著《旅藏纪行》（1956年底由三联书店出版）。书中他以亲眼所见的事实和大量的资料数据，批驳了“青藏高原荒无人烟，土地瘠薄，气候异常，不适于人类生活”的错误论断。他特别留意到西藏地区蕴含着巨大丰富的矿藏。在温泉附近，他看到一段“铁路”，既无枕木又无铁轨，原来是用上好的铁矿砂铺起来的公路。而相距104公里的乌丽，乌黑闪亮的优质煤层裸露于地面。以后，他与同行的科学家一起又注意到沿途的石油地质构造层。他还在藏南江孜地区捡回一些矿石，专程送到地质部化验。这一切，无时无刻地都在刺激着他兴奋的神经。

在4月30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的大会上，何思源与同行的地质学家孙云铸、农业经济学家吴觉农的联合祝辞中，郑重地向西藏各界报告了他们的发现——

“……如果西藏的矿产加以开发，都可能成为像苏联的乌拉尔山那样的重工业基地。藏北高原区的硼砂、芒硝和盐很多，从黑河区到阿里区向西进行勘探，可以发现大量的石油构造，雅鲁藏布江下游，有几个地方可以建立巨大的水力发电站。”

在《旅藏纪行》中，何思源运用大量的事实，论述了西藏“有丰富的矿藏”，“有发展农林牧业的好条件”，“有一个勤劳、勇敢、富有爱国精神的优秀民族”。他谈古道今，引经据典，论述了“只要正确地贯彻党的民族政策，西藏地区必定能建设得与内地一样繁荣昌盛”。



## 陈老总担心何老

一次宿营时，何思源被工作人员粗心地安排在远离代表团的一个帐篷里。陈毅知道了，很不高兴，因为出发前周总理对照顾好何思源曾有过专门叮嘱，他本人也几次提醒代表团随员。陈毅曾请何思源坐到他乘坐的苏式吉姆车上，何没去。他叫医疗队长祝志新给何思源送去氧气袋，何不接受这种照顾，他像小伙子似的拍拍胸膛：“我挺好，你把氧气袋给旁人吧。”

这个和善、平易而又倔强、固执的老先生给同行的医生、护士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中央代表团在青藏公路上渡过了极其艰苦的12天。在高原地区，馒头蒸不熟，抓在手上粘糊糊的，喝的水也是黄泥汤，烧不开。对这些，何思源一点也不在意，他一心一意用在考察上：“这一带气候更是特殊。早晚好像严寒的冬天，帐篷里寒冷如冰；到中午，日照甚烈，下午西风很大，却又像酷热的夏天，在汽车上的温度高达摄氏45度……”他将每天午间和夜间的温度和气压都测定记录下来。

旅途刚刚过半，全团八百多人中已经有二百多人身体反应强烈：气喘，头晕，呕吐，泻肚，眼珠发红，毛血管膨胀，重感冒甚至患肺炎，而头疼、气喘等一般反应则是普遍的。何思源身体之好令人惊讶，他只感到气喘吁吁，脑袋一点也没有疼晕之感。对此，他颇为自得，在本子上写下：“群山中车转东西南北，一日间人过春夏秋冬。人人如驾云，个个都气喘”。

幸而医疗队阵容强大，在他们的精心护理下，全团人员顺利地到达西藏北部重镇黑河。

### 神奇世界使他如醉如痴

中央代表团到达西藏北部重镇黑河，受到两千多人的夹道欢迎，并参加当地举行的群众大会。代表团团长陈毅接受了三名藏族男女青年献给“的千吗”（这是一个分成两格的木质盒子，在盒子的一格盛着青稞和人参果，另一格盛着糌粑和青稞酒）。



何思源

拉萨平原上阳光灿烂，在以“日光城”著称的拉萨城的西郊，有5万人排列在长达10里的公路两旁，以最隆重的仪式迎接中央代表团的到达。拉萨市区的八角街上和罗布林卡到布达拉宫的大道上，十几座挂着宫灯和绘着金龙图案的巨大彩门，装饰得鲜艳夺目。大街上挂满了欢迎中央代表团的红色巨幅标语……

34年前，报刊宣传中描绘的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欢乐景象。但是在这欢迎场面的背后，还有尖锐复杂的激烈斗争。当中央代表团在拉萨西面二十多公里的东噶宗吴珠不顶村驻下时，情势就有点紧张。祝志新回忆说，当时我们沿途见到好些个藏兵，手里拿着枪，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张国华的部队担心中央代表团的安全，也很紧张。西藏上层某些对中央政府心怀不满的人蛊惑达赖，企图阻止他出面迎接中央代表团。由于陈毅斗争策略高超，终于促成两位喇嘛携手欢迎中央代表团的圆满结果。

何思源似乎一点也没有注意到周围那紧张的气氛，他相信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无比威力，深信“身经百战，智勇双全的陈毅副总理自有稳定

局势的妙着”。而他自己则被当地神奇的民风民俗迷住了！

“我惊奇得舌翘难下了！所谓‘接官亭’并非一座亭子，也无房屋，只是由一些大小帐篷组合起来的一座辉煌的‘行宫’……”

他吃到《西游记》里所说的“人参果”，经仔细观察，“原来人参果是一种植物的根果，藏语叫做‘卓马’，状似小橄榄，味似南湖菱角米”。

他发现：“拉萨的寺庙皆大门向南，独大昭寺寺门向西，小昭寺寺门向东。我很怀疑，平地修庙，没有地势限制，为什么不向南呢？”他向喇嘛请教，才知道：“文成公主好佛，唐朝取经是往西天，故她设计的大昭寺大门向着佛地。文成公主常常想念家乡，她的家乡在东，所以小昭寺的大门向着她的家乡”。在大昭寺小围墙内，他滞留于“舅甥联盟碑”前，认真地辨认脱落不全的碑文，一字一句地记下；他从藏民的服饰上辨认出一千多年前唐王朝对西藏的影响：“圆领、宽袍、长袖，腰间束一条带子”。“藏族同胞大都是体格高大，相貌魁伟，一般牧民骑马，背枪，带剑，即贫苦的牧民也胸前斜插一口宝剑……”

在世界屋脊上这神奇的光彩中，他如醉如痴，心底里不停地称誉，在赞颂——应该把这里介绍给全国同胞，介绍给全世界的朋友们，让他们知道，我们中华大地上有这样一方富饶美丽的土地，我们中华民族内有这样一支聪明勇敢的民族。他认为，自己肩负着这样一个重任：“应该推倒外国人对西藏别有用心心的歪曲了”。

“……许多人家挂上国旗和用白粉画了吉祥的图案，在拉萨河西岸燃起松烟，成群结队的人穿着节日盛装，提着餐具到林卡里饮酒高歌；大小昭寺点起成千上万的佛灯，一千多名喇嘛念起吉祥的祈祷经文……代表们有骑牦牛来的，也有坐牛皮船或乘汽车赶来参加大会；他们夹着文件袋，胸前挂着红布条走进会场。其中，有把头发分成两股辫子缠在头顶，发髻上戴着金质‘格乌’，穿着滚绒大袍和红云绣靴的西藏地方政府‘噶厦’的官员；有穿黄缎绣龙马褂，头戴圆顶金丝帽的班禅堪布会议厅的官员；还有穿着西藏民族便服，用毡毯织成的宽袖大领的‘楚巴’，这是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干部。

……西藏各教派领袖也都亲自出席这盛大的会议……”

“这是一个民族的新生。”他想。尽管代表团再三叮嘱活动范围不要太大，要统一安排，要注意安全，但他仍然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接触西藏各阶层人士的机会，特别是普通藏民。

“希望它活一万年！”陈毅把一棵从北京带来的苹果树苗栽进拉萨农场的果园里，同时这样祝愿说。站在一旁的何思源也情不自禁地双手合一，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

“希望它活一万年！”

## 心灵为藏胞所震撼

往藏南班禅大师驻锡的日喀则城进发的第一晚，他们驻扎在地名叫“羊八井”附近山下的一个草坪上。何思源从随身带的地图上查出此处为北纬28度，与江西省南昌市同在一个东西线上，只因为海拔4500米，5月中旬的夜晚仍是零下4摄氏度。已是凌晨两点了，他仍无睡意，钻在睡袋里手里握着手电和怀表计算同帐篷内两位身高体壮同伴的呼吸频率。“……大约八、九次浅呼吸后就有两次深呼吸……”他在这本子上记录着……

5月12日，雅鲁藏布江畔的日喀则城掀起了欢乐的浪潮。何思源和代表团一起，通过两万多名市民组成的5公里长的欢迎行列。据说前一天，市民们纷纷到河边洗澡，试穿新衣服。从市区通往年楚河东岸的公路两旁，十几座彩门，近千面彩旗，簇拥着中央代表团，哈达、花束纷纷扬扬抛向代表团乘坐的车里，几千名从百里外赶来的农牧民手捧盛满青稞和拌有孔雀毛的盘子，举着丰收的麦穗，向中央来的代表欢呼致敬；扎什伦布寺的全体喇嘛和日喀则附近十多所寺院的代表四千多人，用最隆重的宗教仪式以示敬意；由一千多名市民和郊区农民组成的二十多个歌舞队，穿着锦绣衣服，戴着华丽头饰，敲着大鼓，挥舞五色彩带，热烈地跳着“楚巴谢玛”，这种歌舞近三十年来只跳过三次……

这种发自内心真诚质朴的欢乐，深深震撼着何思源的心。他几乎把持不住自己，两眼盈满

了泪水，两手前举不停地挥动。“多好的人民，多么善良的人民……”

在班禅喇嘛的别墅德庆颇章的白杨林中，搭起了几座绘有五彩花卉的巨大帐篷。班禅为欢迎中央代表团而举办的“秋宫宴会”在这里举行。宴会进行中，从日喀则四郊农村赶来的几十名男女农牧民，女的戴着嵌有珍珠和玛瑙的弓形冠，披着五彩披肩；男的戴着黄色散须帽，穿着黄色戏袍，一人执壶，一人捧杯，给代表们斟上新酿成的青稞酒。又涌上来一支手执羽毛槌，击打着巨大的腰鼓的歌舞队，他们在草地上急剧地回旋，跳跃。扎什伦布寺的喇嘛还表演了“寿星和仙鹤舞”，在一派古乐声中，一个由活佛装扮的“寿星”把哈达和灵芝献给陈毅。班禅大师随着起身敬酒，他来到何思源面前，双手执杯，微笑着注视着这位年老的客人。何思源本来从不饮酒，见佛爷如此盛意，便打破“禁令”，饮了一杯。

在西藏第三大城市江孜，他与和他同龄的老喇嘛欧珠手挽手登上市郊一个山头。这是江孜人民抵抗外国侵略者的一座纪念碑，少年时的欧珠喇嘛为这座碑的浇铸献上过战斗的鲜血。何思源仿佛置身于1904年，亲眼看到江孜人民用火药枪、石头和牧羊用的“抛子”（绳子拴起鸡蛋大的石块），阻击着英国侵略者的入侵。

由巍巍雪峰茫茫苍原到这个风光旖旎的原始山林中，他仿佛经历了冬春两个季节，可实实在在的只是“从帕里南行50公里，从4600公尺降落1400公尺，这短短的一截公路之行，却出现了‘垂直气候’，‘垂直植物分布’的奇观”。他千方百计弄到一匹白马，这大概是他自1938年在山东鲁北地区任“抗日游击指挥”后，17年来头一次骑马。登上喜马拉雅山斜坡，沿“通印大道”，到白教普举寺访问。所谓“通印大道”只是山上一条羊肠小路，山陡路窄，来往驴骡商队频繁，人畜交错，极为险恶。他硬是要“走一趟尝试一下”。

他还好奇地沿边界线走了一趟，惊愕地发现这一百多公里长仅有两名解放军战士巡逻。边防检查站站长郭清平告诉他，他们人不多，武器也很少，主要依靠民族政策团结当地藏民保

卫边防。

西藏是我们伟大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同胞是我们伟大中华民族中不可分离的一个民族。近百年来，西藏人民曾两次抵御外国侵略者的入侵。在我们这个大家庭中，藏族人民也将逐步走上繁荣幸福的光明之路……

1956年5月26日，当他由日喀则返回拉萨的第二天，一架民航客机“北京号”由北京飞临拉萨市上空：北京至拉萨航空线试航成功。于是他成为首批从拉萨乘飞机返回内地的五名乘客之一，当然免不了又是一番“死磨硬泡”的争取，对这位何老先生的胆量，代表团的工作人员早就领教过了。

“我们飞行在7000到8000公尺的高空，每小时的速度约450公里，但飞机还是很平稳的，我一点不觉在高原上空飞行，也不头晕脑胀。我们谁也无心吃东西，都只顾靠在窗旁向外看高原的壮丽景色。不久以前，我们从这高原的地面上走了一趟，这次我们再从高原的上空总览一下伟大壮丽的祖国山河……”

当飞机缓缓降落在西宁机场时，他看了看手表。他惊叹：“去时14天，返回3个半小时，祖国的建设速度真是一日万里啊！”

他计算了一下：自3月16日从北京出发，到6月6日回到北京，整整81天。“按佛教说，九九归真，81天正合九九之数，功果圆满”。

这感叹发自他的心底。在踏上西藏高原之前，那一堆堆的疑问得到解答，他由衷地为共产党英明的民族政策而感叹不已，他迫不及待地把自己收集的大量资料整理成文，以极快的速度写了一本4.8万余字的《旅藏纪行》，5个月后即由三联书店正式出版。他还撰写了数十篇文章在《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在国际广播电台广播，向国内外广泛宣传今天的新西藏。他为《西藏志》收集了一百多万字的宝贵资料，他计划力争10年之内向祖国、向西藏人民献上饱含自己心血的这份厚礼。

可惜的是，1966年开始的那场浩劫把他苦心积累的这部珍贵资料连同手稿洗劫一空，致使何思源老先生抱憾终生。

（责任编辑 一尘）

# 从基督徒到共产党员的『平民部长』

● 满素洁

大凡喜欢看电影的人都不会忘记这个镜头：28岁的李德全身穿浅蓝色棉布大褂，头戴白色婚纱，面对牧师的提问，她从容大方地说：“上帝怕他做坏事，派我来监督他”。以此回答牧师问她嫁给冯玉祥的理由。那是1924年，然而，就是这个李德全却在25年后，出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卫生部长。

## 陆军检阅使和 女青年会总干事

李德全1896年出生于北京通县一户普通农家。李家共有六男三女，女子在先，李德全排行老二。

八国联军打北京时，李德全的父亲李宽带着她们姐妹三个逃荒，晚上没有地方睡觉，他们就睡坟头睡野地，母亲因为着凉就瘫痪了。父亲是个运河脚夫，有的同伴跟他休了老婆，李宽说不能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北方人喜欢睡热炕，过了大半年的时间，母亲的瘫痪竟然好了，以后还喜得6个儿子。

李德全家境比较贫穷，甚至连耕地的牛都买不起。大姐不幸去世后，李德全就成了家里的老大，与父母一起担负照顾全家的责任。

19世纪末，当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时，他们也没忘了把他们的信仰传到中国。他们在通县设教堂，办学校。李德全父母也就成了基督徒，李德全三岁就受了洗礼。

李德全的父母是个非常开通，眼光远大的人，他们希望儿女能摆脱贫穷，日后能出人头地。他们利用教会的资助，接回在外当童养媳的李德全，满足了她读书的愿望。1915年，李德全在父母的支持和教会的帮助下，以大学毕业后偿还教会贷款以及回母校贝满女中任教为条件，升入北京私立女子协和大学（燕京大学前身的一部分），成为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一个农民女大学生。

李德全毕业后果然回母校任

教。她一边教书，一边从事传播爱心的布道活动。1921年，李德全离开母校后就在北京基督教女青年会工作，担任总干事，给一些有志于进步的女青年以帮助，林巧稚等人都是当时受助者。

李德全由于忙着还教会贷款，帮助父母照顾家务，到了28岁仍未谈论自己的婚事。

冯玉祥字焕章，祖籍安徽。父亲在安徽实在过不下去，就一人逃荒到山东，后又逃荒到河北保定。冯玉祥11岁那年，为了糊口到清朝的军队中“补名吃粮”，当了兵。

满清的军队多有抽大烟者，冯玉祥不通此道，身体好，个头长到1.84米，高大魁梧的身材，带队喊操，十分出众。等到了袁世凯执政阶段，实行新兵政策，买洋枪洋炮。很有心计的冯玉祥不断学习新知识，更注意部下的操练，因而他提升得也快，很快就升为督军。与李德全结识时，冯玉祥已升到陆军检阅使。

李德全的堂姐李淑诚嫁给了冯玉祥的一个部下。他们有意撮合冯玉祥与李德全的婚姻，堂姐把一切都安排好，唯独李德全一个人蒙在鼓里。一天，堂姐突然对李德全说：“有个大兵要请客，他又高又大，我害怕，你能不能陪我去？”李德全一听，不假思索地回答：“怕什么，他又不能吃人，我陪你去。”基督将军冯玉祥曾经听李德全布过道，对她非常敬重，而李德全也非常敬重这个当大兵的。不久，两人举行了简朴的婚礼。曾有报纸以“冯玉祥南苑行婚礼，家常饭招待众来宾”为题对他们的婚礼做了较为详尽的报道。

## 从基督徒到 共产党员

尽管李德全是个基督徒，而且还嫁给了身为国民党党员的将军冯玉祥。但她那穷苦的出身，从小培养的爱国情愫，更重要的是她那几十年的社会实践，使她的思想不断修

正,直到最后向共产主义信仰靠近。

早在学生时代,李德全便投身爱国运动。在北京私立女子协和大学上学时,她担任学生会会长,积极组织学生争取民主和自由,参加声势浩大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帝国主义分子公开叫嚣“中国人不值两毛五”,李德全和同学们听到这有辱国格的话都义愤填膺,他们立即表示抗议,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中国人不值两毛五,全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每人值 0.00000005!”并把它送到美国校长办公室里。

1924年,当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时,冯玉祥和李德全表示出热诚的拥护。同年11月,孙中山从广州北上北京,冯玉祥迫于段祺瑞和张作霖的联合压迫不能亲迎,派李德全作为他的代表前去迎接。孙中山逗留北京期间,由于健康情况不佳,住进北京协和医院。冯玉祥除了让部下电话询问孙中山的病情外,还让李德全去问候,并赠给孙中山一本圣经,希望他早日康复,而病中的孙中山也回赠冯玉祥成批《三民主义》和《建国大纲》,李德全将这些小册子,在冯玉祥部队中散发并讲解影响士兵向民主革命方向转化。

1936年3月8日,南京妇女举行“三八纪念大会”。针对国民党南京市党部提出的妇女的责任是当好贤妻良母,李德全义正严词地说:“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有人说妇女的责任是主持家政……但在被侵略的国家里,妇女们已没有爱她们丈夫的权利了,已没有保护她儿女的自由了,国都亡了,妇女到哪里去当贤妻良母?”她号召妇女们立刻奋斗起来,和男子共同担负起救国的责任。

1946年10月13日李德全受邓颖超委托代表她参加在纽约召开的国际妇女会议,这次会议主要由罗斯福夫人以及美国19个妇女团体共同发起的。李德全在大会上提出“联合世界各国妇女为争取民主

和平而奋斗”,及“反对美国援助蒋介石发动内战”两个提案。她的发言由电波迅速传到中国,蒋介石听到后气得五脏俱焚。

1948年1月7日,蒋介石以“行为不检、言论荒谬,”“违反党纪、不听党的约束”为罪名开除了冯玉祥的国民党党籍。冯玉祥召开记者招待会,除发表致蒋介石的公开信外,还准备写一本反映蒋介石其人其事的书。这本后来出版的《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就是在李德全帮助下完成的。冯玉祥口述,李德全负责记录和整理。

李德全跟着身为国民党党员的丈夫却没有加入国民党,跟她对国民党的认识有关,使李德全永生难忘的是1946年2月10日,在重庆较场口举行“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被举国大会总主席蝗李德全未曾到,大会宣布开始不久,国民党特务就破坏了会场。李公朴、郭沫若等知名人士以及到会的群众很多人受到了殴打。会议不得不中止进行。较场口血案使李德全彻底认清了国民党的丑恶嘴脸,使她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假民主、反民主的本质。

李德全思想的彻底转变,从根本上说,与她的信仰有关。

1926年,李德全与“飘然下野,去国远游”的冯玉祥取道蒙古赴苏联考察。

李德全在苏联看到了一个工人和农民成了国家的主人,男女地位同等的社会主义国家。她开始学习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书,决心向苏联妇女学习,要为中国妇女解放而奋斗终生。

当李德全还是虔诚的基督徒时,她就与共产党人有了接触。1924年,她首先结识了共产党人李大钊,她与冯玉祥的苏联之行就是李大钊促成的。

她的妹夫张克侠和弟李连生、李连海都是共产党员,尽管他们入

党之事李德全当时并不知晓,但在平日与他们的接触中她不能不受到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李德全与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从30年代起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李德全坚持抗日,反对分裂和投降,赢得了我党的尊重。她广泛团结各界妇女、各界人士,支持前线,从事战时儿童保育,开展妇女运动及救济工作曾受到周恩来的称赞。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上,周恩来总理特别讲到:“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李德全,积极抗战,有很大贡献。”

冯玉祥和李德全结合后,冯玉祥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逐渐从北洋军成为一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正象周恩来总理所说的那样:“从一个典型的旧军人,转变成了一个民主的军人。他经过曲折的道路,最后走向了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1930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的集团军被蒋介石以卑鄙手段分化瓦解了。冯玉祥看到自己多年苦心经营的军队顷刻间分崩离析,溃不成军,内心十分痛苦。李德全看到丈夫痛不欲生的样子,就劝他说:“你虽然失败了,但是与吴佩孚、曹锟、张作霖那些人不一样。你曾为国家、民族做过很多好事,将来纵然不能流芳百世,也称得上一代风流。往年整日带兵打仗,很少空闲时间,没有学习机会,如今正利用这个机会多念些书,将来还会有用的。”于是,他们曾一度隐居汾阳峪道河,两度上泰山。在此期间,聘请了一批共产党人和进步学者讲授政治、经济、历史等方面的问题,李德全就跟冯玉祥一起听课。在李德全的帮助下,冯玉祥终于明白中原大战失败的原因是他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治主张。经过一个阶段的学习,冯玉祥对共产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共产党有了好感,这些都是在李德全的帮助下完成了。而李德全通过对社会发展规律的了解,更加明白上帝是不能拯救

劳苦大众的。两个人的思想觉悟都同时向党迈进了一步。

1945年，中国八年抗战终告结束。同年8月28日，毛泽东等人应邀到重庆和蒋介石举行谈判。冯玉祥认为，“毛泽东到重庆，说明了他胸襟坦白，一片至诚”，但在白色恐怖下，他不便前去机场迎接，又是李德全作为冯玉祥的代表前去欢迎毛泽东。

1948年夏天，李德全和冯玉祥从纽约启航，取道苏联返回祖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轮船在黑海失事，冯玉祥和他最小的女儿冯小达不幸遇难。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领导人闻讯致电李德全，望她节哀，一俟处理完后事，立即回国，共商建国大计。极度悲痛的李德全收到电报，感到极大安慰。她给毛泽东、朱德复电时说：“冯玉祥将军不幸于9月1日下午在黑海胜利号轮船上被焚逝世。我俟康复后即返中国，继续为民主而奋斗。”1948年11月，李德全捧着冯玉祥的骨灰盒回到她朝思暮想的祖国，回到她认定要跟着走的中国共产党的怀抱。

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卫生部长后，李德全一直渴望加入中国共产党。50年代初，李德全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表达了她想加入党组织的愿望。

李德全以她的实际行动一步步靠近党组织。1958年12月，62岁的李德全终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一个基督徒到共产党员的转变。

## “平民部长”

1949年11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在北京后海原清朝摄政王府郑重宣布成立并由李德全出任新中国第一任卫生部长。

李德全上下班不坐小轿车，喜欢步行，50年代在后海通往卫生部的路上，每天早晨人们都会看到穿着朴素的李德全；有时她还主动跟

周围的群众打招呼、聊天，李德全也因此被人们称作“平民部长”。

李德全和冯玉祥夫妇共有三女一男。她经常教育孩子要勤俭持家，不做少爷小姐。她对孩子们说他们的父亲是穷苦出身，告诫他们不要有任何的特殊感和优越感。

大女儿冯理达在苏联列宁格勒医院获得免疫博士学位，1958年返回祖国，任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研究所第三室负责人及流行病科负责人。她刚参加工作就带队离开大都市深入艰苦地区，在流行病地区做预防和治疗工作，李德全对女儿的作为表示极大的支持。

二女儿冯颖达因身体不好，长期没有找到正式工作，但她没有一句怨言，因为她深知母亲的为人。

她唯一的儿子冯洪达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海军工作，常年在海上漂泊，一年也难得与母亲一聚，孙子也很少有机会倚偎在奶奶的怀里。晚年她身边没有亲人照顾时，多次有人劝她把儿子调回北京，可李德全却说：他热爱海军事业，就让他献身海洋吧。就这样，冯洪达在外地工作了一辈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事业献出自己的一生。

常说婚姻是终身大事。冯玉祥、李德全对儿女的婚姻虽然重视却反对大操大办。1947年，在冯玉祥一家驱车去纽约的路上，李德全对冯理达说：“你们订婚已经一年多了，现在大好的日子，也不要按照旧套子办什么喜事了，你们就结婚吧！”

二女儿结婚时，李德全已经当上了国家的卫生部长，但她只送给女儿一条裙子，算是作为贺礼。然而，她却毫不吝啬地拿出钱供妹妹的儿子木铁读书，并不住地资助吉鸿昌的遗孀及其女儿吉瑞芝，给她们全家生活上以力所能及的帮助。

李德全不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的亲人谋私利，不仅表现在对儿女对她的六个胞弟也如此。最小的弟弟李健仁曾在李德全管辖的

卫生部某个单位当校对，1961年，中央下放干部时，被下放到东北。后来，李健仁见不少下放干部返回北京，也就给姐姐写信提出返京的想法。李德全却回信说：如果是组织安排，不用我说什么，如果不是组织调动，我也绝不能去说。直到现在，李健仁及家眷仍在东北工作。

1949年6月，遵照冯玉祥将军的遗嘱，李德全把他们的全部家产无偿捐献给国家，没有给儿女留下一分财产，甚至把几十年珍存的大批文物史料，包括她自己奉为至宝的丈夫送给她的《正气歌》手迹，也捐给国家。

公正地说，李德全“文革”中是受到了保护的，她没有受到残酷迫害。然而，实事求是地讲，李德全没有生活在世外桃源，“文革”的血腥风雨还是吹到了她的身边。1969年，有人借“第一号命令”要把古稀之年、身体多病、为党和人民做出过不可磨灭贡献的李德全撵出北京。他们不厌其烦地造访她的住所，要把她逼出北京。不得已，李德全问他们：“毛主席走吗？周总理走吗？”

他们如实回答：“不走。”

李德全马上接着说：

“好，那我也不走。我是共产党员，我会打枪，我留在北京保卫毛主席。”

李德全的确会打枪，她的小手枪还是列宁的妹妹送给她的，后来，李德全把它赠给了国家，如今，它安静地躺在历史博物馆里。

李德全在她77岁时，走完了她传奇的一生。她留给子女的不是巨资家产，而是世世代代也享用不尽的精神财富。1982年9月，在冯玉祥将军诞辰100周年的纪念会上，邓小平同志发言说：“焕章先生是很值得我们纪念的人物。……李德全大姐是一位很好的同志，我们也很怀念她。”

（责任编辑 洛松）

# 见微知著 琐谈冯友兰

● 池南

冯友兰先生故去至今，已近六年了。他的著作的影响，任何人无法漠视；然而勿庸讳言，对他身后的评价却也毁誉不一。冯友兰先生故世日久，研究他的历史和著述的人，也日渐增多。本文所提供给读者的，多是先生细微的一言一行，然而我以为凡情琐事，却能见先生的品行和为人。

## 耕读传家

冯友兰出生在河南省唐河县，父亲是清光绪戊戌科进士。伯父、叔父也都是秀才。他的祖父虽然没有功名，但却颇有诗名，传世的几十首诗，编为《梅村诗稿》，他的诗中有一种恬谈闲适的趣味。当时邻县的一位名士为这部诗稿题了一首诗：

身处人间世，  
心怀太古春。  
风流伊上叟，  
击壤作尧民。

这是以邵雍的《击壤集》来相比的，实在是很高的评价。

冯友兰的父亲也是一个很有才情的人。他署理崧阳县的时候，曾经办理过一个三角恋情的案子。案子审过之后，他用四六骈体文章写了一个堂谕。在叙述了事情的经过以后，他判决说：

呜呼？玷白璧以多瑕，厉实阶离魂倩女，禁朱丝而不治，罪应坐月下老人。所有两造不合之处，俱各免议。此谕。

在那样一个封建礼法仍笼罩社会的条件下，能以这样的宽容眼光看待问题，是很可以算得开明的。而堂谕又写得风雅有趣，就更加难得了。

光绪三十四年的元旦，冯友兰的父亲在衙门举办了一个晚会，其中一个重要的活动是猜灯谜。冯友兰的伯父从老家来到崧阳县，正好赶上这个晚会，便出了一条谜语：

慈禧太后过生日。——打一  
字。

这条谜语很难猜，因此赏格也最高。冯友兰看了这条谜语以后，便想：“慈禧太后的生日是十月十日，而十月十日合在一块儿不正好是



毛泽东亲切会见著名哲学家冯友兰

‘朝’字吗？”想好以后，他便跑到父亲跟前，悄悄地说：“应该是个朝字吧？”他的父亲听了，十分高兴。从这个故事里，可以看出，冯友兰小时候很聪明，而且家教良好。

## 朴素的婚事

1918年，冯友兰与任载坤结婚了。任载坤是辛亥革命的前辈任芝铭先生的女儿。任芝铭先生是清朝的举人。他一共有六个女儿，任载坤行三。任芝铭先生在河南最先提倡妇女解放，他叫他的女儿们都放脚，并送她们到外边上学。

冯友兰和任载坤的婚恋过程十分简单。冯友兰在上海念书的时候有个同学是任芝铭先生的学生，便由他出面介绍冯友兰和任载坤订婚，任芝铭先生收到那个同学的信后，立刻回信表示同意。冯友兰也写信告诉母亲，他母亲也同意了。当时任载坤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冯友兰和任载坤同于1918年毕业，后在开封结婚。

这桩既非旧式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非新式的自由恋爱的。亦新亦旧的婚事，却造就了六十余年完满的姻缘。

冯友兰和任载坤婚后生涯中，可谓生死同心，荣辱与共。1968年，冯友兰被隔离在北京大学外文楼“改造学习”的时候，任载坤便每天上午提前吃午饭，然后走到办公前边，坐在石阶上，望着外文楼。直到看着冯友兰跟着队伍出来吃饭，知道他又平安地过了一夜，才放心地回去。第二天照样再去等。那里有几块石头，冯友兰先生在后来的回忆中说：“那几块石头可以叫‘望夫石’”。这样的相依之情，实在令人感动。

## 西南联大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原在

北京和天津的高校开始南迁。北大、清华和南开迁至长沙，成立了长沙临时大学，这是西南联大的前身了。长沙临时大学的文学院安排在南岳市附近几里的一所教会学校内。这座学校正在南岳衡山的脚下，背后靠着衡山，大门前边有一条从衡山流下来的小河。

冯友兰先生一次爬山，走到一个地方，叫“二贤祠”。据说这里是朱熹和张拭当年聚会的地方。祠里正房叫“嘉会堂”，堂中立了一块横匾。上写“一会千秋”。冯友兰便即兴赋诗一首，诗曰：

二贤祠里拜朱张，  
一会千秋嘉会堂；  
公所可游南岳耳，  
江山半壁太凄凉。

这首诗后来被朱自清先生在一次会上朗诵出来，师生均感凄怆。

南京失守以后，日军进逼武汉，长沙也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几所大学的师生只好舍去南岳，继续向昆明撤退。

冯友兰与朱自清、汤用彤等人经广西到越南，然后转往昆明。途中，经过一个叫凭祥县的县城时，冯友兰的左臂碰在城墙上，受了伤。后来转到河内的一家法国医院养伤。冯先生在医院里躺了一个多月，胡子就长出来了，出院的时候也并没有剃，就留着胡子往昆明去了。闻一多参加学生大队步行到昆明，沿路也没有剃胡子，到昆明也把胡子留起来了。闻一多的胡子在日本投降的时候就剃去了，冯友兰则一直留到十年动乱时期才剃去。

到了昆明以后，长沙临时大学便改为西南联合大学。当时，从北京等地迁出来的高等院校，有的往西南，有的往西北。往西北的合为西北联合大学，往西南的成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并无常设的校长，而是由北大、清华、南开的校长担任常务委员，组成常务委员会，主持校务。由于胡适已经出任中国驻美公

使，所以联合大学的文学院院长便由冯友兰担任。

因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西南联大的教师们生活很艰苦。一个月的工资加到几百万，不到半个月就用完了。教师们多是靠兼职薪金，以为贴补。到了抗战末期，联大一部分教授组织了一个卖文卖字的会。闻一多给冯友兰刻了两个大图章，以备卖字之用。

当时冯友兰住在龙头村的一座庙里，庙的旁边有一所小学。任载坤在院里设了一个油锅炸麻花，学生下了课就买麻花吃。

联大文学院从蒙自迁回昆明不久，重庆教育部设了一个学术评议会，冯友兰被指定为这个会的成员。接着就往重庆参加这个会。头一天开幕的会上，孔祥熙发言说：“现在教育部有些不同的意见，议论纷纷，很不好。”冯友兰当时并不认识孔祥熙，便问坐在旁边的傅斯年：“这个人是谁？”傅斯年说：“这就是孔祥熙，骂到你们头上了，你得发言批评他。”孔祥熙发言完了，冯友兰就接着发言说：“方才孔院长说有不同意见，不同的意见是有的，但要看看是一些什么意见。中国的哲学史上，有程朱与陆王的两派之争，当时有人说，程朱、陆王之同异，是不可和之同异，亦不可无之同异。有些同异，就是不可无的。”散会的时候，孔祥熙还特地跑过来和冯友兰拉了拉手。

后来，冯友兰又一次到重庆，孔祥熙派了他的一个亲信来找冯友兰，说：“孔院长请你务必到他家里去一趟，有事情商量。”冯友兰去了以后，孔祥熙对他说，他要办一个孔教会，请冯友兰当会长。冯友兰回答说，第一，没有办这种会的必要；第二，如果要办，自己也无法办。

西南联大是中国教育史上很特别的时期，当时的条件那样艰苦，可学术气氛之浓，所出人才之多，是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联大的师生



身上有一种共同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冯友兰所作的联大校歌歌词中充分地表现出来，歌词说：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徽移裁桢干质，九州遍洒黎无血。尽茄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寇寇，复神州，还燕碣。

当时为校歌写歌的人还有罗庸，而且最初校歌委员会接受了罗庸的歌词，后来才改为冯友兰的歌词。所以有人以为西南联大的校歌是罗庸写的，其实是冯友兰，这一点，看朱自清的日记便可明白。

## 不作“白华”

抗日战争胜利后，西南联大于1946年结束。冯友兰先生接受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邀请，到该校任客座教授，讲中国哲学史一年，并取得了在美国的“永久居留”权，身居异国，过着优裕的生活，冯友兰却常常吟诵王粲的《登楼赋》：“虽信美而非吾土兮，夫胡可以久留？”冯友兰深切地认识到，“还是要把自己的国家搞好！”

1947年，解放军节节胜利，全国解放在望。归抑或留，对于在美华人来说是个艰难的选择。有些人劝冯友兰定居美国，而他却说：“俄国革命以后，有些俄国人跑到中国居住，称为‘白俄’。我决不当‘白华’。解放军越是胜利，我越是要赶快回去，怕的是全国解放了，中美交通断绝。”冯友兰最终回到了祖国。

## 寄信三松

冯友兰与金岳霖同年而生，是在清华和北大的老同事和老朋友。1982年，首都学术界庆祝金岳霖从事教育和研究工作的56周年，冯友

兰与金岳霖同是88岁。冯友兰当时写了一个上联：

何止千来，相期以茶；

日本人称八十八岁为“米寿”，米字拆开就是八十八；称一百零八为“茶字拆开是八十八加廿，正好是一百零八。

金岳霖当时对的下联是：

言谈白马，意望青牛。

金岳霖是研究逻辑学的，所以用公孙龙的《白马论》为对。

冯友兰给出的下联则是：

心怀四化，意寄三松。

冯友兰所住的北大燕南园寓所庭中有三棵松树，因题其室曰“三松堂”以寄意。

冯友兰晚年倾尽心力构著他最后的名山之著——《中国哲学史新编》，生死一念在这一部著作面前显得很淡。1990年初，冯友兰因病入院。在医院里，他常反复吟诵《古诗十九首》：“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他在诗的意境里似乎觉得十分安宁。一次医生给他

检查身体，他忽然对宗璞（著名作家）说：“庄子说过，生为附赘县疣，死为决疣溃痂。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张横渠又说，生，吾顺事，没，吾宁也。我现在是事情没有做完，所以还治病。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文化的使命远远超过了个体的存没，我想，到了晚年的冯友兰是确有这样的境界的。

冯先生临终前，用尽最后的力气说：“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当时有李泽厚和陈来在侧。中国文化必将大放光彩，冯友兰最终坚持了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宣扬的主张，这确乎是难能可贵的。

在这里，我很愿意用冯友兰1972年作的一首诗作为此文的结尾。诗曰：

去日南边望北云，  
归时东国拜西邻；  
若惊道术多迁变，  
请向兴亡事里寻。

（责任编辑 余人）

## 广告

# 食道癌治疗有新药

郑州市邙山中医院肿瘤专科研制成一种中药丸，患者口中含化，对治疗食道癌、贲门癌、胃癌有显著疗效。此治疗方法尤其适合于不宜作手术、化疗、放疗或愈后又复发的患者。对已滴水难进的病人，含化药丸1—3天，大部分即可饮水进流食。疼、咳、肿、呕吐皆可治。对一般的患者，按照医生指示用药后，大部分饮食能恢复正

常。可汇款购药，设专人负责咨询。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南阳路中段生产路7号付1号

来院路线：从郑州火车站乘4路或39路汽车到海棠寺站下车，向北50米（郑州市邙山公安分局西对面）即到。

联系人：宋国厂

电话：(0371) 3832221

邮编：450053

# 张学良九五华诞 于魁智赴美献艺

● 杨连元

1901年出生的张学良将军，历经沧桑，健康长寿，去年6月1日，在美国的夏威夷度过他的95岁寿辰。这次寿辰别有情趣，令张将军非常愉快，因为有一份特殊的寿礼跨海越洋送到了他的面前。这就是颇受张学良将军喜爱的中国京剧院著名老生演员于魁智，率领琴师赵建华、鼓师苏广忠、旦角演员马小曼（京剧艺术大师马连良之女）飞抵夏威夷，让老先生在寿诞之日实实在在过了一次戏瘾。

—

20岁执掌兵权，不到30岁即担当东北军政重任，35岁时发动了“西安事变”的张学良，是中国的世纪风云人物。而由于特定的家庭环境和社会背景，在这样一位传奇式的人物身上，还有着纵横交错及至中西合璧的文化底蕴。他7岁以后，系统学习了从《三字经》、《百家姓》到《四书》、《五经》等书，15岁学习英文，成为熟谙欧美文化的开端。他这一辈子，擅长书法，喜种兰花，爱吃西餐，打高尔夫球，同时，还是个戏迷。

张学良年轻时就迷上京剧，最喜欢的是余派老生创始人——余叔岩，两人成为常来常往的好朋友。除此，他还喜欢听京韵大鼓，最推崇的是“鼓界大王”刘宝全。越到晚年，对这两样爱好就越浓烈。

1993年4、5月间，海峡两岸的文化交往开

始解冻，北京京剧院和中国京剧院相继以最强阵容组团赴台湾演出，当时不仅在海外戏迷中产生轰动，也乐坏了年已92岁高龄的张学良。

一向深居简出的张学良在这段时间里，不仅亲临剧场看了两个剧院的9场戏，并设宴款待张学津（京剧艺术家张君秋之子）、叶少兰（京剧艺术家叶盛兰之子）等名门之后，席间还捎带着票戏。他激动地对裘少戎（京剧艺术家裘盛戎之子）说：“我已有几十年没看国剧了，这次连着看了你们三场戏，不看国剧就不算中国人！”他还对袁世海、杜近芳、刘长瑜等京剧界名流说：“你们知道吗，我看戏的标准很高，我看过谭鑫培谭老板的戏，看过杨小楼的戏，最有趣的是钱金福，有一次在余叔岩先生家中，他学唱梆子名旦侯俊山，非常有意思，简直地把我笑坏了！”在这次赴台的几位青年演员中，于魁智那韵味醇厚、表现不俗的演唱风格，引起张学良极大的兴趣，老先生看了他演的李（少春）派名剧《打金砖》，又看了他演的杨（宝森）派名剧《文昭关》。后来，演出团的主要演员到张学良家中做客，刚刚介绍到“这就是唱《打金砖》《文昭关》的小于”时，张学良立刻高兴地拉着于魁智的手，连声夸奖“真是唱得好”。

其实，在这次赴台之前，于魁智在海内外的京剧戏迷中已有很高的赞誉。他自从1982年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分配到中国京剧院之后，在继承京剧艺术上取得突出成就，先后获得“梅花奖”、“梅兰芳金奖”、“中国京剧之星”等殊荣，成

为“中国京剧的希望”。从此这位本世纪颇有资历的戏迷——张学良将军，与跨世纪的中国京剧新秀开始了心灵的交流。

## 二

时光荏苒，岁月更迭。世纪老人的95寿辰即将来临。亲友们在酝酿为张学良庆贺寿辰的活动时，想别开生面地送一份能使他最开心的“寿礼”——唱京剧，而且不谋而和，大家都想到了老先生最喜欢的于魁智。

最初和于魁智商定此事的是张学良的五弟张学森。于魁智在台湾的首次演出深得好评，也引起张学森的喜欢，他第一次通过姓廖的先生和于魁智相识就敲定：将来我去北京得找你唱戏呀！其实，张学森和北京的不少京剧名角都很熟，这下，来北京的次数更多了起来，有时一年能来上两三次，到了北京一住下，他就打电话找于魁智，寒暄几句过后，紧接着就是挑日子、找地方，要吊嗓子唱戏。张学森还喜欢赵建华的琴、苏广忠的鼓，他曾幽默地说：“你们哥仨这是桃园三结义，千万可别‘孤独’出去一枝啊！”

不幸，1995年9月张学森在北京病逝。前三天，张学森还和于魁智在一块儿切磋唱腔。临分手他说：“明年6月1日，大爷（张学良）95大寿，他最爱听你唱了，请你们到夏威夷来，咱们好好热闹一回！”没料想，这美好的心愿成了逝者与生者永久的遗憾。

去年4、5月间，张学良先生95寿辰临近，有两位特殊身份的女士忙得不亦乐乎。一位是张学森先生的女儿、全国政协委员张闾蘅，她受母亲和家人的重托，一定要了却父亲未竟的心愿。另一位是上海申大集团董事长阎明光，她的父亲阎宝航先生也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东北籍著名的抗日爱国人

士。1917年，张学良加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在这里与阎宝航结识，尔后几十年二人过从甚密。阎明光这次要亲赴夏威夷祝寿，也想把她的“张伯父”最喜欢的京剧艺术家请去。

值得一提的是，当阎明光颇不容易地找到于魁智时，离6月1日的寿诞只剩下几天了。中央有关部门对此事很重视，提供一切方便，5月30日，于魁智夫妇、马小曼、赵建华、苏广忠一行五人，如约登上飞往夏威夷的班机。

## 三

中国京剧——这份特殊的寿礼，去年6月1日晚上在夏威夷希尔顿大酒店张学良95寿筵上一亮相，就引起不同寻常的反响。

还没能从哀痛中解脱出来的张学森夫人一见到于魁智就不无惋惜地说：“你们可来了，他（张学森）要是还活着，看到你们来了，该多高兴啊！”

张学良年近80岁的女儿动情地说：“家父95寿辰，请来这么好的国剧艺人，能让家父过上几十年没有过的戏瘾，等家父一百岁时，请大家千万别忘了再来呀！”嘉宾们长时间热烈鼓掌。

头戴一顶深色毛线小帽、身着笔挺礼服的



张学良与于魁智亲切交谈

张学良精神矍铄，和赵一荻女士双双坐在轮椅中，和悦地接受人们的祝福，并同来宾合影留念。

于魁智代表中国京剧院和此行的艺术家，向张学良赠送用京剧脸谱精心绘制的大幅“寿字图”，并演唱了表现汉光武帝刘秀上朝时喜悦心情的传统戏——《上天台》中的一段二簧三眼唱腔。为了烘托寿筵的气氛，他把这段唱腔原来的最后一句“又听得殿座下大放悲声”，按照《汉宫惊魂》的路子改唱成“准备下皇封宴庆贺功臣”，真是别具匠心。

板鼓一敲，胡琴一响，一个晚上没说几句话的张学良神情为之一振，他洗耳恭听，手上还阵阵击节，当听到“金钟响玉鼓催王登九重”的俏丽甩腔处，还脱口喊了一声“好”。

当寿筵的程序接近尾声时，早就等不及的张学良已经随着京胡、板鼓唱了起来。他唱了《失街亭》、《斩马谡》、《珠帘寨》的选段，还与唱梅派的马小曼对唱了《武家坡》。他不用话筒，有板有眼，极富韵味，令人叫绝。

他唱“两国交锋龙虎斗”一段，前几句唱词都在谱，后两句却唱成“将军此番出征后，近山靠水把营收”。他唱快板“一见马谡跪帐下，不由老夫咬钢牙，敢拿军令当玩耍，失守街亭你差不差！”尺寸很严，干净利落，一气呵成。他唱《珠帘寨》，还很内行地与琴师赵建华对对腔。对唱《武家坡》“为君的要人(我是)不要钱”时，正好侄女张闾蘅推着赵一荻过来捧场，他还即兴表演来了个手势，惹得在场的亲友们捧腹大笑。晚上5时30分开始的寿筵此时已近五个多钟头了，张学良兴致未尽。

#### 四

的确，从6月1日这天开始，到6月8日于魁智一行离开，张学良天天沉浸在对京剧的迷恋之中，如醉如痴。

据家人介绍，张学良健康长寿的重要原因，是生活极有规律，他喜吃柑橘，准时喝鱼翅汤，定时听家人读报纸。那几天里，他也是在每天下午5点多钟，一准来到约好的亲友家，先听大家

唱，随后自己唱，间或还唱段京韵大鼓“杨贵妃梨花树下香魂丧”，再讲段梨园轶事。他特别愿意聊戏，每次都说，“我经历的事很多，和你们说不完哪”。他天天都得唱到晚上10点，非等来赵一荻的电话“大爷该休息了”，方肯罢休。令人叹绝的是，几天下来，他的嗓子越唱越亮，调门儿也长高了些。张将军这里演唱，女儿、儿子都在一侧悄悄地录音。一次，近80高龄的女儿还似孩童般地央求：“爸爸，您再唱出《斩黄袍》吧，我可有50年没听了！”张学良风趣地说：“可不，你都快80了嘛！”天伦之乐的父女亲情在京剧的欣赏中涓涓涌动。

张学良对京剧太痴迷了。据家人说，一天早上5点多钟，老先生就要起床，一问他干嘛呀，说是唱戏去。也许和张将军多年的戎马生涯有关，几天当中他反复吟唱的一直是《失街亭》中的“两国交锋龙虎斗”、《斩马谡》中的“火在心头难消恨”和《战太平》中的“叹英雄失势入罗网”。他肤色很黑，在夏威夷每天都晒太阳。他来亲友家唱戏时，上下车都坚持不让人搀扶，一举一动依然是钢铸铁打般的行伍风姿。他也特别喜欢听于魁智演唱，一问“您想听什么”，回答就是“《搜孤救孤》、《空城计》”。不唱成本大套他说“不过瘾”。那期盼的神情，又像是个永不知足的顽童。

人生有聚有散。于魁智的演出任务很重，他们一行要启程回国了，他最后又为张学良演唱了全部《乌盆计》，老先生抱拳连连致谢：“唱的真是没话讲！”他握住于魁智的手，依依难舍。

一日，张学良对于魁智说：“你们不知道吧，其实她(赵一荻)唱得最好！”真没想到，坎坷人生的患难伴侣，还是京剧艺术的知音。

可能又是一种巧合，于魁智这年刚好35岁，和张学良先生相差整整60年，他又是辽宁省辽中县的人，算得上将军的小老乡。

问起此次夏威夷之行的感想，于魁智说：“其实我从小就知道张学良将军，但从没想到过能见到他。是京剧连结了这几代人；是京剧，维系、促进了海峡两岸炎黄子孙的情感。”

(责任编辑 凌辰)

# 建国初留美学生回国潮

建国初期，百业待兴、百端待举，迫切需要知识分子加入社会主义建设行列。对于吸引、争取海外留学生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党和政府更是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重视。

1949年12月13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成立了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政务院人事局、文化教育委员会、全国学联等17个单位组成，统一领导留学生回国的各项事宜。委员会主任由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教育部部长马叙伦担任。

1950年1月27日，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向海外各分会发出了号召：“新中国诞生后各种建设已逐步展开，每方面都迫切的需要人才，诸学友有专长，思想进步，政府方面亟盼能火速回国，参加工作。”

## 周恩来亲自策划， “留美科协”组 织留美学生归国

50年代中期，重庆国民党政府与美国政府协议派遣大批毕业生和技术骨干去美国留学和实习，前后约有一千多人左右，加上以前出国留学的，为数更多。这是一批很重要的人材。为此，周恩来、董必武对于做好这些人的工作十分重视，并先后作出指示。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安排下，派计苏华、徐鸣、赖亚力、兰毓钟、薛保鼎等人通过官方考试，以学生护照或官方护照留美，在留美学生中开展“进步科学技术人员活动”。中共在美工作领导小组以“星期五座谈会”为代号，在大城市中建立“建社”、“明社”、“芝社”等小型团体为组织基础，而后又建立了“美中”、“美东”、“美西”等地区性中型科协团体，为成立全国性“留美科协”创造了条件。1949年夏，徐鸣回

国向中共中央汇报在美的工作。周恩来指示，以动员在美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科技专家回来建设新中国为在美工作的中心任务。

1949年6月18日，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匹兹堡举行了成立大会。当时，有匹兹堡、芝加哥、纽约、波士顿、费城等13个区会，会员340人。其中有著名学者华罗庚、赵忠尧、郭永怀、陈省身等人。1950年5月会员发展到718人，区会32个，几乎遍布全美的主要城市 and 地区。区会组织会员学习，座谈有关学习和回国等方面的问题，交流国内消息。同时成立了水利、金属、油脂等26个学术小组，开展学术活动，翻译书籍、收集资料、专题座谈，为回国参加建设作准备。与此同时，还编辑发行了《留美科协通讯》，积极开展宣传工作。经过一系列准备，留美科协于1949年11月做出决议：“本会中心为科学技术之集体学习，以做回国参加建设工作之准备。”1950年3月再次通过了响应国内号召展开回国运动的决议。同年6月份召开的年会，仍以进一步推动高级专家回国运动为中心内容，通过留美科协的积极工作，留美学生回国运动进入了高潮。

## 美国政府竭力 阻挠，我归国 人士备受磨难

1950年2月，以麦卡锡为首的美国狂热反共分子，对许多无辜的美国人和在美的外国人展开追查和迫害，掀起了一股疯狂的反共政治逆流。中国留学生也横遭扣留，许多人因要求回国而受虐待、被捕、监禁。

1950年10月，美国司法部移民局公布了“禁止中国学生出境之命令”。1951年以后，美国政府甚至将中国留学生的护照全部收去，使

● 傅琳

他们成为“非法居留者”，无法离开美国。1951年10月16日，纽约《华侨日报》载：“芝城西报称：此间移民局已接获司法部命令，限制所有属于科学部门之中国学生如研究物理、化学、工程、医药等，一律不得离境。该命令直至美国承认新中国之后始失效用”。

1950年9月19日，“留美科协”被迫解散。“留美科协”的负责人颜鸣臬、黄葆同、李恒德等人，遭到传讯、搜查、拘留。有的人竟被关押在纽约口外艾利斯岛上的监狱里160天之久，后来虽然交款保释，但移民局严格地规定了他活动的地区。

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受到美国当局的无理羁留长达五年，当时美国海军次长丹尼尔·金布尔得知钱学森要回国的消息时，恶狠狠地说：“我宁可把这家伙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那些对我们来说至为宝贵的情况，他知道的太多了。无论在哪里，他都值五个师。”

据当时美国通讯社报导说：“钱学森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工学院喷气式飞机研究站主任，是一个很有成就的科学家。当他在1950年8月间回国时，美国洛杉矶海关检查，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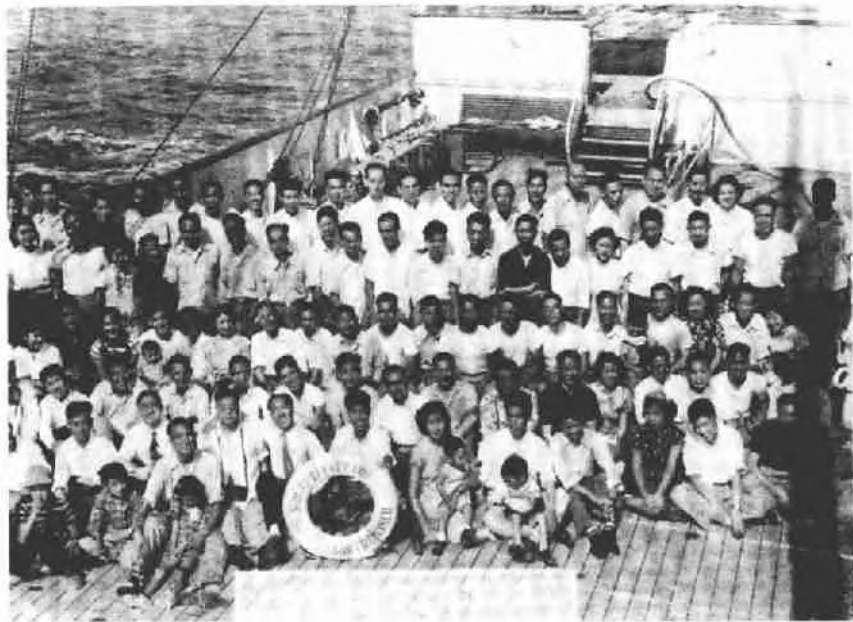
留了他的行李（注：板条箱里满满装了800公斤的书籍和笔记本），并于1950年8月23日通知钱学森，不得离开美国，其活动待调查。美国移民局于1950年9月7日将钱学森逮捕扣留。”

钱学森被捕后，关押在特米那岛上的一个拘留所。看守人员把他当作一个囚犯，进行了毫无人道的折磨和迫害。他们不许他和任何人谈话，每天晚上隔十分钟跑进室内开一次电灯，看看他在做什么，使他无法休息，因为受到种种磨难，钱学森的体重在短短的十四五天内减轻了三十五磅！那非人的拘禁生活，使他的精神受到的损伤比身体还严重。钱学森的朋友们凑了一万五千美元作为保释金，移民局才于9月22日被迫释放了钱学森。但他没有一点自由，他的行动处处受到限制和监视，完全被软禁了。

与此同时，钱学森的学生罗时钧和我国著名科学家赵忠尧、沈善炯三人也被美军无理扣留。8月29日，他们自洛杉矶乘“威尔逊总统号”轮船离美返国时，即遭美帝的凶横搜查，他们所有的书籍，特别是有关物理学的书籍全部被拿去。9月12日经日本横滨时，美军驻日总部

又下令横滨情报部派员检查他们的行李。把认为重要的物品全部取去，其他行李因在船底难于取出，美军驻军总部便决定在该船由香港返回横滨时再行检查。美方人员强迫赵教授等登岸后，先把他们拘押在美国情报部，深夜12时移至东京中野美军监狱，翌晨转移至巢鸭监狱（这是拘留日本战犯的地方）中的“中国犯人室”。他们被无理拘禁两个月后，当威尔逊号返经横滨时，美驻军检查了他们的行李，因找不到藉口，即将他们移至国民党驻日本代表团软禁。直到11月15日，在中国人民不断强烈抗议下，美方才无可奈何地释放他们，但劫去的物品，则拒不发还。”

1950年9月21日《纽约日报》刊载香港9月10日讯说：“今日据由美国乘威尔逊总统号轮船抵达此间的中国留学生称，9月14日，抵达横滨时，美国当局派人上船押走了四位伙伴。他们说，4位学生因钱学森教授案牵连，而受到看管。1951年10月汪良能等九位学习理工的归国学生被扣留。美方用强悍手段阻止我科学技术人员回国服务，公开叫嚣要在经济封锁之外对中国实施‘文化’与‘科学’的封锁。”



1950年10月从美国归来的留学生归国途中在船上合影

## 留美学生不屈不挠斗争，新中国做留学生的坚强后盾

留美学生为争取回国进行艰苦的斗争。他们联合起来，设法通过各种渠道给国内写信，向周总理和高教部汇报美国无理扣留中国学生以及中国留学生与之斗争的消息和情况。他们还争取美国友好人士的同情和支援，并设法取得第三国的帮助。最后配合日内瓦会议的召开，他们将斗争公开化。他们给电台、报纸、美国总统、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写稿、写信，公开揭露美国政府扣留中国学生的不民主、不自由、不人道的伪善面目。

有30多名留学生签名的写给周总理的信中，汇报了留美中国学生的情况，同时表达了他们强烈的回国愿望。他们在信中写道：“我们深爱着我们的祖国，我们需要政府的支持，我们相信我们的申请会得到政府的重视，我们更坚信我们能在人民政府的援助下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信写好后，李恒德、张兴铃、林正仙来到华盛顿，李恒德“闯”进了与我友好的某中立国家的使馆，请求使馆将信转给中国驻他国的大使，再请我们的大使带回国内交给周总理。

留学生在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公开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唯一不能使我们回家的理由是我们获得了技术训练。我们谨此指出，我们所学到的技术训练一点都涉及不到秘密的东西，的确，从美国成立那一天起，传播科学技术知识一直是美国的传统精神。不幸的很，阻挠中国学生回家的政策只能使无辜的人们感到辛酸与苦闷……总统先生，我们诚恳地向你呼吁，允许任何中国学生都可以在他选择离开美国的时候离开美国，我们请求你废

除这条禁令。我们不相信这个大国的安全会因为我们回国而受到丝毫损害，相反地，我们认为这样会使我们两国人民间的友谊与了解更坚固的结合起来……”

这封由梁晓天起草，26人联合签名公开信被广为散发以后，在美国各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美国人民意识到他们的政府做了一件极不光彩的事，一时间，美国的新闻机构——电台、报纸纷纷报道留美中国学生的境况。我国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也多次报道、登载留学生被扣的情况。舆论大哗，使美国当局狼狈不堪。

1950年9月24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李四光，就近来美国政府非法拘捕我国科学家钱学森一事分别致电联合国大会主席安迪让及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书记克劳瑟博士，控诉美帝国主义迫害科学家的罪行，并向美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立即释放被拘捕的科学家，并保证今后不得有类似行动。10月9日，南京市科学家潘菽等169人联名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美国总统杜鲁门；广州科学工作者侯过等1675人分别致电联合国大会主席安迪让、美国总统杜鲁门，一致抗议美国无理扣留钱学森、赵忠尧等人，要求立即恢复他们的自由。11月20日，北京大学理学院及工学院教授曾昭伦等48人，致电当时正在华沙开幕的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请该会主持正义，制止美国政府的法西斯暴行。

1951年12月25日，李四光致电世界和平理事会、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再次谴责美国当局无理扣留我国学生，蛮不讲理的无耻行为。并请求世界和平理事会、世界科协向全世界进步的科学工作者以及爱好和平而主持正义的人们发出号召，抗议美帝国主义这种无耻的罪行，并采取有效措施。

为了帮助留学生顺利回国以及

营救被扣学生问题，1951年11月，由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召集留学生会议，讨论、提出以下措施、方法：

一、关于营救被扣学生：1. 由我人民团体（如科联、学联）写信，打电报给被扣学生的美国校长、教授及其他进步人士与有关团体（如联合国、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科学工作者协会、人权自由联盟、进步党）呼吁释放被扣学生；2. 由我在英语广播中向全世界宣传此事；3. 由同船未被扣学生及被扣学生家属提出抗议。

二、拟定今后留学生归国3条具体路线。

三、我驻欧各使馆要为归国人士，尽快办理签证手续，对路费不够的学生要给予资助。

据教育部1954年12月31日的统计，自1951年4月至1954年9月间提出申请接济旅费的留学生共计87人，分布在美国、荷兰、法国、丹麦、英国、奥地利、瑞典、加拿大、德国等地，其中有44人于1954年底前已回到祖国。

## 通过会谈迫使美国让步，达成遣返平民协议

中美双方在1954年6月日内瓦会议期间，经当时英国驻中国代办的安排，派代表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初步商谈。史称“中美两国代表会晤。”

当时，美国一批在朝鲜战场上被俘的军人和在中国的犯了罪的平民尚关押在中国。中国的一批留学生和科学家则被扣留在美国。美国公众舆论对此反应十分强烈。认为这些在押人员的命运受到了美国政府僵硬的对华政策的摆布，他们将成这种政策的牺牲品。美国政府受到很大压力。美国既想要求遣回

那些在华人员,又不愿同我们直接接触,以免造成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实。因此,想通过第三国来办理此事。

周恩来总理认为我们不应该拒绝和美国接触,在中美关系如此紧张,美国对华政策如此敌对和僵硬的条件下。我们可以抓住美国急于要求在华的被押人员获释的愿望,开辟接触的渠道。

1954年5月26日,我国代表团发言人采取主动,向新闻界发表关于美国政府无理扣押我国侨民和留学生的谈话,而且表示,中国愿意就被押人员问题同美国举行直接谈判。黄华在谈话中指出:“中国留学生并没有犯什么罪,美国政府却剥夺了他们返回家乡与家人团聚的权利,这不仅违背了国际法原则,而且完全不符合人道主义。”

6月5日、10日、15日、21日,中美两国代表就侨民问题举行初步商谈。我国政府代表王炳南在会谈中严正指出:“中国现有五千多名留学生在美国,有不少留学生要求回国,但遭到美方的百般刁难……这是毫无道理的。”“新中国是这些华夏子孙的母亲,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保护他们,他们愿意回来,新中国的建设也需要他们。”要求美国政府“立即停止扣留中国留学生,并恢复他们随时离开美国返回中国的权利。至于留在美国的中国侨民,也同时享有随时回国的权利。”

7月16日和21日,双方派联络员又接触了两次。中国代表团提交对方6名获准出境的在华美侨名单,美方表示感谢。但美方没有提供中国侨民和留学生的情况,并对中国方面提出的请某第三国使节代管双方侨民的利益的建议拒绝考虑。这次“中美两国代表会晤”没有取得积极结果,但在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开始打开了中美接触的大门。

1955年8月1日,中美两国大

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国联大厦举行首次会议。中国政府任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为首席代表,美方任命驻捷克大使约翰逊为首席代表。会谈一开始,我方首先宣读了我国政府释放美国11名间谍的声明,美方表示感谢。随后根据中方建议,将双方平民回国问题列为会议的第一项议程。

关于中国在美国的华侨和留学生,中方要求美方对愿意回国的给予返回祖国的权利,而不加以阻挠,并且指出,美国政府虽在表面上撤销了不准中国平民离境的命令,但许多愿意回国的华侨和留学生仍受到各种压力而不敢说出他们的愿望,或在说出后被迫宣布改变主意,而且很多人回国还有经济问题,因此,只有委托第三国从中协助,才能合理解决这个问题。

在会谈中,我方代表王炳南就钱学森的回国问题向约翰逊提出交涉,约翰逊狡辩说,没有证据表明旅居在美国的中国人想回去。他一再声称“美国务院已经在这一年的4月间发表公告,取消了过去扣留中国学生的法令。约翰逊还信誓旦旦地向王炳南大使保证,美国政府对任何想去共产党中国的中国人都不加任何限制,所有以前被命令留在美国的技术人员已经得到通知可以自由离境”。王炳南大使当即予以驳斥。他质问道:“请问大使先生,既然美国政府早在今年4月间就发表了公告,为什么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博士还在6月间写信给中国政府请求帮助回国呢?显然,中国留学生要求回国依然遭受种种阻挠。”

6月15日,钱学森在一封给国内的家书中夹带了给陈叔通副委员长的信,恳请政府帮助他早日回国。他在信中说:“……被美政府拘留,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但是现在报纸上说中美有交换被拘留人之可能,而美方人说谎谓中国学生

愿回国者已放,我们不免焦急。我政府千万不可信他们的话。去(注:除)学森外,尚有多少同胞,欲归不得者。以学森所知者,即有郭永怀一家……其他尚不知道确实姓名。这些人不回来,美国人是不能放的。当然我们在长期等待解放,危急如火,惟恐错过机会,……”总理看到信后,认为此信很有价值,对将要举行的会谈有用。于是周总理通过外交部信使将信转了王炳南大使,并指示王炳南在适当的时机,用铁证揭露美方的谎言。外交部在给王大使的电报中也明确指出:“我方应在此次大使级会谈中,谈到我留学生和侨民问题时,具体问美方关于钱的情况和是否放他回国。如果对方肯肯定答复,即不再提,如不肯定,则提出释放的要求。如说不放,则用说理的态度而坚持释放的要求。”事实胜于雄辩。我方在会谈中取得了主动权。因此,美国政府不得不在8月4日匆忙通知钱学森可以离美回国。

经过会谈,双方终于在9月10日就平民回国问题达成了协议,并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两国大使协议的声明》,中美双方承认,在各自国家内的双方平民享有返回的权利。并宣布已经采取,且将继续采取适当措施,使他们能够尽速行使其返回本国的权力。中美两国分别委托印度和英国政府协助中美平民返回本国。这是中美大使级持续15年会谈中达成的唯一协议。

50年代末,周总理曾经在一次会议上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至今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其实,我们不仅要回了一个钱学森,而且要回了一批科学家,一批新中国科技事业创业、献身的一代楷模。

(责任编辑 余人)



# 投笔从戎 为国捐躯的董启文

● 张 沛

他身先士卒，为党为国，奉献了年轻生命。

1948年2月20日，在鞍山市郊宋三台子前沿阵地上，时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十八师五十四团参谋长的董启文，亲临前沿阵地指挥作战，不幸被敌人炮弹打中，他捂着被炸伤的肚子，坚强地把露出的肠子塞进腹腔。他知道死亡临近，仍用尽最后一点力气，以十分微弱的声音，对他的警卫员说：“……还没有把解放的旗帜插遍全中国！……好兄弟，这个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只能由你们去……”这是董启文烈士的最后遗言。

董启文是我在延安工作时结识的一位老战友。他于1914年出生在四川省江津县，父亲董芸滨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在川军刘湘部任少将参军。他在抗日战争初期曾帮助我党中央特派员、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做争取刘湘及该部将领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我党合作的工作。全国解放后，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

1925年，11岁的董启文随家庭迁移到武汉市上小学、中学。他亲眼看见北伐革命军攻打占领武昌城，赶走了军阀吴佩孚。受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胜利的影响，他参加儿童团。1927年震撼全中国的大革命失败了，他又目睹了残酷的白色恐怖，萌发了向往革命的斗志。

1932年董启文转赴北平中华中学读高中三年级时，加入了党领导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进一步接受革命影响。1933年1月纪念“一·二八”上海抗战一周年时，他加入了地下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到门头沟煤矿工人中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募捐活动。

1933年初，日寇加紧对华北、平津的威胁。这时，已进入北平中国大学学习的董启文，于1933年5月，参加了吉鸿昌领导的抗日同盟军义勇军部队。董启文任排长，随部转战热河长城内外，在攻克多伦等战役中，他率领全排勇敢杀敌，卓建战功。同年7月他在火线上转为中共正式党员。这一年秋，由于蒋日勾结，冯玉祥将军被迫下野，吉鸿昌将军被捕英勇就义。同时，国民党反动派残酷镇压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北平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在这种险恶的政治形势下，董启文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1934年夏，他利用合法身份，考入南京国民党军政部化学兵队（化学兵学校）学习，并创建了秘密革命组织“读书会”，传播革命思想。

这时，中共浙南特委要求“读书会”派一批军事干部，到浙南来开展游击战争。董启文立即组织进步青年到浙南工作。

1936年5月，董启文到达浙南后，担任了

中共浙南特委副书记、军委副主席，负责指挥作战。

这年冬初的一个暗夜，在董启文统一指挥下，浙南红军游击队兵分两路，直扑向水头镇伪区公所，消灭了“杀人魔王”伪区长。

这次战斗俘敌官兵40余人，战斗的胜利大振了游击队的士气。同时，董启文还率部智取了一股匪徒，奇袭了宜山岔宫的保卫团，从此浙南游击区迅速扩大。不久，董启文担任了全区武装部队的司令员。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董启文经批准离开浙南苏区，来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我也是在这时，结识了启文，他虽然年长我8岁，但我们深厚的交情，直到他牺牲的前夕。

由于董启文具有广博的军事理论知识，又有长城抗战和浙南游击战争的实践经验，他先后被抗大校部派到四期四大队（我恰好在这个大队十队学习）、五期职工大队当政治和军事教员。他向学生通俗概要地讲“资本论”中商品的一章，讲克劳什维茨“战争论”的要点，讲毛泽东的“论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在对付现代化装备的优势敌人时，如何实战运用，讲孙子兵法的要旨在现代化作战中应用等等。由于他深入浅出地生动讲述，使那些文化不高的男女学生都听得懂，因而课堂情绪活跃，深受学生欢迎。董启文不仅专心致志在教学上下功夫，还参加党的建设，帮助党支部、民先队、俱乐部（救亡室）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和文体活动。因而，1938年底董启文被抗大党委评奖为“党的积极分子”，出席了党的积极分子会议。

1939年董启文被选派到延安马列学院深造。

董启文善于思考问题，在政治上头脑敏捷、清晰。1938年冬，延安城墙上出现一幅标语：“统一战线高于一切，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董启文看到后，认为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如果实行这个口号，势必导致我党丧失革命领导权。这时，董启文只有24岁。他夏天畅游延河，冬天在延河上溜冰，甚至在冰窟窿中洗澡。他驰骋球场，是抗大篮球校队的一员猛将，他还能熟练地掌握田径、马术运动技能。由

于董启文性格豪放，喜欢广交朋友，许多年轻人都认识他。

1942年军政学院同中央党校合并，董启文又调至培训高级干部的党校一部学习。可是，到1943年延安开展所谓“抢救运动”时，他被康生的极左路线诬陷为“反革命”、“国民党特务”，反复对他采取逼供信的手段，甚至有一段时间使他失去了人身自由。但不论怎样逼供，他的回答只有一句话：“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当毛泽东洞察“肃反”的真情，下达了9条指示，纠正运动中发生的“左倾”错误时，被审查的大多数人都平反了，可是董启文仍然在监视审查中。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延安一大批干部被派往东北开展工作。董启文急切希望投身到新的斗争中去。经过他自己再三申辩，终于取消了他的“反革命”的结论。但仍保留了一个“特务嫌疑”的尾巴。1946年初，就带着“特务嫌疑”的组织介绍信，和一批干部奔赴张家口。当地领导机关看了他的介绍信后，迟迟不给分配工作。董启文又日夜兼程赶回延安，找中央组织部解决他的“尾巴”问题。中组部的夏大姐（夏之栩）了解了他的全部情况后，决定取消这个“尾巴”。

1947年6月，董启文被批准调到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十八师五十四团任参谋长。1948年2月，五十四团随大部队挺进南满，2月19日，我东北民主联军一部，在四纵队司令员吴克华的統一指挥下，向鞍山敌军发起了合围，战斗异常激烈。董启文率部于2月20日攻打鞍山市西郊宋三台子时，不幸中弹壮烈牺牲。他阵亡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团，全体指战员无不万分悲痛，他们高呼着复仇杀敌的口号，一举攻克宋三台子，与兄弟部队会师后，直捣鞍山，围歼守敌13000人，在攻占鞍山制钢厂时，五十四团就俘敌二千余人。

他在出师反攻征途中，给我写的一封信中说：“黄鹤一去不复返……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不惜马革裹尸，战死沙场！”

对于老友的不幸牺牲，直到现在我仍然怀着十分痛惜和怀念的心情。

（责任编辑 方实）

# 我为毛泽东作俄语翻译的日子

● 李越然

**编者按：**李越然是我国俄语界著名翻译家，曾在许多重要国际活动中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翻译，并长期参加党中央、国务院重要文献、报告和文件的中俄互译的审定工作。从作者的这篇回忆录中，读者可以领略毛主席那平凡而又伟大的领袖风采。

从1949年8月起至1963年10月，我曾有幸多次在国内外重大的外事活动中为毛主席担任俄文翻译，如今回忆起当年的一些情景，仍令我兴奋不已。

1949年7月中旬，刘少奇同志从莫斯科请来了科瓦廖夫（苏联交通部长）为首的苏联高级顾问团，近百名成员到达沈阳后，乘专列入关进京。为了这批首次来华的苏联专家一路生活得好些，特别从当时中长铁路沈阳铁路局抽调了几位苏联女职工，到餐车上做临时服务员。我随苏方顾问团到京后，同中长铁路苏方局长杜拉索夫和上述十几位妇女住在当年的德国饭店（即现在的崇文门饭店）里。

8月底的一天下午三时许，一个车队载着我们进入新华门，先往左，然后沿湖靠右行至瀛台对面的勤政殿，北平军管会交际处的王拓同志才告诉杜拉索夫局长：“是毛主席要接见你们。”杜拉索夫激动地说：“要知道是毛泽东同志接见，我一定戴上我所有的勋章。”

毛主席健步走了进来，脸上泛着红润的光泽，和蔼可亲地和在场的每一个人握手。

当毛主席那只又大、又厚的手握住我的手时，主席亲切地问我：“你这个小鬼是作什么工作的呀？”我诚惶诚恐不知该如何回答，站在主席身旁的师哲搭话说：“这个小鬼是在沈阳联合会上担任翻译工作的。”主席笑眯眯地瞅着我说：“哦，翻译同志，那好哇。我讲几句话，你翻译一下好吗？”

主席开口的第一句便是对我翻译工作的测验。主席面对苏联朋友说：“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这句问候

若直译俄语，很可能被翻译为，“你们都累了”，而这里并没有累与不累的含义。我只好译成：“感谢你们在列车上提供了很好的服务。”

受到毛泽东主席亲切接待的这些随顾问团临时来工作的妇女同志，个个喜出望外。后来我才知道，是周总理到丰台火车站接刘少奇同志和顾问团后，特向主席汇报说此行还有十几位苏联女同志的。主席当即做出要见一见她们的。

1949年“十月革命”节前夕，毛泽东率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全体同志，出席了苏联顾问团在北京铁狮子胡同（现今张自忠路23号）举行的集会，并即席发表了讲话，他讲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发展和壮大，以及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支援等等，特别讲到了这样一段话，他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经历了千辛万苦，不知出现了多少个曲折，是不是能够取得胜利呢？这不仅在我们国内有人怀疑，在国际上也有这样或那样的怀疑。”主席接着说：“可是我们胜利了。如果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不能够取得胜利，那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灵喽！”这一席话不仅回答了国际上对中国革命持异议的人，更重要的是反映出毛泽东对当年斯大林领导的第三国际早有看法。

如何把主席这段深刻而生动的话译准确呢？特别是怎样把“不灵了”翻译出来呢？我很快想到主席这话的正面含义是说：“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我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因此我不能从一

般的宗教信仰角度来表述这个‘不灵喽’，而是果断地把它译成了：“失去了真理性”。

主席有时很愿意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谈天说地，随时给你提出问题，让你讲自己的思想观点，作出回答。有一次他问：“小李同志，你说曹操和诸葛亮这两个人谁厉害？”这一下子把我问住了，我支支吾吾地说：“主席，我对三国不太熟悉，没有作过这个比较。”主席说：“哎，那可不行，这本书至少要读三遍，这里头辩证法可多呢。曹操不比诸葛亮差，尽管演戏的时候把他扮成白脸，实际上这个人可厉害着哪，他最大的特点是会用干部。”

当年为主席担任英文翻译的浦寿昌同志，早年留学美国，并获得经济博士。一次主席问他：“浦博士啊，你是学经济的，你讲一讲你对美国经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什么看法？”主席出了这样一个很难回答的大题目，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主席便鼓励他说：一个人要有自己思想的闪花，对任何问题要有自己的见解，说错了没关系。没想到主席对浦寿昌的答卷很满意，他高兴地对我们两人说：“你们一个学日抗日，一个学美反美，看，总是学生反对老师。”想不到主席还知道我在日伪统治时期上学的经历。

主席博览群书是大家都熟知的，主席一辈子读过多少书恐怕连自己也说不清，我就亲眼看见他津津有味地读书。他古书读得很多，这是事实，但他也很注意了解国际形势。他一生虽然只到过苏联两次，但他了解西方各国情况的兴趣是很浓的。他曾对中央领导同志讲：“谁能够请我毛泽东去访问呢？戴高乐？不可能。日本的岸信介？不可能。还有美国的艾森豪威尔？更不可能。我上哪儿去呢？另外我去了跟他们谈什么呢？在我这里就卡住了，你们下边还怎么办呢？我是出不去了，但是，少奇、总理、小平你们要多走一走，看一看，不能总在家里呆着。”

主席曾下决心学习英语，他学得很认真，读书时一手拿着英语字典，一手拿着红蓝铅笔，发现新的词汇马上就记下来。但是，主席的口语一直没有过关，英文的发音始终带有浓厚的湖南乡音。有一次他问我：“李越然同志，‘纸老虎’外文怎么说？”我用俄文回答，主席也用外语重复了这个词，把我说愣了，他说：“拍拍太根儿”，我马上明白主席在说英文，他把这个词汉语化了。我终于忍不住乐起来，主席自己也笑了。

毛泽东很不习惯各种各样的排场。

1957年去莫斯科之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小李，你赶紧去见尤金大使，主席已经交待了，到了莫斯科之后不要搞三军仪仗队，来接的人越少越好，最好是下了飞机上车就走。”我说：“这恐怕不行。”杨尚昆同志说：“你去跟尤金大使商量商量，主席有这个意思呀。”我到苏联驻中国大使馆见

到尤金。尤金大使听到我的转述后也感到为难，他说：“这个我做不了主，我必须报告苏共中央。”

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张照片，登在1957年11月《人民日报》一版的右上版上，是这次主席去莫斯科飞行途中，穿着大衣聚精会神看文件时照的。文件是我呈送给他的在莫斯科机场的讲话稿，他看了之后，说：“尚昆啊，到了飞机场还要讲话吗？”尚昆同志说，按照国际惯例是应该讲话的，主席说：“要讲话，随便讲两句不行吗，还得用稿子吗！”尚昆同志说：“主席，这个稿子给你作个准备。”

“准备，那好哇。”主席说着便把稿子迭成三折，并把我拽了过去，擦开我的西服上衣，“好，作‘准备’，你就拿着吧”。随手塞进了我的口袋里。

飞机抵达莫斯科伏努科夫机场上空，往下一看，怎么红旗招展，三军仪仗队整齐排列，威武雄壮；下飞机又见前来迎接的人很多，苏共政治局的领导几乎都到了，还有胡志明等先期到达的兄弟党领导人。主席在礼官的陪同下检阅了三军仪仗队，和前来迎接的官员们握手寒暄后，宣读了书面讲话，便在赫鲁晓夫陪同下乘车走了。在车上主席问赫鲁晓夫：“我不是请求你们不要搞三军仪仗队么？”

赫鲁晓夫说：“不错，尤金大使同志向我报告了你的意见，我们所有的人都反对，说各国领导人来了我们都是最高的礼仪规格，为什么毛泽东来了却把三军仪仗队取消了？”

主席笑了笑说：“依我看，等到共产主义实现了，这一套就没用了。”赫鲁晓夫也会意地笑了。

这次在去莫斯科的飞机上还有一段故事。主席让我把苏联大使、著名哲学家尤金请过来。主席说：“尤金同志啊，我们是老朋友了，你是个大哲学家呀。”

尤金说：“毛泽东同志，大哲学家实在不敢当。”

主席说：“你既然是研究哲学的，我出个问题考考你行不行？”

尤金说：“可以呀，我争取及格。”

主席微笑着说：“你说，刚才我们两个人在机场，现在上了天，一会儿又落地，这在哲学上怎么解释？”

尤金面露难色；主席却露出得意的神色：“怎么样？考住了吧，我来答一答好吗？”

尤金连说：“好，好。”

主席说：“飞机在地上是肯定，上天是个否定，一会儿下去是个否定之否定，你说是不是啊？”

尤金笑了。

到了莫斯科后，赫鲁晓夫根据主席的请求专门安排了一次与苏联哲学界代表人物的会见。会见中主席提出了很多问题，其中主席问道：“你们有什么办法把哲学变成普通劳动人民手中的思想武器？”哲学家们答说：“我

们帮助劳动人民总结经验提高到理论上不就行了吗！”主席表示，这还不够，这还是学者们的见解，还不是劳动群众自己的东西。

毛泽东有他独特的生活习惯。中国代表团住进克里姆林宫后，主席被安排在最豪华的寝室里。他到寝室没有二十分钟，便在李银桥的陪同下从楼上走到楼下我住的房间，在这儿审视再三后回到自己的寝室，又把我叫去郑重地说：“我求你一件事，你去和苏联同志商量一下，是不是给我换换房子，这间房子太大我住不惯。我上你那里去，你搬上来住，好不好哇？”

我连忙站起来不住地摆着手说不行。并立即下楼报告了尚昆同志。结果杨尚昆、陆定一、胡乔木、叶子龙、王敬先等领导同志一起上楼作主席的工作，才勉强说服了主席。

某日夜里，当地时间三点多钟，主席让李银桥把我找到他的房间，已经躺在床上的主席，拿给我一支红蓝铅笔和一个苏联大信封说：“我说，你写，赫鲁晓夫同志我已经睡觉了，明天谈和平过渡问题请小平同志跟你谈，我不参加了，好吗？”我遵照主席指示写好后，递给主席看，主席说：“我不是让你写中文，是让你写俄文。中文我自己不会吗？你重写一张。”我重新写好并翻译给主席听后，主席便在信封上写了“毛泽东”三个字说：“请你给赫鲁晓夫同志送去。”我估计这个信封很可能还保存在莫斯科的哪个档案里。

1957年，毛泽东亲自率领代表团出席莫斯科会议，在国际共运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主席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当年都有记录，无须我再赘言，但我认为，仅撷取翻译主席讲话的一些花絮，都是很有意义的。

实事求是地讲，给毛泽东当翻译，我的水平是很不够的，只是靠集体的力量互相弥补才勉强地完成了任务。

在第一次共产党会议上，我给毛泽东翻译的第一句话就出现了错误。主席说：“请允许我即席讲话。”由于我听不懂他浓重的湖南口音，一时紧张，我把“即席”听成了“继续”，翻译出来后立刻觉得不妥，第一次讲话哪有继续可谈？多亏坐在二排的同行赵仲元同志的提醒，我才把“继续”改“即席”。

主席讲到辩证法时，说到原子、中子、粒子，其中“粒子”一词我不会翻译，是当时坐在旁边的宋庆龄副主席帮了我的忙，她用英文说出了这个词。

主席讲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说到了一句俗语：“中国有一句俗语叫作：三个臭皮匠凑成个诸葛亮。”这句话本来不难翻译，俄文中也有相对应的谚语：“一个头脑好，两个更强。”可是我不能直接套用，一是主席生动的比喻立即引起了中国代表团强烈反响，大家发出了笑声，气氛活跃，如果套用俄语中的谚语，很难引起相应

的现场效果；二是主席原语中有诸葛亮，一个人物姓名又不能删节，只能译音。我如何翻译才能贴近主席的原意呢？各国党的领导人都坐在那里，英、法、日的同声翻译也在等着我，我大脑语库中的各种词汇瞬间翻来覆去，最后我采取了镶嵌句同位加词的翻译方法，用俄语说成是：三个蠢人也能成一个最聪明的人，他叫诸葛亮。”全场的反应很活跃，赫鲁晓夫带头鼓掌，主席也高兴了。

还有比这更难翻译的，也是在这次会上，主席讲到帝国主义时说：“美帝国主义天天张牙舞爪，但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吹得神乎其神，为什么他连一个山药蛋也发不上去？”主席所说的“山药蛋”是相对苏联1957年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而言的。主席不是用一般的语言形容帝国主义自吹自擂，而是生动地用发射不了“山药蛋”来形容帝国主义不是什么都行的。主席继续说：“法国人也到处挑衅，跑到越南去，有什么了不起的，不是也让我们胡志明同志打得个‘屁滚尿流！’”主席没有使用“望风而逃”、“狼狈不堪”等词汇，而是用了老百姓经常使用的语言，这又使我犯了难：“屁”和“尿”翻不翻呢？虽然在俄语当中很容易找到相应的词汇，把“屁”和“尿”两个词搭配起来也不难，但如何翻译，既不失毛泽东语言的特色，又不致让外国人听起来粗俗呢？几秒钟的思考后之，这样的话脱口而出：“法国人来不及上厕所就便在裤子里了。”我的翻译符合主席的原意，符合俄语的规范，讽刺挖苦地把帝国主义的狼狽相都揭露出来了。

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会后苏共中央举行大型的招待会，主席即席发言，在讲到各国人民和各国党应该团结起来时，主席比喻说：“两个泥菩萨，一起被打碎，用水调和再做两个，我身上有你，你身上有我。”任何其他的形容语言都不可比拟如此紧密的关系，但我翻译到“你身上有我，我身上有你”的时候，很难找到恰当的词汇，多亏在场的苏联副外长、著名汉学家费德林，给我提了一个词，才帮助我度过了难关。

在共产党会议期间，为了各兄弟党的团结，毛泽东做了许多工作，比如，主席刚到莫斯科就问赫鲁晓夫，各国代表都来了没有，南斯拉夫代表团来了没有。

赫鲁晓夫说：“我们给铁托发了邀请信他不来，他失礼了。如果他来了更好，我们可以狠狠地批他一下。”

主席说：“这样可不行，兄弟党不能搞这个，九国情报局把人家开除了，斯大林把铁托整得够可以的了，人家肚子里有气呀，满肚子气到这里说一说，松一松气，沟通沟通不好吗？”

南斯拉夫不参加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会议，它反对阵营，但派卡达尔出席了64国会议，毛泽东很重视这位来自南斯拉夫的代表，他说：“我要会会他，听他谈谈

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究竟是怎么回事。”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特别说：“这次南斯拉夫同志来了，我相信世界上有风吹草动，靠得住的还是朋友。”

波兰的哥穆尔卡，不卖赫鲁晓夫的账，关系搞得很僵，毛主席曾到哥穆尔卡下榻的别墅，交换各自的看法。

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开得是比较成功的，会议期间，毛泽东既有适度的支持，也有坦诚的、严肃的批评，相互表现出应有的尊重。主席确实说过：“赫鲁晓夫是多灾多难的，他很勇敢，他敢于去碰斯大林，这一点就不容易，给我们搬掉了多年压在我们头上的大石头。”主席还讲到：“赫鲁晓夫同志，你这朵花比我毛泽东好看。但是中国有一句古话，就是红花虽好，也得绿叶扶，一个和尚两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意思是说赫鲁晓夫是需要各方面的支持的。

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之后，1958年的上半年，双方的交往和合作还是很多的。到下半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7月31日，赫鲁晓夫秘密抵达中国。在这之前，苏联驻华大使馆尤金受苏共中央、苏联政府的委托，两次要求见毛泽东，毛泽东接见了，尤金提出苏联要和我们建一个长波电台，搞一个联合舰队。主席问尤金这是什么意思？尤金作为一个外交官、一个学者，他讲不清楚，主席很恼火。7月22日主席同尤金谈话时，讲出了长期放在心里的话，主席说：“我去年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同赫鲁晓夫等同志谈过，当时我说：“什么兄弟党，只不过是口头上说说，实际上是父子党、猫鼠党，现在你们又要跟我们在海军问题上搞什么合作社，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我们本来想买你们的核潜艇，我们现在不搞了。”

尤金将主席的谈话报告了莫斯科，结果赫鲁晓夫决定亲自来北京和毛泽东谈判。

迎宾车队从南苑机场直接开到了中南海的颐年堂。平常主席在车里总要寒暄几句，这次主席神态严肃，一句话也没说，气氛紧张。下了车双方就开始谈判，我方参加谈判的只有邓小平同志。我和阎明复同志当翻译。对方是赫鲁晓夫和副外长费德林。寒暄之后，主席让赫鲁晓夫说明一下为什么要搞共同舰队，赫鲁晓夫说道：我们的海军刚刚服役，为了对付美国的第七舰队我们需要联合起来；关于长波电台是为了保持联系等等。他的发言加上翻译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主席站起来说道：“你讲半天，还没有切题。”然后指着他的鼻子厉声问道：“我问你，什么是共同舰队？你说！”主席继续说：“你是不是要把我们的沿海都拿去？你都拿去好啦！你是不是要控制我们？说老实话！”

赫鲁晓夫支支吾吾地说：“共同舰队，共同就是要和你们共同商议商议。”

主席大手一挥说：“涉及主权问题不能谈判！你们是

要搞控制。共同舰队是你指挥，还是我指挥，听谁的！”

第二天，杨尚昆主任把主席认为我翻译时气势不够的意见转告了我，我趁主席和赫鲁晓夫继续在游泳池会谈之前，主席准备下水的时候跟主席说：“主席，听说您昨天不满意我的翻译？”

主席说：“对啊，你的劲不够哇，你是不是怕赫鲁晓夫？”

我说：“主席，赫鲁晓夫的脾气我是知道的，非常暴躁，您指着他，他不敢说什么；我要指着他，他可能就冲着我来呀，结果就会弄得你们两位老人家下不了台，可就不好办了。”

主席笑着说：“对，对，有道理，这么说我误解你了。”

主席还说：“对赫鲁晓夫这个人是要碰一碰的，当然也不是什么都碰。”

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又谈了斯大林的问题。

赫鲁晓夫说：“你们中国共产党在斯大林的问题上前后不一致，先是支持我们，后是反对我们。”

主席说：“不对，你批判斯大林是可以的，但是不可以一棍子打死。”

赫鲁晓夫不再强调这个问题，转题说：“那么，你为什么往我的后院里扔石头？”他仍指我党在对苏共处理斯大林问题的反映。

主席说：“我不是给你扔石头，我是往你脸上抛金子。”

赫鲁晓夫说：“别人的金子我不要！”

主席说：“你要不要是你的事，抛不抛是我的事，我是助你一臂之力！”

两个人就这样针尖对麦芒地争论着，赫鲁晓夫不无关心地问主席：“听说你昨天睡得不好？”

主席说：“我没睡好，我心里有事情，睡不着。赫鲁晓夫同志我告诉你，有多少外国人到中国来，最后没有一个站得住的，都是走，中华民族是最难同化的！”

赫鲁晓夫哑口无言。

在我国国庆十周年的时候，赫鲁晓夫访美后直接来华参加庆祝活动。在与中国政治局谈判中对我党进行了种种指责，如：达赖问题、中印边界问题、炮击金门问题、要我们释放U2飞机的间谍等等，对此，毛泽东进行了全面回驳之后说：“赫鲁晓夫同志，你这次来给我们戴了几顶‘帽子’，说我们要充当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派等等，我也送给你一顶，叫右倾机会主义。”

通过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经历我深深感到，毛泽东的伟大，在于他时刻关心着中华民族的利益，把捍卫国家主权视为自己的天职。他既是一位伟人，又是一位普通的人，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伟大与平凡的统一。

（责任编辑 文 贤）

# 五位将军一次苦涩的欢聚

● 郑织文

如今聚会已经很时兴了，每当看到身边的子女或周围的同志去参加那些充满欢声笑语的聚会时，我都要想起在那个不允许聚会的年代，一次令我终生难忘的苦涩的欢聚。

1973年春的一天，一大早，我就顶着寒风，从北太平庄赶到西单菜市场买菜。走一路嘀咕了一路，就怕买不到东西。因为，秦基伟、廖汉生、黄新廷、李成芳四位老同志要来我家，这次的采购实在不同以往。

他们四人与我老伴金如柏都是我的老首长、老战友，“文化大革命”中被关押看管四、五年，刚刚被放出来。他们五个人来自红军时期的三个方面军：秦基伟、李成芳来自四方面军；廖汉生、黄新廷来自二方面军；金如柏原先在一方面军，长征前夕随红六军团西征，后来加入了二方面军。五个人“文化大革命”前都在大军区担任领导职务：黄新廷任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任昆明军区司令员，廖汉生任北京军区政委，金如柏、李成芳先后任昆明军区政委。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先后被打倒，备受摧残；廖汉生被关在石家庄一个军营里，黄新廷关在北京卫戍区，金如柏关在总政自设的“监护室”，秦基伟、李成芳则关在湖南的一个劳改农场。大家过去在战争年代就十分熟悉，有的还是生死之交的战友，解放后又都在大军区工作，交往频繁，再加上“文化大革命”中共同的遭遇，共同的感情，这些因素，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那时“九·一三”事件已经过去了一年多，政治空气明显出现一些缓解，中央作出了恢复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五一”劳动节后，报纸上已登出很多受迫害、被打倒的老同志参加游园的消息……人们从中看到了一线转机，暗自相慰。但现实毕竟还是现实，“四人帮”还在，被放出来的人还是一无组织明确的结论，二无组织分配工作，甚

至居无住所。在那个年代，今天刚“解放”，明天又重新被打倒的例子并不少见。大家还必须谨言慎行。这五个放出来不久的人，今天敢凑到一起吃顿饭，也是需要一些勇气的。

这个目的十分简单、感情却十分深厚的聚会成功与否，我这趟采购举足轻重。说来也实在幸运。在货架上东西不多、到处排队的西单菜市场，竟使我买到一只填鸭、一块肥猪肉、几条小鱼和一些素菜，总算有了聚餐的基本物质保障。

那时候，想吃点好东西也不是很容易的。性格开朗的廖汉生一进门就高声大嗓地问：“为我们准备什么好吃的呀？”

热情活跃的秦基伟先进厨房进行侦察。

平常言语不多的黄新廷很细心，他还记得我是开封人，专门带来一只开封的“桶子鸡”。

李成芳不但带来一只甲鱼，还自告奋勇要亲自操刀，做一道湖北风味的菜肴。

廖汉生的夫人白林、秦基伟的夫人唐贤美、黄新廷的夫人田慧琴、李成芳的夫人刘迪也都来了。我怕人手不够，还提前一天把在房山工作的女儿叫回来帮忙。两居室的一个小单元内填进来11个人，真是热闹非凡。

我们原先家住在东城小雅宝胡同，“文革”中不知被造反派抄了多少次家。1969年12月30日，离元旦只剩下一天，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只用了半个空间就把那个“家”拉到这里。我和老伴金如柏守着这个家，每日我买菜、他做饭，我拖地、他擦桌子，然后就是看报纸。几张报纸一遍一遍地看，看完便沉默不语，不看报纸的时候，坐在桌前，望那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只有我知道，他是在牵挂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

就是这个小单元住房，也成了这几位来客最向往的地方。它总算属于我们的一个“家”，而他们都还

临时住在招待所里。

饭菜靠大家动手。除了黄新廷拿来的开封“桶子鸡”、李成芳自告奋勇“承包”的清炖甲鱼外，秦基伟夫人唐贤美要做香酥鸭，廖汉生夫人白林要烧芋头，我要做的是金如柏家乡名菜江西“干烧肉”，黄新廷夫人田慧琴则帮我们剥葱剥蒜。

为了不再让那些热情颇高、总想自己“一试身手”的人们再到厨房里来添乱，我和女儿将房间内两个双屉桌在床边拼好，再找来两把椅子，安排廖汉生、秦基伟、黄新廷和金如柏四个人打扑克。沏好一壶茶自斟自饮。

这边刚安顿好，那边李成芳就出了事，杀甲鱼虽然是他年轻时的拿手戏，多年不干毕竟生手。他让我女儿做助手，用一根筷子引诱甲鱼。甲鱼紧紧咬住筷子头后，他在一旁朝伸出来的甲鱼头一刀砍下去。方法是不错的，但由于太专注了，用力过猛，一刀砍得甲鱼鲜血四溅，结果满衬衣都是血污。这下子夫人刘迪也有了差事，一边埋怨丈夫“越帮越忙”，一边找盆找洗衣粉，赶紧去清洗。

热闹的还有在卫生间里烧水做芋头。如柏有哮喘病，每年烧暖气前和停暖气后怕他受凉，我特地找孩子的同学帮忙在卫生间安了一个蜂窝煤炉。这次聚会，厨房煤气的灶眼不够用，我要烧水，廖汉生夫人白林，要烧芋头，只好到卫生间的蜂窝炉子上来操作。哪个要进卫生间来“方便”，还得和烧水的、烧菜的女士“换防”。

时过正午，饭菜大体就绪，厨房飘来的香味，早动摇了他们争个输赢的决心。最后一盘匆匆收场，也跟着忙乎起来。廖汉生和黄新廷手忙脚乱把桌子拉开，金如柏又去找椅凳。秦基伟插不上手，转来转去为自己找到一个倒痰盂的差事。

原本好意让大家“垫垫底”，便

先端上来一盆醪糟打鸡蛋。谁知廖汉生上前一看，正餐未见先上汤，岂不是要用汤将大家灌饱不让吃饭，便指着醪糟打鸡蛋大声抗议说：“这是阴谋！”大家听着这十分熟悉的语言都哄堂大笑。“阴谋”已是当时的常用名词。多少人为了它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将军，“文革”中没有一人没受过这个指责。大会小会批斗，“喷气式”、拳打脚踢，都是从这个字眼开始的。当然，此刻廖汉生随口溜出来的“阴谋”是另一回事，所以阴谋也罢，阳谋也罢，说归说，转眼间，便把醪糟打鸡蛋吃光了。

品尝着唐贤美做的香酥鸭，白林烧的芋头，我做的“干烧肉”……个个是赞不绝口。其实谁都心里明白，大家的心情绝不仅仅在饭菜上，身陷囹圄多少年，身心紧张了多少年，“大难不死”的战友们，今天相聚，要这样放松一下，能没有好胃口，好心情么？

金如柏又讲起了1940年，在晋西北那次吃羊肉的事。那个时候十分艰苦，部队天天吃黑豆，一些人患上了夜盲症。听说羊肝可以治“夜盲”，供给部门弄到一只羊，想给大家一些补养。肉炖好后，连盐都没有，一个战士发现有一灌黑呼呼的东西，高兴地说：“找到酱了”，急忙倒进锅里，却是一罐油漆。一锅羊肉吃不成了，大家跳呀叫呀急呀骂呀……

这饭吃得可真热闹，椅、凳不够坐，就挤在床边，有的干脆坐在过道里的破木箱上，我作为女主人，一直靠在门框上。

这顿饭吃得我终生难忘。我1939年16岁离家去延安，青春在战争硝烟中度过，最感缺少的就是欢聚。没想到解放二十多年后，这些为新中国南征北战的老同志，在“文革”中精神会受到折磨、人格会受到污辱、身体会受到摧残！想起这些，

望着这几位身经百战伤疤累累的将军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聚会，我心里禁不住一阵阵酸楚，不由得背过身去，悄悄流下了眼泪。

这是一次苦涩的欢聚，屋里的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受过伤害的心，他们内心深处有着多少委屈、多少辛酸、多少无奈、多少难言的苦衷？而等待他们仍是莫测的命运，因为当时“四人帮”还在台上耀武扬威！

大家吃着，谈着，笑着，互相开玩笑，讲到有趣处甚至开怀大笑，但都不说自己，不谈自己遭遇的磨难和痛苦，也不谈眼前不平的处境。他们作为不屈的战士，作为多谋善断的将领，深深懂得在什么时间、什么问题上需要保持沉默。这沉默，犹如火山爆发前的宁静，火焰即将喷礴而出。

果然时局剧变，“四人帮”迅速垮台。曾在这个小单元里聚会过的五位老同志，又纷纷走上领导岗位：秦基伟先后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廖汉生先后任南京军区政治委员、沈阳军区政治委员；李成芳任武汉军区政治委员；黄新廷任军委装甲兵司令员；金如柏任军委炮兵政治委员。

时间又过去了23年。李成芳、金如柏已经作古多年，秦基伟去年病故。廖汉生、黄新廷也都是八十多岁的老人，偶而谈起当年那次劫后余生的聚会，都感慨万千。曾想把它记录下来，但拿起笔来，又想，这既非老同志打天下的辉煌经历，也不是与“四人帮”英勇斗争的记录，写下来又有何意义呢？后来我又想，需要记录下来的，绝不仅是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轰轰烈烈的历史场面，即使是那些打了历史烙印的生活浪花，寄寓着人们当时的思想感情的身边琐事，同样应该视为历史，留下它昭示我们的后人。

（责任编辑 洛松）



# 迫害刘志丹的执行者 不是张敬佛

## — 《西行漫记》中一段史实的补正

### ● 于行前

《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是中国人民亲密的老朋友,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成名之作,风行几十年,举世闻名。

斯诺在该书的序言里有这样一段话:从严格的字面上的意义来讲,这本书的大部分不是他写的,而是战斗、生活在那里的人所口述的。由此,我们得知,斯诺写这本书的资料,都是直接取自提供材料的人。可能由于材料来源问题,《西行漫记》中有一段记载与历史事实不符,使一位老共产党员形象受到了歪曲,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给予更正。

《西行漫记》(1979年12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董乐山译)第186页第2行开始,有这么一段记述:“这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8月间陕北来了一个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一个名叫张敬佛的胖胖的年轻人。据告诉我消息的人(他当时是刘志丹部下的参谋)说,这位张先生(外号张胖子)有权‘改组党和军队。他可以说是个钦差大臣’。

“张胖子开始着手收集证据,证明刘志丹没有遵循‘党的路线’。他审问了刘志丹,命令刘志丹辞去一切职务……张先生还下令逮捕和监禁了一百多个党内军内其他‘反动派’,心满意足地稳坐下来。

“就是在这个奇怪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南方的红军先遣部队,即在林彪、周恩来、彭德怀、毛泽东率领下的一军团在1935年10月到达。他们对这奇怪的情况感到震惊,下令复查,发现大多数证据都是无中生有的,并且发现张敬佛不仅越权,并且本人受到了“反动派”的欺骗。他们立即恢复了刘志丹和他所有部下的原职。张

胖子本人遭到逮捕,受到审判,关了一个时期以后,分配他去从事体力劳动。”

创立陕北苏区和陕北红军的刘志丹在1935年9、10月间,遭受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打击迫害,被逮捕关押,幸亏中央红军及时到达陕北,才得以挽救,这是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但迫害刘志丹的是何许人,是不是《西行漫记》中所说的张敬佛,是应该进一步搞清楚的。

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地区,在1935年前后党内的路线斗争很激烈,情况也很复杂。

1935年6月,朱理治以中共北方局代表(化名孔原)的身份来陕北工作,与此同时,聂洪钧由上海临时中央局派来陕北,他俩都是为解决所谓陕甘边、陕北苏区和红二十六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问题而来的。在他们到达之前,北方局中央代表和上海临时中央局曾给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十六军来信。在信上给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十六军戴上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领导”、“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浓厚的土匪色彩”五顶大帽子。朱、聂到陕北后,立即与一直和刘志丹对着干的郭洪涛结合在一起,先成立了中央西北代表团,朱理治任书记。紧接着代表团与西北工委又成立陕甘晋省委,朱理治兼省委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

这时,朱、聂、郭共同策划搞起“肃反”来。把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都戴上“右派反革命”帽子逮捕起来,前方、后方一起行动,一面逮捕一面杀人。发展到后来,竟把陕甘边和红二十六军主要领导人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也逮捕起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中央红军赶到陕北,毛泽东、周恩来说:“刀下留人”,派出以王首道为

首的工作组,经过斗争,才把刘志丹等同志救了出来,及时挽救了这场危机。

中共中央为搞清陕北的问题,用了很长时间和很大的精力,先后发过两个正式文件。即:1942年12月12日的《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1983年7月13日的《中共中央关于印发〈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的分析和方针〉的通知》。

《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明确地指出:“中央根据十月(1942年)陕甘宁党的高干会议对于陕北历史问题的检讨与结论,认为1935年9、10月间朱理治、郭洪涛等同志所主持的‘肃反’将陕北苏区和红军创造者,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等同志逮捕,并杀害了二百以上的党政军干部,这种将党的最好干部,诬认为反革命分子,加以逮捕和杀害,不仅完全是错误,而且是革命的罪恶。”

1983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印发〈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的通知》中指出:“中央指定李维汉、王首道等同志组成的五人小组对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做了很好的工作,他们所提的方针是正确的,采取的方法是稳妥的。”

与该通知同时下发的《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确认1942年《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正确地分清的是非,指出:“刘志丹等同志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而朱理治、郭洪涛所执行的路线是错误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上述中央文件已清楚说明执行错误路线,逮捕、迫害刘志丹等同志的不是《西行漫记》中所说的张敬佛(张胖子)。而是朱理治、郭洪涛。张敬佛不但未参与此事,而且也受到了朱理治、郭洪涛的打击、迫害。

张敬佛应为张庆孚,《西行漫记》的译者根据斯诺的原著英语拼音译成了张敬佛。

张庆孚(曾用名张琴抚),1925年由恽代英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1926年在上海大学毕业,经恽代英介绍到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1932年3月至1934年9月,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1934年11月,受党的指派到陕北工作。

张庆孚因他身体肥胖,党内同志都叫他“张胖子”。关于他到陕北的情况,可以从1945年7月10日《朱理治同志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中了解到一些情况。据介绍,张敬佛当时带了介绍信到陕北,由于介绍信是药水写的,没有烤出来,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张被抓了起来。朱理治说:“后来中央来了要放他,我不同意,我说这个人不可理解,一定是反革命。直到1936年我才弄清

了,原来他是王世英派来的,他在上海做交通工作……今天想来,我当时对他的处理也是错误的。”

1984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研究人员高扬、李发科访问了刘向三同志。刘向三在谈陕北苏区的肃反时,谈到张庆孚,他说:“从未承认有什么问题的是张庆孚(也叫张胖子),上海人,大学教授,当时有著作,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在黄埔军校任过教,高桂滋、高双成是张的学生。张想到苏联莫斯科去,没去成,经中央允许去陕北。到陕北苏区后,生活不习惯,加上张的眼睛高度近视,身体也胖,在游击活动中有困难。张说 he 自己是中央代表,抓起来后,用了苦刑,打得很重。”

上述材料充分证明张敬佛不但是一个无辜者而且是一个深受错误路线迫害的受害者。

《中共中央关于印发〈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的通知》中说:“对于西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在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发生的错误肃反问题,我们应作两方面分析,一方面指出其错误的严重危害,另一方面必须看到产生这种错误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根源,看到事情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犯错误的同志也接受了教训,几十年来为党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不少成绩,不应再着重个人责任。”中央这一精神是极其正确的,也是我党解决历史问题的一贯方针。

今天重新提出这个问题,目的和着重点不是为了追究某些同志的个人责任,只是为了尊重历史,求实存真,把《西行漫记》中有关张庆孚(张敬佛)的一段有误的记载补正过来。我想,这样做不但符合中央上述《通知》精神,同时也不会由此而影响《西行漫记》这部名著的重要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

(责任编辑 一尘)

## 本社迁移新址 敬告读者

本社原址文津街7号(北京图书馆分馆)房屋维修,自8月1日起,本社迁至新址——北京市东城区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1号柏林寺院内办公。

邮编:100007

电话:64031144 转 2191 或 2004

1992年在北京,由文化部、广电部、作协和音协等单位,联合主办过一个“刘氏三杰”纪念音乐会,以纪念刘半农的百年诞辰,刘天华、刘北茂的60周年和10周年忌辰。刘氏三兄弟在我国现代文化史,特别是诗歌、音乐史上所做之贡献是令人仰慕与爱戴的。

本刊特将刘北茂生前忆其兄刘天华的记录,由刘北茂之子育辉整理后发表。

# 忆胞兄刘天华悉心献音乐

● 刘北茂口述 育辉整理

刘天华(1895年2月4日——1932年6月8日),江苏江阴人,我国现代民族音乐事业的开拓者,杰出的民族音乐家。他出身于一个贫寒的知识分子家庭。其父刘宝珊系清末秀才,但积极倡导新学,曾创立家乡第一所新式学堂,开苏南地区新式教育之先河。其兄刘半农为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之一,著名的新文学家、诗人、语言学家与学者;其弟刘北茂为作曲家、音乐教育家,时称三兄弟“刘氏三杰”。

人们一提起家兄刘天华,就会联想到他那些脍炙人口的二胡十大名曲,如《光明行》、《良宵》、《病中吟》、《空山鸟语》与《烛影摇红》等。由于其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而广为流传,盛演不衰。因此人们往往把刘天华的名字与“二胡”这件乐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就像西方人士将钢琴与肖邦、李斯特,将小提琴与帕伽尼尼联系起来一样。然而,也许由于以上同样的原因,无形中“掩盖”了刘天华其他方面的业绩,比如他作为民族器乐演奏家、教育家与革新家等方面的贡献,甚至连人们所喜爱的这些乐曲产生的艰辛历程,感人事迹与所表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感情等问题也介绍较少。因此,我们谨在此披露其生平中若干鲜为人知的片断,以飨海内外广大读者。

## 立志革新民族乐器

刘天华是我的二兄,因此我清楚地记得,从他一开始从事音乐,就逐渐发觉西洋音乐的某些优点和先

进因素是值得我们民族音乐学习与借鉴的。

1922年天华来北大音乐传习所任教,后相继在北京女师大、女子文理学院和艺专任二胡、琵琶、小提琴教授。在繁忙的教学之余,他开始了系统而全面的学习,以便博采众长,去实现他那梦寐以求的革新民族音乐的总目标。因此,他师从俄罗斯著名小提琴家托诺夫正规地学习小提琴,钻研戏曲艺术与收集整理民间音乐,广泛地涉猎中外音乐理论等等。他渐渐产生了一个宏伟的设想,在我国民族音乐优良传统的基础上,采用科学的方法,借鉴西洋管弦乐器,来系统而重点地改革我国众多的民族乐器,以建立起我们中国新型的民族管弦乐队,为创作出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交响乐”奠定基础。

在改革民族乐器方面,天华一开始是从挖掘我国古代音乐文化遗产入手的。例如他对我国的“古合乐”非常重视。所谓“古合乐”,即当时濒于失传的清宫廷音乐,实际上这种音乐最早也是源于民间的,因此二兄曾为寻找当时唯一在世而能演奏其全部清曲的老

乐工、借用乐器等方面苦费周折。

他的具体作法是分两步进行：首先和北京文兴斋乐器店的一位老乐工合作，拟订出改革乐器的初步方案，然后再自筹经费，雇请技工，设立一个实验性的小工厂，边研究边试制他的改良乐器。一开始他即把改革二胡、琵琶作为重点和突破口，同时还考虑到其他的乐器。为此他和那位老乐工一起研究二胡、琵琶的改革，并试制了从西域传入内地近两千年的古拨弦乐器箜篌等，从此开始了他对众多的民族乐器的改革工作。

## “刘氏琵琶”与“刘氏二胡”

在进行上述改革以前，琵琶自南北朝从西域传入我国已历时十五个世纪左右，悠长的岁月为琵琶积累了丰富的曲目，它不像二胡那样被鄙视为不能登大雅之堂，特别在宫廷的雅乐中还占有重要位置。这些都充分证明了琵琶在表现力与演奏技巧诸方面已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对这样一件公认已定型的传统“大雅”乐器，天华仍敢于从其形制、演奏技术，直到用弦粗细等方面再进行一系列的改进，使琵琶的音域更扩大了，音色更优美了。

至于二胡这件历来不受重视的民族乐器，天华却视为瑰宝，对它怀着深厚的感情。他为二胡在我国已流传了一千余年，还被某些人嗤之为“叫花子乐器”而鸣不平。他曾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气愤地说道：“提琴！提琴！它在西方原来也不过是乞丐向行人讨钱的工具，它也没有现在这么高贵！”他还在《月夜》、《良宵》两首二胡曲的《说明》中特别声称他“偏爱二胡”。这是因为他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看到二胡具有售价低廉，制作简易，便于普及与携带等优点，因而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由于这些原因才促使他选定了二胡作为革新民族音乐的一个起点。

像改革琵琶一样，天华很早就注意将其他民族乐器和小提琴的表现手法借鉴到二胡上，例如他曾将三弦拉戏滑音技法巧妙地融合到二胡演奏中去，创作出他早期技巧艰深，被视为“神品”的二胡独奏曲《空山鸟语》，来北京后，他又成功地在其后期作品《闲居吟》中借鉴了古琴、琵琶乃至小提琴演奏技术中的泛音手法，从而使二胡的演奏技术又增添了新的美妙色彩。

天华对二胡的演奏技术和乐器本身都作了很多的改革，使这件原先很简陋的民间乐器渐臻完美。他和北京琉璃厂文兴斋乐器店一位老乐工合作，根据以上各项改革，设计制作出一种新型的二胡。当时不仅北大、艺专和女大三校学习中国音乐的学生都来文兴

斋乐器店购买乐器，而且连社会上的一些民乐爱好者们也来争相购买，该店所出售的经刘天华改革而定型的琵琶和二胡，被人们誉为“刘氏琵琶”与“刘氏二胡”。

天华在改革民族乐器上初试锋芒，就获得如此丰硕的成果。写到此，不禁令人浮想联翩：小提琴这种乐器的前身原来也是类似二胡一样的古代东方的一种原始拉弦乐器，后来流入欧洲，经过不断的改革，最后传到意大利名匠阿玛蒂手中才制成了最精美的小提琴，从而引起欧洲音乐史上的一大革命，而经刘天华设计改革由文兴斋乐器店老乐工精心制作的“刘氏二胡”，在中国现代民族音乐史上亦具有特殊意义！但小提琴是经过四个多世纪漫长岁月的演变才最后定型的，而二胡的改革却主要是天华个人的努力，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使它成为中国民族乐器中的一件主要的弦乐器，从而由民间原始状态走上近、现代科学化和专业化的道路。

## 为梅兰芳记谱

1930年间，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应邀赴美演出，为了使外国听众对我国这种陌生的京剧艺术有谱可循，加深理解，以便更好地向世界宣传我国民族文化中的这一瑰宝，行前，梅兰芳等人再三思忖，决定把演出的戏曲唱腔谱成世界通行的五线谱。大家一致公认，此事非通晓中西音乐学养深厚的国乐大师刘天华先生不能胜任。其实，天华来京后早就着手于京剧昆曲艺术的研究了，这得益于师从著名票友“红豆馆主”爱新觉罗·溥侗。记得当时是梅兰芳的笔杆子京剧理论家齐如山先生来找天华联系的，当时我的长兄半农先生知道后给予大力的支持，天华亦感到这件事意义重大，又可借此机会推广他所一贯倡导的科学的记谱法，于是就放下了自己课余繁重的学习计划，欣然承担了下来。

听写记谱的过程是异常艰巨繁难的。当时由梅的琴师徐兰沅与笛师马宝明两位先生先把梅兰芳所演各戏唱腔谱出个工尺谱的初稿，天华据此再译成五线谱的初稿。那时还没有录音机这样先进的科学设备，只好一遍又一遍地听徐拉京胡、马吹笛子，天华按谱反复细心揣摩，发觉工尺谱中有许多差错和遗漏的地方，再一点一点听写修改补充。改得差不多了，天华再用小提琴按改过的五线谱拉奏几遍，让徐、马二位反复听听，有时齐如山亦来听天华拉奏，如发现不对的地方再改。改完了再请梅兰芳先生把各戏唱腔清唱几遍，天华再按唱腔逐一推敲修改。当时我曾去二兄天华家里听过几次，印象极深，梅先生的嗓音清亮、

优美,给人以回肠荡气、绕梁不绝之感;当唱到激越处,我甚至觉得窗上的玻璃都为之微微颤动!最后一道工序仍由天华按谱拉小提琴给梅兰芳和徐、马、齐几位先生细听,再征求大家的意见,改了又不知多少遍,最后才算定稿,并命名为《梅兰芳歌曲谱》。这种反反复复,琐琐碎碎而又艰苦细致的工作,竟耗去了天华三个多月的时间。也累得他憔悴消瘦了不少!后来梅兰芳在《曲谱》序言中曾追忆道:“天华先生为谱歌曲十余出,因得且夕承教。先生秉德温懿,于音律析究,尤能入微。每自按梵乌林,以代胡琴。试辨工尺,常至夜分。反复推求,不厌其屑,凡百余日,始得竣事。”

这部大功告成的《曲谱》亦用国际通用的五线谱与天华先生改革的新式工尺谱两种谱式记写。可以说这是我国近、现代民族音乐家与戏曲艺术家首次密切合作的成果,标志着当时科学记谱法的最高水平,从而开创了我国用科学记谱法记录和整理戏曲音乐的先河,对我国日后民族民间音乐以及戏曲音乐科学记谱法的运用与推广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梅兰芳歌曲谱》出版时装璜是异常考究的,全书宣纸印刷,文字部分均附英语译文,线装,煌煌一巨册!在其墨绿色古朴的封面上,由梅兰芳用娟秀挺拔的字体题写为《梅兰芳歌曲谱》,谱中收录了梅氏赴美演出的京剧与昆曲十八出九十四个唱段,内京剧五十三段,昆曲四十一段,囊括了他的代表作《贵妃醉酒》、《天女散花》、《霸王别姬》、《嫦娥奔月》、《木兰从军》和《洛神》等等。

为了庆祝《曲谱》的诞生,并为梅兰芳一行远涉重洋赴美演出饯行,天华先生在他北京大阮府胡同16号的寓所中还特地设家宴款待大家,他的几位好友与同事来作陪,其中就有著名的语言学家兼作曲家赵元任先生以及钢琴家兼书法家杨仲子先生。席间,长兄半农谈笑风生,谈到“国剧”(即京剧)的现状与前途,谈到对梅兰芳一行赴美演出的殷切希望。滔滔不绝的话语不时引起大家会意的笑声,使这古朴幽静的庭院洋溢着一片欢乐、温馨的气氛。

## 《光明行》的光明所在

梅兰芳在美国演出十分成功,尤其是在纽约百老汇大剧院演出更为轰动,从而大大提高了中国京剧在国外的知名度,而《梅兰芳歌曲谱》在美国亦很快被抢购一空,带去的数量远远供不应求,许多未买到曲谱的听众都感到十分遗憾,梅氏精湛的演技获得普遍的好评,美国洛杉矶南加州大学与玻摩大大学特授予他文学博士学位。电波飞越大洋,捷报频频传入国内,国

人闻之无不欢欣鼓舞,天华先生更感到无比欣慰。因为他看到了优秀的民族艺术受到外人的欣赏,他所钟爱的“国乐”亦自然会有光明的前景,在这种亢奋的心态下,他对琢磨了多年的一个曲子《光明行》作了最后的修改,于1931年春在他主编的《音乐杂志》第十期上正式发表了。

这首作品的产生,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民族音乐的创作上更是独树一帜的,它有着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刘天华见到当时某些人鄙视民族音乐,他们尤其看不起群众所喜爱的二胡。音乐界也存在着“重西轻中”倾向。天华为了民族音乐的前途、地位到处奔走呼号,并在自己的教学、创作、演奏和整理民间音乐的工作中作了不懈的努力,从而提高了民族音乐尤其是二胡的地位。而《光明行》一曲正集中地反映了天华先生这种契而不舍、不断求索的精神,以及他对革新民族音乐美好而光明的愿望。

《光明行》一曲吸收了西洋音乐的一些先进的因素,但整个乐曲仍然保持了鲜明的民族风格,它是一首真正具有中国气派的进行曲,因此,它为借鉴西洋音乐来提高和丰富民族音乐树立了典范。

特别应提到的是,《光明行》的创作年代正值中国革命走向低潮的时期,国民党新军阀实行了比北洋军阀更凶残的统治,白色恐怖遍于全国,无数革命者惨遭杀戮,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失学失业,连年内战,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当时革命队伍内部亦“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深深感觉寂寞”(毛泽东语)。但是这种低潮是暂时的,中国革命必将从失败走向胜利,从黑暗走向光明。虽然刘天华当时可能还认识不到这一点,但他所创作出的《光明行》却像在茫茫黑夜中吹起了嘹亮号角,那振奋人心又充满艺术魅力的旋律激励着人们去追求光明,这一永恒的主题也正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的共同心声。因此这首作品具有长远流传的价值。

(责任编辑 一尘)

## 更正

本刊今年第7期目录页上《张国焘奉命阻止南昌起义》的作者应是彭江流,误为阿寿。这是我们编校工作的疏漏。谨向作者、读者致歉。

本刊编辑部

# 诲人不倦的孔子

## 和学而不厌的颜回

● 侯卫东

1 颜回(公元前521—公元前481),姓颜名回,字子渊,亦称颜渊,鲁国都城(今曲阜)人。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我国古代一位庶民出身的知识分子。

颜回处于春秋末期“礼崩乐坏”的社会大变动时代,一部分封建领主转化为封建地主,新兴的地主阶级逐渐形成,并进而出现了王室衰微、大国争霸、贵族内部斗争激化的局面。大国争霸的战争,使农民破产成为自由民,贵族争斗的结果,使一部分被打败的贵族降为庶民;加上一部分无地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他们构成了一个新兴的庶民阶层。新兴的地主阶级不仅要确立自己的经济基础,而且要求建立自己的意识形态,要求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为本阶级服务。庶民阶层为了自身的生活,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渴望,希望有培养自己子弟的学校出现。这就为私人办学提供了生源。

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学识渊博的有识之士孔子,创立私塾,大兴私人办学之风。孔子的办学活动,打破了西周以来“学在官府”、“庶人不仕”的局面,为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庶民百姓,提供了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开创了我国教育史上的新篇章,因而吸引了各国众多的学生到孔门读书求学。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其弟子“盖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形成了以孔子为首的知识分子群体,成为为地主阶级服务的“士”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发展的要求和孔子开创的教育新局面为家境贫寒的颜回提供了接受学校教育的社会条件和学习条件。

颜回出身于庶民家庭,和其他庶民出身的子弟一

样,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当他十三岁时,就进入孔门,开始了学习生活。他在孔子的早期弟子中,年龄最小,聪明好学,生活清苦,不慕富贵,深得老师的喜爱。在长期的学习生活中,他笃信好学,求仁为仁,博学多能,尊师重道,最终成为孔门弟子中的德行之首。

2 笃信好学是颜回治学的突出特点和优点,是其成才的基本因素,也是值得后人学习的重要方面。孔子在教学过程中,首先教育学生“志于仁”,就是教育学生立定志向,实行仁道,为真理而斗争。他认为这是读书人的首要课题,是当时成为君子的第一个条件。孔子对新授业的学生指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要努力修养自己的品德,为治理国家服务。学习不是为了给别人看,不要把学习当做装饰品。为了对学生进行正确的学习目的教育,孔子与颜回、子路郑重地谈论起人生志向问题。《论语·公治长》载: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

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

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

子路曰:“愿闻子之志。”

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由此看出,子路、颜回、孔子师徒三人坦诚地表白自己的志向。子路为朋友献出个人的一切,表现了求仁的志向,颜回着重修养自己,不夸耀自己的长处,不将劳苦的事情加于别人,表现出不违仁,努力做一位仁者的志向。孔子要使老中青三代,即各阶层人士和平民百姓,都因为他的存在而各有所益、各有所安,表

明了孔子的救世济众的仁者志向。言志一课,使颜回受到深刻的教育,他敬重老师,信奉老师指引的正确道路,决心像老师一样成为仁者。他联系古代先贤自言道:“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意思是:“舜是什么样的人,我也是什么样的人,有作为的人也会像他那样。”

求仁是颜回的学习目的和动力,学习是颜回求仁的途径。颜回牢记孔子“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的教导,努力学习做人的道理和诗歌礼乐等文化知识,并养成了好学乐学的优良学风。颜回的好学首先表现在庄重的学习态度上,在孔子讲课时,他专心致志,认真听讲,从不懈怠,不放过每个问题。孔子对此倍加赞扬,他说:“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意思是说,听孔子讲学始终不懈怠的,大概只有颜回一个人吧!在学习过程中,颜回不畏艰苦,不怕困难,表现出顽强的乐学精神。孔子说:“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在学习方法上,颜回能够做到学思结合,融会贯通,举一反三。对所学的知识,认真进行分析研究,抓住本质问题深刻领会,加以消化吸收,变为自己的精神财富。开始孔子不甚了解,认为颜回不提意见和疑问,像个蠢人。后来,通过观察了解,知道他课后注重思考,内省自悟,有所发挥,就改变了上述的看法,深有感触地说:“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这种内省式的自学方法还表现在联系实际,注重个人品德修养,身体力行,把所学的道理转化为实践,做到“不迁怒,不贰过”。对人对己心平气和,不把自己的烦恼苦痛发泄出来,拿别人出气,一旦发现过失,当即改正,不再犯同类过失。颜回笃信好学,博学多识,致思醒悟,通理推论的治学精神和经验,是难能可贵的。

**3** 求仁为仁既是颜回的学习目的,又是颜回的自我修养重点。孔子办学的宗旨是把学生培养成仁人君子,培养成治理国家的有用人才。为此,他把仁学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中,反复向学生讲述自己的仁学思想。孔子对于“仁”的解释,是针对学生的特点、在不同情况下作出的,多有不同。其中以对樊迟的回答最为中肯。当樊迟问仁时,孔子答曰:“爱人”。孔子反复向学生讲明君子与仁的关系,强调指出:“君子去掉了仁德,怎么能够称得上君子呢?君子没有在吃一顿饭时候离开仁德,就是在仓卒匆忙的时候,一定和仁德同在。”在老师的教诲下,颜回把学习和修养仁德作为主攻方向。他对众师问仁、孔子答仁的内容,一一记在心上,然后自己作系统的研究,达到深刻理解,有所创见。同时,还进一步向老师求教,

怎样做才能成为仁人。《论语·颜渊》载: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就是说:抑制自己,使言论行动都合于礼就是仁。一旦这样做到了,天下都归回到仁的境界里去了。实践仁德全凭自己,还凭别人吗?颜渊继续问道:“请问其目。”孔子说:“不合礼的事不看,不合礼的话不听,不合礼的话不说,不合礼的事不做。”在这里,孔子着重讲明了仁的涵义、做仁的要求和为人由己的道理,强调了仁德是个人修养的最高要求,也是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个人的仁德修养,不仅是为了完善自己,而且要从自己做起,由己及人,弘扬仁道,建立美好的理想社会,强调了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是成为仁者的关键。同时,孔子把“仁”与“礼”联系起来,赋予“仁”以新的意义。孔子说的“礼”是区别嫡庶、尊卑、贵贱,使社会各种人都安其位的周礼。在社会大变动的时代,孔子主张注重内心修养,达到仁的境界,并使外在的言论行动符合礼的要求,把内在的仁与外在的礼统一起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颜回对孔子的解释非常满意,答曰:“我虽然不敏,也要实行您这话。”颜渊在领悟了仁的真谛和求仁为仁的途径之后,努力修养自己,得到了老师的首肯。孔子为了了解学生关于仁学的学习情况,对子路、子贡、颜渊进行了测试。《荀子·子道》载:

子路入。子曰:“由,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对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子曰:“可谓士矣。”子贡入。子曰:“赐,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贡对曰:“智者知人,仁者爱人。”子曰:“可谓士君子矣。”颜渊入。子曰:“回,智者若何?仁者若何?”颜渊对曰:“智者自知,仁者自爱。”子曰:“可谓明君子矣。”

试题相同,三人答案各异。孔子对他们的答案分别作出士(读书人)、士君子(品德高尚而有学问的人)、明君子(贤明的品德高尚而有学问的人)的评价。由此可知,颜回答案最符合试题的要求。因为,只有自知自爱,才能自重自信;才能做到由己及人,由爱己推及到爱人,宏扬仁道;才能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达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颜回遵照孔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要求,进一步联系个人实际,内讼自省。从具体事情做起,随时检查自己,经常反省自己,逐步达到仁的境界。这既是颜回治学的重点,也是他通过学问的陶冶,达到仁德最高境界的经验所在。孔子赞曰:“颜回呀,他的心长久地不离开仁德,别的学生么,只是短时期偶然想起一下罢了。”

颜回在自我修养仁德的同时,还注重学习治国之道,努力使自己成为治理国家的有用人才,以实现他

所向往的“君臣一心，上下和睦，丰衣足食，老少康健，四方咸服，天下安宁”，无战争、无饥饿的理想社会。他在学习和领悟孔子为政以德的治国理论的基础上，主动向孔子求教治理国家的具体措施。《论语·卫灵公》载：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路，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惑。”

在这里，孔子讲了自己对于三代文化损益的观点，说明文化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性，其中包括历法、礼乐、服饰精神文明，也包括交通工具方面的物质文明，二者在国家中是不可缺少的，同时告诫后人，要防止淫秽乐曲泛滥和邪恶掌权。颜回在听了老师的这一教导之后，增长了治国的知识和经验，认识到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和士大夫，不但必须具备高深的仁德修养、广博的学识，还需要具有实际的管理才能。为达到这一要求，他作了不懈的努力，最终具备了入仕为官和传道授业的条件，孔子深知其才具，深情地对颜渊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

#### 4

颜回在孔门长期的学习和成长过程中，通过与孔子相互交流思想，探讨切磋学问，互相理解扶持，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成为我国古代尊师爱生的典范。颜回尊师好学，孔子因材施教，及时进行针对性教育，因而颜回能够迅速领会和掌握孔子的仁学思想和中庸的方法，不断进步。《论语·子罕》载：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

这段发自肺腑的语言充满了对老师的深厚感情，颂扬了孔子孜孜不倦、循循善诱的精神和高超的教学艺术，使人们看到孔子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在前头引导学生前进，颜回在后面紧跟，一步一步地不停地进发。正是在老师这种精神的感召和正确的指导下，颜回才得以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竭尽全力地学习，获得了广博的知识，做到了用礼来约束自己，在社会上站立起来。

颜回从入学至逝世的数十年间，除因事以外，很少离开过孔子。相传孔子正设教于杏坛，少正卯也设教于鲁城，与孔子并立讲学。造成孔门三盈三虚的境况，唯有颜渊从不离开孔子，表现出对孔子的坚定信仰和深厚感情。颜回有事需要西行，暂时离去，也要首先向老师说明事由请求应允，并请求安身之道。孔子以“恭敬忠信”相告，师行并商议了办事安身之方。颜回非常珍重老师的这一教导，不仅以“恭敬忠信”为一

时的安身之道，保全了自身，完成了所作之事，而且当作终身为仁之道，躬身以行。颜回不但紧跟孔子修德学道，而且跟随孔子周游列国达14年之久。孔子率弟子周游列国首先到达卫国都城帝丘。住了一段时间以后，继续南行，行至匡地孔子遭受围困。这时，颜回在办完自己的事情以后，尽快赶到了孔子身边。正在担心颜回安危的孔子，为之一振，情不自禁地说：“我以为你是死了！”颜回答曰：“您还活着，我怎么敢死呢？”表现出师生之间心心相印、相安为命的真挚感情，使在场者无不为之感动。在陈蔡间遇险时，子路等人对孔子的学说都产生了怀疑，而颜回始终不渝，并解释道：“老师的理想很高，学问很深，所以才不被一般人所理解、采用，这正是他们的耻辱。”孔子听后十分高兴，感到莫大的宽慰。在周游列国时期，颜回陪同孔子先后到过卫、曹、宋、郑、蔡和楚国的负函，扶持孔子宣传仁政，扩大儒家学派的影响。

回到鲁国后，颜回帮助孔子授业传道，整理古籍。这时，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除了孔子的权威领导外，还有颜回、子贡、子路、曾参、子张、子存为骨干的中坚力量。颜回以其自身的示范作用和善于协调人际关系的能力，使这个集体团结友爱和睦相处。孔子高兴地说：“吾自得回也，门人加亲。”孔子本想把颜回作为自己事业的继承人，不幸颜回于公元前481年先老师而逝世。颜回死后，孔子悲恸欲绝。长叹：“噫！天丧予！天丧予！”跟随孔子的人说：“您太伤心了！”孔子说：“真的太伤心了吗？我不为这样的人伤心，还为怎么样的人伤心呢！”在筹办如何办丧事时，同学们从对颜回的敬重和友情出发，决定厚葬，去征求孔子的意见。孔子根据颜回知礼节俭的情操，表示：“不可”。众人没有听从这一意见，用丰厚的礼仪埋葬颜回于鲁城东防山前。对此，孔子认为是违背颜回意愿的，因自己未能劝阻，深感内疚。痛惜地说：“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意思是说：“颜回呀！你看待我像看待父亲，我却不能像对待儿子一般地看待你。这不是我的主意呀，是你那班同学干的呀！”

颜回逝世后，孔子余哀不止，时常怀念这位伴随自己大半生的贴心弟子。当鲁哀公问孔子：“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表现出不尽的哀思，再次感念他与颜回的深厚情谊。

颜回所具有的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伦理道德、治学经验和学习方法，是我国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是我国文化史上闪光的一页。正因为如此，汉代以后的统治者独尊孔子，把颜回列为供奉孔子的四配之首，尊为复圣。

（责任编辑 余人）



# 炎黄书画名家近作展部分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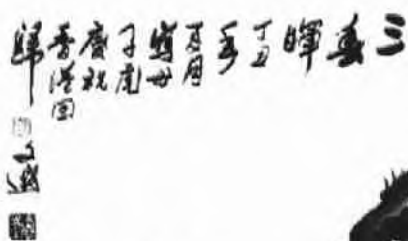


李白观瀑图 丁丑年秋 陈大章作

太白观瀑 陈大章作



↑ 铁骨傲冰雪 幽香透国魂 陈洪宝作



↑ 三春晖 汤文选作



→ 远眺图 詹更西作

# 炎黄春秋



张学良九五华诞于魁智赴美献艺



1966年程恩远(左一)陪同李宗仁(前)游览太湖

## 张学良九五华诞 于魁智赴美献艺

## 强行推行米丘林学说引起的风波

## 何思源花甲之年入藏考察

## 迫害刘志丹的执行人不是张敬佛

## 诲人不倦的孔子

## 学而不厌的颜回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

CNH-2817/K

邮发代号: 82-507

订阅价: 4.00元

零售价: 5.00元